

「列寧文集」第二冊包括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所寫的若干著作。列寧在這個時期的重要著作已譯成中文的除收入本冊的外還有：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莫斯科版單行本）

馬克思論美國「土地平分運動」（一九〇五年）（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九〇五年）（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

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一九〇五年）

莫斯科起義底教訓（一九〇六年）

論抵制（一九〇六年）

（以上三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

游擊戰爭（一九〇六年）

「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一九〇七年）

「伯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人致左爾格等人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一九〇七年）

（以上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

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九〇七年）（莫斯科版單行本）

土地問題與「馬克思底批判家」（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七年）（見人民出版社版「土地問題理論」，上卷）

目 錄

一九〇五年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	一—三
一	一
二	五
三	二一
四	二三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	三三—三六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三九—三九
俄國革命開始了	四〇—四三
兩個策略	四四—四五
無產階級底鬥爭和資產階級底奴顏婢膝	四六—四六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六—六九

抵制布里根杜馬與起義	七〇—七六
革命軍隊伍底任務	七九—八五
總解決的關頭快到了	八四—九一
軍隊與革命	九二—九五
自由派的職業團體與社會民主黨	九六—九七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九八—一〇一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一〇二—一二一
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二二—一二九
致布魯塞爾社會主義國際局秘書處的信	一三〇—一三四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一三五—一二八
論黨底改組	一二九—一四〇
一	一二九
二	一三三
三	一三六

一九〇六年

工人政黨及其在現時情況下的任務	一四二—一四四
是否要抵制國家杜馬？（「多數派」底行動綱領）	一四五—一四八
杜馬底解散與無產階級底任務	一四九—一七一
一	一四九
二	一五四
三	一五七
四	一六三
五	一六九
六	一七〇
在大風暴之前	一七二—一七七
論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	一七八—一九三
出席統一代表大會的前「布爾什維克」政派組織代表告全黨書	一九四—一九九
一九〇七年	
反對抵制（一個社會民主黨政論家底時評之一）	二〇〇—二〇五
五	二〇〇
六	二〇九

七	二二四
革命社會民主派底行動綱領	二六—二六
一	二六
二	三三
關於非黨的工人組織和無產階級中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派別（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 代表大會決議草案之一）	三九—三二
列寧在黨的法庭上的辯護詞（或反對中央委員會中那些孟什維克委員的控訴詞）	三三—三六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圖加特大會	三六—三六〇

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

一

五年以前，有許多社會民主黨底代表還認爲「打倒專制政體！」這一口號提得太早，使工人羣衆莫明其妙〔三〕。當時我們稱這些代表爲機會主義者，是很公平的。我們曾經對他們再三解釋過：他們落在運動之後，他們不懂黨底任務，不懂黨是階級底先鋒隊，是階級底指導者和組織者，是整個運動及其根本的和主要的目的底代表。此等目的時可以被日常的工作所蒙蔽，然而此等目的是鬥爭的無產階級底照路明星，這種意義，無論何時都不應失掉的。

當此革命烽火瀰漫全國的時候，當此最不相信的人也相信在最近的將來專制政體必然要倒台的時候，而社會民主黨又要碰到（儼然有什麼歷史底諷刺似的）這樣的反動派，機會主義者，他們企圖把運動向後拉，減低運動底任務，蒙蔽運動底口號。與此等企圖底代表者論戰，成爲目前的任務，且具有（不管那許許多多不愛黨內論戰的人底意見如何）絕大的實際意義。因爲我們越是接近於直接實現我們最近的政治任務，則對於此等任務的了解便越發必需十分明白，而在這個

問題中所有一切的曖昧，遺漏或思慮不周，就越有害處。

但是在社會民主黨的新火星派或（幾乎與它一樣的）工人事業派〔三〕中間，思慮不周的却是不少。「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是大家同意的，不僅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同時所有的民主派，甚至所有的自由派（如果相信他們現在的言論）都是同意的。然而這個口號是什麼意思呢？應當怎樣去推倒現在的政府呢？誰應召集立憲會議呢？（現在解放派——參看「解放」第六十七期〔四〕——也準備把立憲會議當自己的口號提出來，並承認普遍的……選舉權。）在立憲會議選舉時，爲使這個選舉真正能自由舉行和代表全體人民底利益，需要些什麼切實的担保呢？

誰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明確的回答，他就不懂「打倒專制政體！」的口號。但這些問題必定要歸結到臨時革命政府問題；因爲在專制政體之下，要完全保證用真正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無記名的投票來實行真正自由的全民選舉以產生立憲會議，這不但靠不住，而且簡直不可能，這都是不難了解的。假如我們不是無謂的提出即刻推倒專制政府這一實際的要求，那末我們就要弄清楚，我們究竟想用什麼別的政治政府來代替這個被推倒的政府？換句話說：我們應如何去觀察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所抱的態度？

目前社會民主派裏面的機會主義者，即新火星派對於這個問題，如五年前工人事業派對於一般政治鬥爭問題一樣，正在努力把黨拉向後轉。在這個問題上，新火星派的反動見解，在馬爾丁諾夫底「兩個專政」這本小冊子上最充分地發揮出來了；對於這本小冊子，「火星報」（第八十

四期)〔五〕特別加以稱讚和介紹，同時我們也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的讀者去注意了。

馬爾丁諾夫在自己的小冊子上，一起頭就用這樣可怕的前途來恐嚇我們：「如果革命的社會民主黨能用強固的組織去『指定和施行全民的武裝暴動』而反對專制政體，像列寧所夢想的一樣，那末全民的意志，在革命之後馬上就會指定這個政黨為臨時政府，這還不明顯嗎？那末人民就會把革命的最近命運，委託這個政黨而不委託其他什麼政黨，這還不明顯嗎？」

社會民主派竟說出這種話來，這當然非常奇怪；然而這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黨未來的歷史家，將要非常驚奇地指出：在俄國革命剛剛開始時，社會民主黨底基朗特派〔六〕曾經用這種前途來恐嚇革命的無產階級！馬爾丁諾夫底小冊子（以及新「火星報」上許多文章和論文中的許多段落）全部內容就是形容這個前途之「可驚」。新火星派思想上的領袖在這裏聽到「奪取政權」而驚訝，他們似乎看見了「雅可賓主義」，巴枯寧主義，屠卡却夫主義和其他可怕的主義等一樣；而這些主義正是各種革命婆婆很喜歡用來恐嚇政治上的嬰兒的。當然，此地非「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不行。可惜，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都被亂用呵！例如：「一切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個真理，曾經被人〔七〕引去辯護我們的政治任務底狹小和政治鼓動與鬥爭方法底落後，這你們還記得嗎？現在，恩格斯又被人拿去做擁護尾巴主義的護身符了。恩格斯曾在「德意志農

○ 這是指經濟派和「工人事業」雜誌。——俄文版編者註

民戰爭」一書中寫道：「極左黨領袖們最壞的遭遇就是：當革命運動尚未充分成熟，尚未達到使他所代表的階級能夠獲得統治和施行保障這種統治的辦法時，這些領袖們就為情勢所迫非奪取政權不可。」如果留心讀一讀馬爾丁諾夫所引來的這段話底起句，那末就能夠完全相信，我們的尾巴主義者如何曲解恩格斯底意思。恩格斯所說的，是保障一階級統治的政權，難道這還不明白嗎？因此，對無產階級而言，這就是保障無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即為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馬爾丁諾夫不懂這一點，他把推倒專制政體時的臨時革命政府與推倒資產階級時的有了保障的無產階級統治，混為一談，他把工農民主專政與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專政混為一談。可是再看恩格斯底下文，他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說，極左黨底領袖將要「堅持其別階級底利益和用空言、許諾以及確信別階級底利益就是自己本階級底利益，來敷衍自己的階級。誰一落入這個虛偽的地位，他就必然陷於死亡而無可救藥」。

加上着重點的文句，顯然證明：恩格斯預防這種虛偽的地位，這種地位就是由於領袖不懂「自己的」階級真正的利益和不懂革命真正的階級內容所致。現在，我們試用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使我們的深思遠慮的馬爾丁諾夫得以明白。想代表「勞動」利益的民意黨人曾經竭力相信，在俄國立憲會議中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將為社會主義者，於是他們就陷於虛偽的地位了，結果他們必然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的死亡，因為這些「許諾」和「確信」不合於客觀的實情。在實際上他們將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底利益，「別階級底利益」。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你是否也開

始懂了一些呢？現在社會革命黨人把俄國必然到來的土地革命，看作什麼「社會化」，「土地轉交人民」，「平均使用」底基礎，於是他們也陷於虛偽的地位，他們必然要遭受無可救藥的政治死亡，因為實際上他們所能達到的改造，恰恰是保障別階級——農村資產階級底統治，所以革命發展愈速，則他們的空言、許諾和確信，便要被實際情形推翻得愈快。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你還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的實在的用意就是要指出不懂革命真實的歷史任務的人就要遭受死亡嗎？你還不懂得恩格斯底話正是適用於民意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嗎？

二

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領袖不懂革命底非無產階級性的危險，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領袖（用自己的獨立的綱領、策略——即一切宣傳和鼓動——和組織來把自己和革命的民主派分清界限的無產階級領袖）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起一種領導作用，這就是危險的。恩格斯認為，領袖們把革命底假的社會主義內容與真的民主主義內容混爲一談，這是危險的；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在建立民主共和國時（這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又是對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作階級鬥爭的最好形式）（七），無產階級與農民共同自覺地建立工農專政，這是一種危險。恩格斯所看到的危險性就是：陷於假的，虛偽的地位，即是言行不符，口

頭上許諾這一階級底統治，而在事實上則保障另一階級底統治；恩格斯認爲這種虛偽，便是陷入政治死亡的必然性，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從這裏得出結論說：如果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爲無產階級和農民保障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那就有遭受死亡的危險。聰明的馬爾丁諾夫無法明瞭，在爭取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時，這樣的死亡，無產階級領袖底死亡，成千成萬無產者底死亡，固然是軀殼的死亡，但這不僅不是政治的死亡，恰恰相反，而是無產階級政治上絕大的獲得，是在爲自由而戰鬥中無產階級領導權之絕大的實現。恩格斯認爲，誰無意識地從自己階級底道路落入別一階級底道路，他必然要遭受政治的死亡；而聰明的馬爾丁諾夫一方面雖然很恭敬地引證恩格斯的話，而他却認爲誰按正確的階級的道路不斷前進，則誰就不免於死亡。

革命的社會民主派底觀點與尾巴主義底觀點中間的區別，在這裏表現得非常明顯。馬爾丁諾夫和新「火星報」從無產階級與農民所担負的最激進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向後倒退，從社會民主黨領導革命中向後倒退，這樣一來他們就把無產階級底利益讓給——就算是不自覺地——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馬克思說過：我們不應準備爲執政黨而應準備爲將來的在野黨——而馬爾丁諾夫從這個正確的意思中竟得出這樣的結論說：在現時的革命中我們應抱尾巴主義的在野態度。這就是馬爾丁諾夫政治的聰明處。我十分希望讀者把他下列的議論加以思索：

「當無產階級未舉行社會主義革命時，無論整個國家政權，或部分政權，它都不能接受。這是無可爭辯的原理，這也就是我們所以和機會主義的『濤列斯主義』不同的地方」……（馬爾丁

諾夫，第五八頁）——我們可以補充一句，這也就是證明尊貴的馬爾丁諾夫顯然是一竅不通。把無產階級參加反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權與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混爲一談，這就是毫無希望地不懂得這裏是什麼一回事。這恰巧也如把米勒蘭加入劊子手加利孚（h）內閣與瓦倫加入擁護共和國的巴黎公社混爲一談，一模一樣。

如果再看下去，你們就可以知道馬爾丁諾夫如何糊塗：

「……既是這樣，那末，在將臨到的革命中，不能實現任何的政治形式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馬爾丁諾夫加上的着重點），這是非常明顯的了。因爲資產階級就是將來底主人翁……。」

第一，何以此地只說政治形式，而在上文則說一般的無產階級政權直至社會主義革命爲止呢？何以作者不說實現經濟形式呢？因爲他自己不知不覺地已經從社會主義革命跳到民主革命中去了。如果這樣（這是第二），那末我們的作者 *tout court*（即簡簡單單地）說「整個資產階級底意志」，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爲在民主革命時代正是表現出剛從專制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資產階級各階層有不同的意志。說到民主革命時，僅僅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簡單地和空洞地對立起來，這簡直是愚昧之至，因爲這種革命恰恰是處在這樣一個社會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社會底廣大羣衆恰巧就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而構成最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正因爲民主革命尙未完成，所以在實現政治形式中，這個廣大的階層底利益與無產階級相

同的地方比後者與「資產階級」（就該字底真義和狹義上說）相同的地方爲多。馬爾丁諾夫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這就是他糊塗觀念底主要根源之一。

再看吧：

「……如果這樣，那末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用單純的嚇倒大多數資產階級分子的方法，只能發生一種結果——使君主專制恢復原狀——無產階級在這個可能的結果前面，當然不會停止不進的，但是，如果假立憲的讓步，竟使日益腐化的專制政權復活起來，鞏固起來，事勢至此雖有最不良的結果，無產階級也不因此而不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無產階級實行鬥爭的時候在其心目中所注意的，顯然不是這種最不良的結果。」

讀者諸君，你們是否知道一些？假如有虛偽的立憲讓步來威脅民衆時，那末就是恢復君主專制，無產階級也不會不恐嚇資產階級！這好像我說：有一天別人用埃及式的死刑威脅我，就是說要我和馬爾丁諾夫一個人作一天的談話；在這個萬不得已的時候，我便採取了一個恐嚇的手段，結果使我罪上加罪，逼得我不得不和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兩人作兩天的談話。最尊貴的馬爾丁諾夫！這簡直是狗屁不通呵！

當馬爾丁諾夫寫了上述的不通的話時，他的意思就是：在民主革命時代，如果無產階級實行以社會主義革命來恐嚇資產階級，則只能使政局趨於反動，減弱民主的勝利。再沒有別的。什麼君主專制恢復原狀，什麼在最不良的結局之下無產階級準備做惡劣的蠢事，這些都顯然談不到

的。一切的問題，依然是馬爾丁諾夫所忘記了的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問題，在於就是俄國存在有農民的小資產階級的這批極廣大的羣衆問題。而這種極廣大的羣衆在目前是只能幫助民主革命，但還不能幫助社會主義革命。

我們再聽聰明的馬爾丁諾夫底話吧：

「……很明顯地，在資產階級革命前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在某種關係上，是比在這一鬥爭底最後階段中，比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應當不同……。」

不錯，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如果馬爾丁諾夫能夠想到這個區別所在，那末他也許就不會去瞎寫上面那一堆不通的話，也不會去瞎寫他這本小冊子了。

「……爲影響資產階級革命底進程和結局而奮鬥，只有無產階級用革命的方法，去強制自由資產階級和激進資產階級底意志，只有現社會最民主的「下層分子」強迫現社會「上層分子」同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它的邏輯的終點。這奮鬥就是無產階級隨時都把資產階級放在這樣的生死關頭：或是向後倒退到君主專制底鐵蹄之下，翻身不得；或是與民衆一道，共同前進。」

這段趣話，就是馬爾丁諾夫小冊子底中心之點。該小冊子底全部秘密，全部的基本「觀念」，就在這裏。但是，這些聰明的觀念究竟是什麼？請看：社會「下層分子」是什麼？聰明的馬爾丁諾夫畢竟還是提到了的所謂「民衆」，到底是什麼？這就是千百萬小資產階級的、城市的和農民

的階層，這個階層在革命鬥爭中完全可爲民主主義者。但是，什麼叫做無產階級和農民對於社會上層分子的強制呢？而什麼叫做無產階級與民衆違反着社會上層分子底意志而共同前進呢？這也就是我們的尾巴主義者所拚命反對的「農革命民主專政」！這個尾巴主義者只怕思索到底，只怕喊出事物底真姓名來。因此他說出他自己莫明其妙的話，他用可笑而且愚蠢的怯懦神情①重複那些失了原意的口號。在馬爾丁諾夫最後的結論中，最「有興趣的」一部分寫了這樣可笑的話：無產階級和「人民」用革命的方法去強制社會上層分子，但不要工農革命的民主的專政——只有尾巴主義者才會說這種可笑的話，只有馬爾丁諾夫才會昏到這個地步！馬爾丁諾夫想無產階級去威脅社會上層分子，想無產階級與民衆共同前進；但同時，它又想無產階級堅決與其火星派領袖們來決定不要走上民主主義的道路，因爲這個道路，就是革命民主專政的道路。馬爾丁諾夫要無產階級表現自己的無意志，來壓迫上層分子的意志，想無產階級鼓勵上層分子「同意」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它的民主共和國的邏輯的終點，鼓勵的方法，就是向資產階級聲明自己不敢與人民一齊徹底完成革命，自己不敢取得政權和民主專政。馬爾丁諾夫想無產階級成爲民主革命底先鋒隊，因此聰明的馬爾丁諾夫以暴動勝利時要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這一前途去恐嚇無產階級。

他這種反動的尾巴主義已經達於極端了。馬爾丁諾夫這位聖人，應當受人馨香禱祝，因爲他

① 無產階級雖然在不良的結果之最不良的結果中，也能够推動資產階級退後，這個荒謬的意思我們已經指出了。

把新「火星報」底尾巴主義傾向，已經徹底發揮出來了。他把新「火星報」在這個最迫切的根本的政治問題上的尾巴主義傾向，鮮明地和有系統地暴露出來了^①。

三

馬爾丁諾夫這種糊塗觀念底根源在什麼地方？其根源就在於他把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混爲一談了，他把處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中間的那個民衆階層（城市與鄉村中貧苦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半無產者」，「半有產者」）底作用忘記了，他不了解我們的最低限度政綱底真義。馬爾丁諾夫聽人說過，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在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時）是不方便的，於是他把這句話底意思「了解」爲不應該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共同參加革命民主專政，不應該參加爲徹底完成這種革命所必需的專政。馬爾丁諾夫讀過我們的最低綱領（九），但他沒有看出那裏所寫的兩種改造底嚴格劃分：一種改造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可以實現的；而另外一種改造是社會主義的改造。他不懂這種劃分不僅有書本上的意義，而且有最重要的實際意義。他不懂得這個綱領在革命時代是要立即拿去試驗和實行的。馬爾丁諾夫沒有想

① 當我們得到「火星報」第九十三期的時候，我這篇文章已經排印了，對於這一期的文章我們以後再說吧（1937）。

到，在專制政體倒台時放棄革命的民主專政觀念，就等於放棄實現我們的最低綱領。真的，你們只要記着這個綱領中所提出的各種經濟和政治的改造就得了——建立共和國，武裝民衆，教會與國家分立，完全的民主自由，堅決的經濟改良。如果沒有下層階級革命的民主專政，這些改造在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之上就絕對不能實行，這豈不是很清楚嗎？這裏所講的不是與「資產階級」不同的一个無產階級，而是「各個下層階級」，這些階級是一切民主革命積極的推動者，這豈不是很清楚嗎？這些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加上千百萬的城市與鄉村的貧民（在小資產階級條件之下生存的）。這些羣衆底代表有許多是屬於資產階級，這是無疑義的。但是民主主義完滿的實現，是建築在這些羣衆底利益上面，這些羣衆愈有知識，則他們爲實現民主主義的鬥爭愈是不可避免，這是更無疑義的。自然，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會忘記城市與鄉村小資產階級羣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兩重性；他永遠不會忘記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無產階級有單獨的獨立的階級組織之必要。但是他同樣不會忘記這些羣衆「除了過去，還有將來，除了偏見，還有理智」，這種理智推動他們前進而走向革命的民主專政；社會民主黨人不會忘記，不僅要從書本上去領受教育，並且從書本上所得的教育還不如從革命進程中所得的教育那樣多——革命展開了羣衆底眼界，給羣衆一種政治的訓練。在這種情形之下，放棄革命民主專政觀念的這個理論，只能叫做是拿哲理去袒護政治的落後性。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對於此種理論棄之如糞土。在革命前夜他不僅要指出革命「最不好的

結果」。不，他同樣要指出好的結果之可能性，他要幻想，如果他不是毫無希望的庸夫，他必須幻想，我們有了歐洲偉大的經驗之後，在俄國工人階級空前地發展了自己的力量之後，將能在無知識的、受壓迫的羣衆之前，燃起空前的革命火燄——因為我們得有許多歐洲革命老前輩底經驗——所以我們能空前完滿地實現一切民主的改造，實現我們全部的最低綱領，我們將能使俄國革命，不成爲幾個月的運動，而成爲幾年的運動；革命的結果，不僅使統治者有許多小的讓步，而要完全推翻這個政權。如果能够做到這個地步，那時候……，那時候革命的烽火就要燃燒全歐；這時候，在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壓迫下的歐洲工人就要抬起頭來，告訴我們「這是怎樣幹的」；那時候歐洲革命底高漲又要影響到俄國，把幾年的革命時代，變成幾十年的革命時代；那時……我們將可以隨時討論，我們「那時」要幹些什麼，那時候我們就不要在遼遠的日內瓦，而要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街上千百萬工人大會前面，在俄國自由一農夫」大會前面來講話了。

四

這些幻想，在新「火星報」庸夫俗子及其「思想上的主人翁」們，我們親愛的博學家馬爾丁諾夫看來，自然是不懂的，奇怪的。他們害怕用平民和庶民專政方法來完全實現我們的最低綱領。他們害怕自己有了覺悟，他們害怕遺失背熟的（但沒有思索過的）書底目錄，他們害怕暴露

自己不會分別民主改造底正確的勇敢的步驟與民粹派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底非階級的冒險跳躍的步驟。他們的庸俗心靈，正確地向他們暗示：在事件急速前進中，比較在日常零碎工作環境之下，要更難分辨正確的道路和迅速地解決複雜的新問題；因此他們天性使然地不斷地哀呼：救我！救我！不要讓革命的民主專政的災禍來侵犯我們！不會送命吧！先生們！你們要「把脚步縮小些，輾轉曲折，慢步移動」才是呵！……

帕吾斯在討論關於幾個最有功勞的老黨員加入中央的問題時，他是非常熱烈地擁護新火星派的，可是現在他也感覺了在這個陷於深淵的集團中難以立足，這是不足奇怪的。他在這個集團中 (taedium vitae) 日益感受生活的痛苦，這又是不足奇怪的。最後，他就憤怒起來了。他不僅擁護嚇死新火星派的一組織革命」這個口號，他不僅起草了許多宣言（這些宣言由「火星報」印成傳單散發，甚至沒有提到社會民主黨的名字[⊖]，因為「火星報」認為在這些宣言中有「雅可賓主義」底危險），不，他不僅這樣，他能脫掉聰明太甚的阿克雪里羅得（或盧森堡？）底「過程組織論」[Ⓜ]這個羈絆，最後他能够不像蟹一樣退後，而能前進。他不願意對於馬爾丁諾夫和馬爾托夫底蠢而又蠢的理論，作無止境的修改。他爽直地（可惜與托洛茨基在一起）擁護革命的民主專政的觀念——即在專制政體推倒後社會民主黨必須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觀念。帕吾斯說，社

⊖ 不知道我們的讀者注意到這種顯著的事情否：在新「火星報」所印發的許多無用的傳單中，有些很好的帕吾斯所寫的傳單「火星報」編輯部剛好是不肯對這些傳單負責；在傳單上也不肯提到我們的黨以及他們自己的出版處。

會民主黨不應害怕勇敢的前進，不應害怕同革命的民主的資產階級在一起打擊敵人，但是必須不要將組織混合起來（這個條件現在正要指出）；各走各的道路，共同打擊敵人；不要掩蔽不同的利益；監督自己的同盟者如像監督敵人一樣等等——所有這些說話都是千真萬確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位脫離了尾巴主義者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越表示熱烈的同情，則帕吾斯幾個不正確的論調，越使我們聽得不愉快。我們把這些小的錯誤指出來並不是因為我們吹毛求疵，而是因為，誰受的越多，對他的要求也越大。現在最危險的，是因帕吾斯自己一點不小心，致誣贗了他的正確的立場。在我們要拿來討論的就是，帕吾斯給托洛茨基底小冊子做的序言底下面一段話，這段話至少應該算是很不注意地說出來的：「如果我們要使革命的無產階級脫離其他政治派別，則我們必需在思想上去領導革命運動」（這是對的），「要比一切人都要更革命些」。這是不對的。如果這句話照帕吾斯所用的一般的意思來講，如果讀者把這個序言看成獨立的與帕吾斯所未提到的馬爾丁諾夫及新火星派完全無關，那末，這句話就是不對的。如果我們把這句話用辯證法眼光來看，即相對地，具體地，各方面地來看，不要模仿走馬看花的作家態度，甚至經過幾年以後，還把整篇文章抽出幾句話，曲解他人的真意——如果我們能這樣來看，則很清楚，帕吾斯這一段話正是反對機會主義的，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特別和帕吾斯下面的一句話比較「如果我們落於革命發展之後」等等）。但是讀者不僅看到尾巴主義者，在革命者營壘中除了尾巴主義者以外，還有完全別的對革命危險的朋友，有「社會革命黨人」，有被革命浪潮吸

引到革命中來的人，無力反對革命空談的人，如拿齊金（二）等，同樣的也有用本能去代替革命宇宙觀的人（如加邦）。帕吾斯把他們忘記了。他所以忘記了的緣故，因為他的文章，他的意思之發揮不是自由的，而是過分聯想到他所努力警戒讀者的那個馬爾丁諾夫主義。帕吾斯底論述是不充分具體的，因為他沒有注意到在俄國民主革命時期中所必然存在的各種革命派別底總和，而這些派別又是此時代社會階級分化不明底必然反映。不清楚的，有時甚至反動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在這時候很自然地要假借革命的民主的綱領，掩蔽於革命的論調之下（你們試回憶社會革命黨人與拿齊金吧，而拿齊金，由「革命社會黨」轉入新火星派，這不過是改了一個名字罷了）。在這種條件之下，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會提出「比一切人都要更革命些」這類口號。脫離了階級基礎的民主派，專愛講漂亮話，喜歡提出賤價的流行的（特別在農民問題方面）口號，我們決不願與這些革命性競賽；我們，剛剛相反，對於這些革命的話，永遠是取一種批評態度，揭露每個字底真義，指出被理想化了的偉大事件底真正內容，同時，還要在革命最緊張的關頭正確地估計各階級以及各階級中的各種派別。

帕吾斯說：「俄國臨時革命政府，將成為工人的民主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能夠領導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則這個政府將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臨時政府，「將是統一的政府，而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在政府中佔多數」，這些話正是因為上述的原因，也是不對的。如果不是講偶然的，轉瞬間的斷片事件，而是講比較長期的，比較能在歷史上留下痕跡

的革命的專政，則他所說的話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不可能，是因為稍微穩固的（自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革命的專政，只有以大多數人民為基礎才有可能。目前俄國工人階級在人民總數中還是少數。無產階級只有和半無產的羣衆，和半有產的小產主羣衆即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與鄉村貧民聯合起來，才能成為絕對的大多數。我們所希望的可能的革命的民主專政社會基礎底這種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底成分，使革命民主派中許多不同的代表必然要參加這個政府，或者甚至在這個政府中佔大多數。如果在這個問題中發生什麼幻想，那就是十分有害的。牛皮大家托洛茨基之所以說（可惜他和帕吾斯在一起）「牧師加邦只能有一個」，「第二個加邦是再不會有的」，這只是因為他是一位牛皮大家。如果在俄國沒有發生第二個加邦的可能，則我們就不會有真正「偉大的」進行到底的民主革命了。革命為要成為偉大的，像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的革命一樣，而不是和一八四八到一八五〇年一樣（三），並且超過它們，則革命必須把廣大的羣衆從可怕的黑暗、空前的壓迫、稀有的野蠻、愚蠢的冥頑不靈的狀態中覺醒起來，讓他們參加積極的生活，英勇的努力和「徹底的歷史的創造」。革命已經開始提醒羣衆，它一定要把他們提醒起來——沙皇政府拚命的反抗只是助成這種工作；可是，這裏自然還談不到這些羣衆及他們許多「孤立的」民衆，甚至農民領袖們已經有了自覺的政治覺悟，社會民主黨的覺悟。他們現在還沒受過許多革命的鍛鍊，還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人，還不僅因為他們沒有知識（再說一遍：革命給予羣衆的教育，是非常快的），而且因為他們的階級地位不是無產階級的，因為歷史發展底客觀邏輯此

刻放在他們面前的任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民主革命。

在這個革命中，革命的無產階級將要用全部力量去參加，同時還要拋棄可憐的尾巴主義與革命的空話，在急轉直下的事變中，要有階級的確定性和覺悟性，不屈不撓地勇敢前進，不害怕革命的民主專政，而要熱烈地願望它，爲共和制度和完全的共和自由而奮鬥，爲堅決的經濟改良而奮鬥，給自己創造一個真正廣闊的，不愧爲二十世紀的，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舞台。

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月）

註釋

〔一〕列寧底「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文曾經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和十二日（三月二十三日）在布爾什維克機關報「前進」第十三期和第十四期上發表。該論文第一段是擁護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基本口號：「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列寧在這裏堅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要參加這種工農臨時政府，該政府要實現工農專政，並且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這種口號，列寧在未作此文以前就已經提出了。這口號是從列寧對於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性質和動力的了解中產生出來的。列寧認爲這個革命是反對專制制度及農奴制度的。而農奴制度底根源，農奴制度底經濟基礎，就是地主統治農民，地主經濟束縛農村。只有剷除這種根源，才可以徹底消滅沙皇制度。因此消滅農村中地主式的壓迫，或者換句話說，用革命手段去解決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就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革命底基本內容。因此這種革命就叫農民的革命。因此對於消滅地主壓迫有切身的利益關係的農民，也就是革命底基本力量之一。列寧在估計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性質時，並注意到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兩個舊的觀念

(這兩個觀念是列寧在舊「火星報」時期中就已經擁護過的)。這兩種觀念就是：一、無產階級與全體農民聯盟反對地主和沙皇制度，二、在這個聯盟之中，即反對地主專制制度的革命中無產階級應起領導作用。這樣看來，列寧認為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基本特點，不僅在於這個革命是農民的革命，同時，又在於這個革命是由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在其勝利時，應當走向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但是，在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已經不僅僅進行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鬥爭了。列寧在他的「社會主義和農民」這篇論文中寫過，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內容是由「兩種社會的鬥爭」所構成的：「一種戰爭是全民的鬥爭，它為自由（為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為民主制度，為民衆底專制而鬥爭；別一種戰爭是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二五五頁）第一，這第二種戰爭，決定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作用，使它不能不與專制制度妥協分贖以反對無產階級，不和沙皇制度作堅決的鬥爭；第二，這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社會戰爭又決定革命發展底前途：俄國工人階級與整個農民一起去推倒沙皇制度和建立共和國的革命民主專政以後，工人階級聯合鄉村農民和藉西歐無產階級之助，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這篇文章底結構就是建築於這些見解上面的。在這篇文章裏面當列寧擁護俄國第一次革命底布爾什維克口號時，一方面他反對馬爾丁諾夫在其「兩個專政」小冊子上所發揮的關於臨時政府問題中孟什維克一般的見解；另一方面他反對當時孟什維克底「左的」分子——帕普斯和托洛茨基。馬爾丁諾夫底小冊子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九月）「流血星期日」以前出版的。在這小冊子上馬爾丁諾夫完全不懂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特殊的、農民的性質，看輕了農民的作用，他企圖斷定：這個革命只能使資產階級獲得政權。馬爾丁諾夫認為工人的政黨，一般地說，只能參加社會主義的政府，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所以他斷定說：工人政黨也不能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去參加革命的臨時政府，而它應當保留為「革命的左野黨」。這樣一來，他不把無產階級和他的政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一種革命領導者底作用，而只是推動資產階級取得政權而已。至於帕普斯，那末他替托洛茨基小冊子「一月九日以前」所作的序言中如馬爾丁諾夫一樣完全不懂革命底農民的性質，輕視了農民底革命作用，可是同時他又與馬爾丁諾夫相反，他否認資產階級底革命作用。所以這裏他就得出結論說：「只有工人才能完成俄國革命的政變」，他又說：「革命的臨時政府將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這個觀點又為托洛茨基所附和，並且在一九〇五年已為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底組成部

分了。

列寧在這篇論文中，把主要的火力向着顯然的機會主義攻去，向着在孟什維克中間佔統治地位的對於臨時政府和無產階級參加這種政府所持的觀點瞄準，同時他又反對「左的」孟什維克——帕吾斯和托洛茨基——革命的空談。列寧打破右的孟什維克用中國萬里長城去隔開兩個革命，他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見本文第三章末尾）。同時列寧又反對托洛茨基和帕吾斯直接跳到「無產階級」專政，他指出無產階級主要的同盟者——鄉村貧民必須經過推倒全體農民底敵人——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的階段和經過種種革命的試驗之後，他們才可以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實在的柱石。

（二）這是指「經濟派」而言。從一九〇〇年末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和舊「火星報」曾經和這些經濟派作了鬥爭。

（三）「工人事業派」——即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經濟派和贊成「工人事業」方針的人們。新「火星報」——即孟什維克。自從列寧退出「火星報」之後，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間「火星報」成為孟什維克機關報。

（四）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增長底影響之下，以前贊成立憲君主政體的解放社現在也在自己的綱領中提出召集立憲會議和「土地強迫讓渡」的要求了。可是解放派這些要求是懸在空中的，因為他們沒有提出推倒專制制度和建立革命的臨時政府的口號。

（五）列寧是指「火星報」第八十四期下列的評註：「馬爾丁諾夫底小冊子『兩個專政』已經出版了。作者涉及各種重要的策略問題，他分析了法蘭西大革命底發展之後，便推論到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今後革命中能够起一種雅可賓黨底作用。我們把這本小冊子介紹給讀者，凡對革命時期本黨任務問題有興趣者不可不讀。」

（六）列寧此地是指「民意黨」機關報「民意」解釋一八七九年「民意」第三期所發表的該黨執行委員會綱領時所說的意見。這個綱領說黨底任務就是用恐怖手段，一方面使政府內部狼狽不堪和混亂已極；他方面，使民衆大為醒覺和極表同情，在這種情形之下黨就可以用陰謀手段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並且召集「代表真正人民利益的」立憲會議。立憲會議應當實行「民意黨」下列的綱領：一、建立民主制度（實行普選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二、「土地歸人民所有和工廠轉交工人手裏」。這種辦法應為「社會」革命底起源和基礎，從這種革命應產生「社會主

義」。民意黨人所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革命不是建築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之上，只是代表農民求得消滅地主，奪得地主的土地和平分這些土地的趨勢。按其實質，民意黨人是革命的民主派，而不是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們夢想什麼社會主義，可是他們「把真正的民主革命與空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或者把它們融合而成爲一體」（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五七頁，「社會主義和農民」。着重點是編者加的）。

〔七〕「民主共和國」。布爾什維克認爲當工人運動還沒有提出新的、最高的、蘇維埃形式的民主制以前，民主共和國可算是國家機構最好的形式，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作的階級鬥爭可以擴大起來；至於蘇維埃形式的民主制，可爲無產階級專政之國家形式，又可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之國家形式。列寧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說過：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底機關。至於必須修修改改我們的黨綱這個問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已經提出了，同時他又認爲要把關於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提到日程上去。

〔八〕此地是指法國一個社會主義者領袖米勒蘭說的，他以商務總長資格於一八九九年加入「共和派聯合內閣」，在這個內閣中任軍事總長之職的，就是屠殺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加利孚將軍。關於是否允許社會主義者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這個問題，在整個第二國際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各國機會主義者（在法蘭西，機會主義者以雷列斯爲首，而「雷列斯主義」便由此得名）證明這種參加是可以允許的；但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却認爲這是背叛社會主義底基本原則，並且提議把米勒蘭及其同道者從黨內開除出去。一九〇〇年社會民主黨國際大會關於這個問題通過了考茨基提出的居間的決議案，一方面斥責了米勒蘭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但他方面又承認社會主義者可以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如果社會主義的總長仍舊爲黨底全權代表時」。

〔九〕「俄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是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它分爲：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前者底內容是敘述工人運動終極的目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建設社會主義）；後者底內容是說明無產階級最近將來的要求，這些要求能在資本主義範圍中實現起來，而這些要求底目的，是消滅農奴制度底殘餘及排除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發展中的障礙物。在最低綱領中包括有下列的要求：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和不記名的選舉制，人身、言論、出版和集會等自由，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立法上保護勞動等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黨綱就沒有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這種劃分了，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八年）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底

新黨綱，當然也就沒有這種劃分了。

〔一〇〕列寧主要是指馬爾托夫的「工人政黨及其目前的任務——奪取政權」這篇論文。該文登在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日（十七日）「火星報」第九十三期上面。在該論文上面馬爾托夫對於臨時政府問題和參加臨時政府問題，是擁護馬爾丁諾夫、孟什維克底立場，而反對布爾什維克底路線。列寧在其「工人革命的民主專政」上面（「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九六——二〇二頁）批評了馬爾托夫底論文。

〔一一〕所謂「阿克雪里羅得（或盧森堡？）底過程組織論」，列寧是指「火星報」上許多論文（阿克雪里羅得底論文和當時還屬於孟什維克的盧森堡底論文）關於組織問題所發揮的孟什維克的見解。曾經有個時候，經濟派用自己的「過程策略」——即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產生出來的策略、尾巴主義的策略，去與列寧的有計劃的策略對立起來。恰為阿克雪里羅得和盧森堡一樣，他們把自己的不按一定計劃而在鬥爭過程中自然成立的組織原則去與列寧有計劃的組織原則對立起來。列寧稱它為「過程組織論」，列寧認為這個理論在組織問題上和經濟派在策略問題上一樣是尾巴主義，是機會主義。

〔一二〕列寧此地所說的「拿齊金」以及下面所說的「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是指拿齊金所領導的很小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自由社」，它產生於舊「火星報」時期中，存在時期很短。這個集團底見解是萬分糊塗的（參看列寧著的「做什麼？」第三章）。

〔一三〕列寧此地把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法國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相比較，前者結果是經過雅可賓的專政，用平民式的手段，消滅了封建的殘餘；後者結果是由自由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進行了無恥的妥協。

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一〕

一、工人運動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指導之下立即提起無產階級和警醒自由資產階級：這是一八九五——一九〇一和一九〇二年的事。

二、工人運動過渡到公開的政治鬥爭，並使自由資產階級、急進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之政治上覺醒了的階層，實行聯合起來；事在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

三、工人運動高漲成爲直接的革命；而自由資產階級已經團結成爲立憲民主黨並想採取與沙皇制度妥協的方法來停止革命；但急進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則傾向於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共同繼續進行一九〇五年（特別是年底）革命。

四、在自由派消極的等待和農民積極的幫助之下，工人運動在民主革命中得着勝利。加上急進的、共和派的知識界和類似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農民暴動得着勝利，地主政權概被破壞。

（「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的民主專政」）

五、在第三時期內等待的和在第四時期內消極的自由資產階級，現在變成直接的反革命了，並且組織起來來奪取無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所得的勝利果實。在農民中，全體富農和很大部分中

農都「聰明起來」，鎮靜起來，轉到反革命方面去，以便把政權從無產階級和同情無產階級的貧農手裏打下來。

六、在第五時期內所構成的關係基礎之上，新的危機和新的鬥爭，便發展和劇烈起來，此時無產階級已經爲保持民主勝利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假如歐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不來幫助我國無產階級的話，那末這個鬥爭對於俄羅斯單獨一國的無產階級是幾乎沒有希望的，而俄國無產階級也就要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正如一八四九至一八五〇年德國革命黨之失敗，或與一八七一年法國無產階級之失敗一樣。

因此，在這個階段上自由資產階級和富農（加上一部分中農）便組織反革命。而俄國無產階級加上歐洲無產階級則組織革命。

在此等條件之下，俄國無產階級可以獲得第二次勝利。此時事情已不是無希望的了。第二次勝利將爲歐洲社會主義的革命。

歐洲工人將告訴我們「怎樣去幹」；那時候我們就與他們共同去幹社會主義的革命。

作於一九〇六年初

註 釋

〔一〕列寧這篇提綱是在一九〇五年末或在一九〇六年初寫的。原文沒有標題，後來在一九二六年由列寧研究院編輯部加上標題爲「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發表出來。這些提綱之特殊的價值，就是在於他們把一九〇五年末革命已經經過的階段加以簡括的描寫以後，又指出在完全戰勝沙皇制度之下革命可能的發展前途。對於這個問題列寧在一九〇五年的許多論文中都提到了。讀者可以參看「兩個策略」一文。列寧又在「兩個策略」底「書後」上提出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可能的前途。他在那裏寫道：「現時革命完全的勝利就是民主革命底終結和社會主義革命決鬥底開始。目前農民要求之實現，反動勢力之完全撲滅，民主共和國之奪取，必然使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底革命性完全終結——也就是無產階級爲爭取社會主義的堅決鬥爭底正式開始。民主革命越充分，則這個新的鬥爭越迅速、越廣大、越清晰、越劇烈地發展起來。『民主』專政這一口號，正是表示出現時革命之歷史上的局限性，表示出有在新制度上進行新鬥爭，以謀工人階級完全脫離任何壓迫與任何剝削之必要。換句話說：當民主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再前進一步時，當不僅革命並且革命底充分勝利已成爲事實時，我們就要用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口號，即充分的社會主義革命口號去『代替』（這時候新的、未來的馬爾丁諾夫派也許要痛哭流涕了）民主專政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一八——一一九頁）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這篇論文上，又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立刻就要開始從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主張不斷革命的。」（『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頁。——着重點是編者加的）列寧這篇提綱第四第五和第六各條，恰恰是描寫這個「無間革命」的。這些提綱是十分簡略的，讀這些提綱時，必須要注意我們上面所指出的列寧底其他著作。尤其是要注意列寧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革命中關於國內無產階級底同盟者所說的話。此地我們把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本小冊子（一九一八年出版）上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告訴讀者：「首先與『全體』農民一起去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殘餘（因爲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然後，與最貧苦的農民、與半無產階級、與全體被剝削者一起去反對資本主義——鄉村財主、富農、投機商人也在其內，因爲革命已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一頁）

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托洛茨基把自己的「不斷革命」論與列寧對「無間革命」之可能行程的見解對立起來。托洛茨基這個理論是淵源於帕普斯底見解：俄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只能使無產階級握着政權（參看本冊「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文第四章和註〔一〕）。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這個理論又在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中間起了可恥的可

樣的作用。它就是他們否認在一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基礎。托洛茨基及其信徒經過這一理論，一步一步地從共產主義的營壘滾到共產國際底敵人、蘇聯共產黨底敵人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底敵人營壘中去，滾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了。托洛茨基從一九〇五年起把自己的「不斷革命」論恰恰和列寧底見解對立起來，他現在想藉欺騙讀者方法，以遮掩自己的墮落：現在他認定他的「不斷革命」論似乎和列寧關於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毫無重大的差別。一九三〇年他在其「不斷革命」（柏林出版）上面這樣斷定：從最初一九〇五年起，他這理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是與列寧理論相符合的」。但是列寧這篇提綱（「革命底階段、方向和前途」）以及我們上面所指出列寧底其他著作中的論述，恰恰證明托洛茨基這些斷語都是虛偽的。

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〇五年」序言上（第四——五頁）敘述其不斷革命論底實質如下：「恰恰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九日）事變和十月罷工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作者對於革命發生性質之見解，這些見解即名為「不斷革命」論。這個精妙名稱其意思就是：俄國革命目前直接的目的雖是資產階級的目的，但它是不能停頓在這些目的之上的。這個革命除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外，便不能解決自己最切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但是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以後，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底範圍來限制自己。剛剛相反，正為保障自己的勝利，在第一個時期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私有制並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先鋒隊不僅要和第一個時期幫助它作革命鬥爭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起仇視的衝突，並且要和幫忙它去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羣衆作仇視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落後國內，工人政府所處境地中所含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得到解決。因為歷史的必然性，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打破俄國革命有限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外殼，它勢必要打破這個革命民族的和國家的外殼，換言之，它應當自覺地努力使俄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底序幕。」

無論托洛茨基怎樣無恥地宣傳，在這個「新奇的理論」（列寧給的名稱）和列寧這篇提綱中所描寫的不斷革命道路之間，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這是再明顯不過了。

一、據列寧底意見，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不是自己單獨去奪取政權，而是和全體農民一起；在戰勝沙皇制度之後，它不是自己單獨去實現革命民主專政而是和全體農民一起。

二、據列寧底意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與農民共同去取得專政，他不是依據農民「政治上的落後」，

也不是依靠「農民底幻想」，而是依靠於領導自己的同盟者，提高其覺悟性，認為「農民反對地主土地佔有制和反對農奴制國家的鬥爭，是農民政治上的覺悟。」（「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三八五頁）

三、據列寧底意見，結果走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不斷革命底出發點，恰恰就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不是什麼特別的無產階級民主專政。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列寧底意見是如此，而在一九一七年，列寧底意見也是如此；在一九一七年當二月革命把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以蘇維埃形式而「特殊地」實現了，它又把這個專政與臨時政府資產階級專政錯綜起來，自此以後在四月間列寧就提出了工人階級底任務要走向無產階級專政。

四、據列寧底意見，無產階級底民主專政——（雖然說是一時的），一般說來都是不通的，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的專政。一九一七年十月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刻就是社會主義的專政了——不論托洛茨基怎樣地想——因為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雖然在這次革命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問題，尤其是消滅農奴制殘餘問題，起了最大的作用，十月革命把這些問題附帶地解決了，而解決這些問題只是「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底副產物」（列寧）。

五、據列寧底意見，如果像托洛茨基一樣主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專政，那末，這就是不可救藥地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實際上就是忘記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不明白了解，資產階級的（在俄國就是資產階級的、農民的）如何可以轉變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因此列寧批評托洛茨基及其「不斷革命」時說道：他的「基本錯誤」……「忽視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對於這個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問題，沒有明白的觀念。」（「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四頁「在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鬥爭底目的」）

六、據托洛茨基底意見，在由實現「基本的民主任務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專政」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在國內只能依靠「自己所有的力量」，而要與整個農民發生「仇視的衝突」。據列寧底意見，在由工農革命民主專政過渡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專政這一過程中，無產階級聯合鄉村貧民，而使中農中立。這一點在列寧選集提綱上面也可看到，從推翻沙皇制度之後，反對革命的鬥爭一開始就可以使鄉村貧民同情無產階級；在這個鬥爭開始時，反對無產階級的，有「很大部分」中農，在這個鬥爭終結時，站在敵人方面的中農只是「一部分」，換言之，「很大的部分」已經脫離仇視的地位。

七、據列寧底意見，要從革命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和農民共同專政）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專政（只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即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改造，無產階級須要西歐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之助力（列寧在第六條提綱上說，沒有它，則鬥爭是「幾乎沒有希望的」），但是，就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條件之下，列寧也沒有說，必定要有已經勝利的無產階級之「國家的助力」。他只是說到必需有西歐作戰的無產階級之助力，說到與他們為西歐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共同奮鬥，說到俄國和西歐同時開始社會主義革命之可能與適當的前途，但是無論在這篇提綱中，無論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好，他從來就沒有說過，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因為國內的仇視力量必然要陷於滅亡；他也沒有說過，如果我國無產階級先得了勝利，而西歐無產階級勝利受了阻礙，那末社會主義的改造也就沒有可能了。剛剛相反，列寧未作這篇提綱以前，他已經在「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這篇論文內寫道，在「城市的和鄉村的貧民」幫助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是可以鞏固起來的。列寧同時補充說，這種鞏固，「當然這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但是，第一，據列寧底意見，除了「城市和鄉村的貧民」幫助之外，最初中農是中立的，然後與中農聯合起來，此外列寧——與托洛茨基相反——始終認為中農是這樣一種社會集團或階級，它在客觀上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它能夠一步一步堅決地轉向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方面來（「聯合」）；第二，列寧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相當的」鞏固性，這就是指這樣一種鞏固性，它以國內力量對比關係為轉移，以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有無力量和有無能幹去引導半無產階級的和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為轉移。

無產階級這種能夠引導農與中農的力量與能幹，以及貧農與中農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底正確的與妥善施行的政策之下，而跟着無產階級跑的能幹，過去現在都被不斷革命論否認掉了。這種否認，就是托洛茨基主義最重要的一方面。在這一點（也與它一切觀點總和一樣）就是使托洛茨基主義成為孟什維主義的根源。在這些根源上生長出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及其終極的結論——「如無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的助力」，則在我國就沒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以及不斷革命論終極的政治結果——托洛茨基主義之過渡到反革命營壘中。

現在，托洛茨基宣稱他的理論「在一切重大的問題上都與列寧理論相符合」，這只是欺騙小孩的，欺騙政治幼稚者的話，欺騙他們不能分辨列寧主義和孟什維主義底變相——托洛茨基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一〕

在歐洲社會主義各種學說中間，馬克思主義現時已經獲得了充分的統治；爲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幾乎全是各社會民主黨指導的工人階級進行的。但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底這個充分統治，不是一下子就鞏固起來，而只是經過長期鬥爭，與一切落後的學說與一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作過長期鬥爭之後，才鞏固起來的。在三十年以前，馬克思主義連在德意志也還沒有得到統治的地位，當時在德意志佔優勢的，本來都是那些過渡的、混合的、折衷的搖擺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間的見解。而在拉丁民族諸國，如法蘭西、西班牙、比利時，當時在先進工人中間最流行的學說，就是蒲魯東主義、布朗基主義、無政府主義——這些顯然是代表小資產者（而不是無產者）底觀點。

近數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得到了這個迅速的和完全的勝利，究竟有什麼原因呢？現代社會主義全部的發展（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各被壓迫階級革命運動和鬥爭全部的經驗，均日益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各種見解是正確的。小資產階級之衰落，必定要使所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遲早歸於滅亡，而資本主義之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階級鬥爭之劇烈化，即爲擁護無產階級社會

主義思想的一種最好的鼓動。

俄國各種落後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牢不可破，這自然是因爲俄國底落後。最近二十五年來全部俄國革命思想史，就是馬克思主義與小資產階級民粹派社會主義作鬥爭的歷史。如果俄國工人運動之迅速發展和可驚的成就已經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也得到勝利，那末，在他方面，農民革命運動之發展——特別在一九〇二年在小俄羅斯的著名農民暴動（二）之後——遂使老朽凋零的民粹派學說有些復興的氣象。由歐洲的時髦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伯恩施坦派、馬克思底批評家）所刷新過的老朽的民粹派學說，就是所謂社會革命黨人根本的思想上的法寶。所以在馬克思主義者與清一色的民粹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爭論中，農民問題佔了中心的地位。

民粹派學說，在相當程度內是一種首尾一貫的學說。它否認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統治，否認工廠工人（整個無產階級底先進戰士）底作用；否認政治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底意義；鼓吹立刻根據村社及小農經濟來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在，雖然這種一貫的學說，已經只剩下一些殘餘與糟粕；但是我們如果要自覺地來研究現時的爭論，如果要使這些爭論不至成爲相互的謾罵，那我們就必須時時注意到：社會革命黨人所有的迷誤，都有其一般的、根本的、民粹主義的根源。

民粹派曾經認定：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農夫。他們這種見解，是由於迷信村社的社會主義性和不信資本主義底命運而必然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認定，俄羅斯將來的主人，就是

工人，而俄國農業和工業中資本主義之發展，正是日益證實馬克思主義這個正確的見解。在俄羅斯，工人運動現在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了，而關於農民運動呢，則民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間全部的分歧，還是在於他們對於這個運動，有兩個彼此對立的見解。在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正是駁倒馬克思主義；農民運動正是直接的社會主義的運動；農民運動恰恰是不承認任何資產階級的政治的自由；農民運動恰恰是不以大農業，而以小農業爲出發點的。總而言之，在民粹派看來，農民運動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直接的社會主義的運動。民粹派對農民村社的迷信以及它的無政府主義，完全可說明他們得出這些結論的必然性。

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運動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民主主義的運動。農民運動在俄羅斯也是（與其他各國過去一樣）民主革命必然的伴侶，而按其社會經濟內容說，民主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農民運動絕不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底基礎，絕不反對商品經濟，絕不反對資本。正是相反，農民運動是反對鄉村中舊的、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前期的關係和反對地主的土地佔有制——農奴制度一切殘餘之主要柱石。因此農民運動完全的勝利，不剷除資本主義，恰恰相反，它造成資本主義發展更廣泛的基礎，使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迅速起來和劇烈起來。農民暴動完全勝利，只能造成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城垣；在這共和國內，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第一次最純粹地擴大起來。

這樣一來，就有了兩種正相反的見解，所有願意研究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原則上的

分歧的人應當明白地了解這兩種見解。一種見解，認爲農民運動，是社會主義的運動，另一種見解，認爲農民運動，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從這裏可以知道，當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千回百遍地責備（例如「革命俄國報」第七十五期）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忽視了」（不願意知道）農民問題，實在是非常愚昧的瞎說（三）。要反對這種大愚昧，方法只有一個：重複淺明的道理，敘述舊的徹底民粹派的見解，千回百遍地指出真正的差別不在於願意不願意顧到農民問題，亦不在於承認或忽視農民問題，而在於對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和現時的農民問題有不同的估計。第一，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誰就是一團愚昧，因爲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切主要的著作，從普列漢諾夫著的「我們的意見分歧」起（本書已在二十多年以前出版了）主要地是詳細說明民粹派對於俄國農民問題見解底錯誤。第二，誰說馬克思主義者「忽視了」農民問題，這就是證明他不願意充分估計真正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現時的農民運動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運動呢，抑或不是呢？這種運動按其客觀的意義說，是要反對農奴制度殘餘呢，抑或不反對它呢？

對於這個問題，社會革命黨人從來沒有、而且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白的和確切的回答；因爲他們對於俄國農民問題的見解，是徘徊於舊民粹派的見解和現時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之間，糊塗到不可救藥。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把社會革命黨人叫做站在小資產階級觀點上的人（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正因爲他們對於農民運動底估計不能脫離小資產階級的自欺，民粹派的幻想。

因爲這樣，所以我們有重複解說最淺明的道理的必要。俄羅斯現時的農民運動所定的趨向是

什麼？即求得土地和自由。這個運動完全的勝利，將有什麼意義？得到了自由，它就排除地主和官吏在國家管理中的統治。得到了土地，它就把地主的土地轉給農民。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強奪地主所有的土地）是否能消除商品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是否能消除在村社土地上或在「社會化了的」土地上的私有農民經濟？不能消除的。最圓滿的自由和最圓滿的掠奪地主，能否消除在多馬的多牛的富農和僱農、短工之間，即在農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深刻的鴻溝？不能消除的。正是相反，上層階級（地主）受摧殘和消滅越圓滿，則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差別越深刻。農民暴動圓滿的勝利有什麼客觀的意義呢？這個勝利是徹底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而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不是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社會裏富人和窮人分立的現象，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立的現象。現時的農民運動何以就是民主的資產階級的運動？因為它要消滅官吏和地主政權，建立民主社會制度，同時，並不改變這個民主社會底資產階級的基礎，不消滅資本底統治。覺悟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於現時的農民運動，應抱何種態度？他們應當擁護這種運動，最努力地幫助農民，最徹底地幫助農民把官吏政權和地主政權完全推翻。但是他們同時應當向農民解釋道，只推翻官吏和地主政權還是不夠。推翻這個政權以後同時又應準備去消滅資本底政權，資產階級底政權，要消滅後者底政權，應當立即充分地鼓吹社會主義的學說即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且聯合、團結和組織農村的無產者，以便與農村資產階級以及與俄國全體資產階級作鬥爭。自覺的工人爲要推進社會主義的

鬥爭，是否可以忘掉民主主義的鬥爭，或者在參加民主主義鬥爭時，是否可以忘掉社會主義的鬥爭呢？不，自覺的工人之所以自稱為社會民主派，正是因為他已經懂得這兩種鬥爭中間的相互關係。他知道，除了經過民主主義，經過政治自由，便沒有旁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他趨向於圓滿的和徹底的實現民主主義，爲的是要達到終極的目的——社會主義。民主主義鬥爭底條件和社會主義鬥爭底條件何以不相同？因爲在前一種和後一種鬥爭中，工人底同盟者必定是不一樣的。在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時，工人是與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與小資產階級一起，而在進行社會主義鬥爭時，工人則要反對全體資產階級了。工人在進行反對官吏與地主的鬥爭時，他可以並且應當與全體農民甚至富農中農一起。而在他與資產階級亦即與富農作鬥爭時，他却只能與農村無產階級一起才是可靠的。

如果我們一回想起馬克思主義這些淺顯的真理（這些真理，都是社會革命黨人始終不願去研究的），則我們就很容易去估計社會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下列的「最新的」反駁。「革命俄國報」第七十五期寫道：

「何必要先幫助一般『農民』去反對地主，然後（即是同時）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一般『農民』，而不立即幫助無產階級去反對地主呢？要馬克思主義幹麼？只有上帝一人知道。」

這是最原始的、最幼稚的無政府主義底觀點。人類在許多世紀以前，甚至在許多千年以前，老早已經幻想過「立即」消滅所有一切的剝削。但是，直至千百萬被剝削者沒有在世界上聯合起

來，作穩固的、堅決的、各方面的鬥爭，把資本主義社會改變過來而使其走上這個社會本身進化應走的方向去以前，所有這些幻想，仍舊不過是一些幻想罷了。只是當馬克思底科學社會主義將要求改造的志向與一定階級底鬥爭聯繫起來的時候，才將社會主義的幻想，變成了千百萬羣衆底社會主義的鬥爭。除階級鬥爭以外，所謂社會主義只是空話，或是幼稚的幻想。在俄羅斯我們看到有兩種不同的社會力量作兩種不同的鬥爭。無產階級在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地方（告訴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這些關係，甚至於在農民村社內，即他們認爲是什麼「社會化了的」土地上，也是有的），便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農民是小的土地佔有者，是小資產者，他進行反對一切農奴制殘餘、官吏和地主的鬥爭。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經濟學和世界革命史的人，才會看不見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用「立即」二字做話柄來抹殺這兩種戰爭中的差別，這無異於掩躲在被褥下面，不肯對實際形勢加以任何的分析。

社會革命黨人失掉了舊民粹派見解底一貫性，甚至連民粹派本身底學說內許多東西都忘記了。在「革命俄國報」同一期上又寫道：「列寧先生說要幫助農民去剝奪地主，這樣，他便不自覺地要在多少已經發展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業廢墟上，幫助小資產階級經濟鞏固起來。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上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嗎？」

先生們！你們實在可恥！你們實在忘記了自己的B·B·先生！你們要讀一讀他著的「資本主義底命運」，讀一讀H·OH先生著的「概論」(四)和你們那些先哲底其他著作吧。你們讀

了這些著作後，你們便可以回想到，俄羅斯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那時候你們可以知道俄國還有工役制的經濟——賦役制直接的殘餘。假使你們再去看那本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資本論」第三卷，那末你們從那裏可以知道，賦役經濟之發展及其變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除了經過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經濟以外，無論何地都不會有過並且也不會有。爲要咒罵馬克思主義，你們使用已經太單純的老早被人揭破了的方法：你們硬以滑稽的單純化的見解，去附會馬克思主義，大的賦役制經濟直接過渡到大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你們的議論就是：地主經濟底收穫量高於農民經濟底收穫量，所以剝奪地主乃是退一步。這種議論只是四年級的中學生才會有的。先生們！請想一想，在農奴制度崩潰時，把收穫少的農民土地與收穫多的地主的土地劃分開來，這豈不是「後退一步」嗎？

俄羅斯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現時農民與地主的鬥爭，按其客觀的意義來說，就是農民與農奴制殘餘的鬥爭。但是如果企圖把一切單獨的情形都一一計算出來，把每個單獨的情形都權衡出來，用藥房的天秤絲毫不錯地決定：何處是農奴制底終點，何處是純粹的資本主義底起點，這無異於把自己所有的學究氣概去誘諸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不能一一計算出，從小商人手裏買來的食物價格中，哪一部分是勞動價值所構成，哪一部分是榨取所構成等等。先生們，這是否可以說，應當拋棄勞動價值論呢？

現時的地主經濟，包含有資本主義的和農奴制的特點。只有學究先生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

說，我們的義務就是在每種單獨的情形之下一點一滴地權衡、計算和寫明其一定的社會性質。只有空想家才能從這裏做出結論說，我們「用不着」辨別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戰爭。其實從這裏只能做出這個獨一無二的結論：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和自己的策略中，應當把反對資本主義的純粹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與反對農奴制的一般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聯合起來。

在現時地主的半農奴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發展得越厲害，則現在對於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的必要便越加迫切，因為在每次實行沒收的時候，純粹資本主義性的或純粹無產階級性的衝突，便越是迅速地暴露出來。在地主的經濟中資本主義的特點越厲害，則民主主義的沒收便越加迅速地引起真正的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則藉助於「社會化」一詞而產生的民主革命底虛偽的理想化，便越是危險。從地主經濟裏資本主義與農奴制互相混合這一事實上所應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如此。

這樣一來，要把純粹無產階級的鬥爭與一般民主主義的鬥爭聯合起來，但不要把這兩種鬥爭混合起來。要幫助一般的民主主義的與全體農民的鬥爭，絕不是與這種非階級的鬥爭溶和起來，絕不是用「社會化」一類的假話把它理想化起來，絕不是一刻忘記組織城市和農村無產階級而成爲完全獨立的階級的社會民主黨。這個黨徹底幫助最堅決的民主主義，但它決不受那種想在商品經濟下造成「平均性」的反動幻想與嘗試所迷惑，而離開革命的道路。農民與地主間的鬥爭現在是革命的，沒收地主的土地在此刻經濟和政治的進化中一切關係上都是革命的，所以我們要幫助

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的辦法。但是如果認爲這個辦法是「社會化」，以爲在商品經濟下有「平均」土地使用的可能而自欺欺人，那便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我們要把這種空想送給社會黨人的反動派去。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月）

註釋

〔一〕列寧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時代，如在舊「火星報」時代一樣，除了作反對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的愚潮的鬥爭外，同時又實行與社會革命黨所代表的民粹主義作鬥爭。一九〇五年社會革命黨人在城市和鄉村小資產階級的知識界中是很爲著名的。他們在羣衆中也發展了一些工作，而他們在農民羣衆運動區域農民裏面的影響是很大的，而在工人當中也有小小的影響，主要地是在社會民主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內革命派，布爾什維克派組織薄弱的地方。如果孟什維主義趨向於使工人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底利益——孟什維主義當時在客觀上已經盡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代辦人底作用，那末社會革命黨人趨向於使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混合起來，破壞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因此他們在客觀上就使農民運動去服從資產階級底領導，因爲農民沒有無產階級領導，必然要跟着資產階級跑。這樣看來，在無產階級爲爭取農民，爲爭取對農民的領導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社會革命黨人也是起了資產階級代辦人底作用。他方面社會革命黨是農國內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標本式的政黨，可是社會革命黨人使自己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戴上社會主義的假面具，挖去社會主義階級的內容。他們以一般地「勞動人民」、「勞動階級」來代替工人階級，他們無論工人也好，「勞動人民」也好，「勞動知識界」也好，統統一樣算爲「勞動人民」。他們因爲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階級內容沒有明白的了解，所以他們把前一種革命和後一種革命混淆起來，他們把第一次革命時期內

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看成與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一樣。在農民爲土地的鬥爭中，爲平分土地的鬥爭中，他們提出一個任務：把土地變爲「全體人民底財產」而把土地在「勞動者」中間平均分配，他們就稱這種辦法爲「土地社會化」。列寧認爲在工人階級前面揭破社會革命黨人這個「社會化」小資產階級的實質，是在他反對社會革命黨人鬥爭中的任務之一。同時列寧又特別指出，隱藏於社會主義言詞之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既然是反對地主和地主專制制度，那末它也就有自己的長處，有革命的意義。

(二) 從一九〇二年春天起，俄國許多省份都發展了農民革命暴動的風潮。發展最甚的是南方各省——哈爾科夫、坡爾塔瓦以及薩拉托夫，這些地方除了一般的原因（東總剝削制度之統治，隨資本主義剝削之增加而向前發展的鄉村階級鬥爭劇烈化，日益發展的城市工人運動之影響等等）又有地方性質的原因，例如劇烈的災荒，使農民本來的痛苦地位更加惡化起來。在坡爾塔瓦和哈爾科夫二省之內，破壞了一百餘個大地產。一九〇二年春天，農民暴動總數已達到三百四十次之多。

政府對付農民是極端殘酷的，在每次農民鬥爭中都派了軍隊去鎮壓，笞杖之刑，大用特用；土地家——即參加了土地運動的農民，充滿了監獄。

(三) 這裏列寧一部分是指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革命俄國報」（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第七十五期底社論——「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農民問題」。這篇社論是專門評論列寧底「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所抱的態度」（「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一——一八八頁）。這篇論文的社論上寫道：「曾經有個時候，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果然是忽視了農民問題……農民……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是無數反動小資產階級分子之一。」

(四) 列寧此地所提到的B·B·(瓦隆錯夫)和H·I·OH(達尼爾遜)底書籍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民粹派著名代表底作品。前一本書名爲B·B·著「俄國資本主義底命運」，是在一八八二年出版；後一本書名爲H·著「俄國改革後經濟概論」，是在一八九三年出版。這兩本書雖其出版時間先後不同，但兩個作者許多單個的見解，關於俄國經濟發展問題，彼此都是企圖證明俄國資本主義沒有前途。

俄國革命開始了

日內瓦，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日）星期三

在俄國發生着最偉大的歷史事變。無產階級已實行起義來反對沙皇制度了。無產階級已被政府激怒到實行起義了。政府因希望把事變引到運用武力，所以才故意讓罷工運動比較無阻礙地發展起來，讓廣大的示威運動比較無阻礙地開始起來，這到現在未必是可懷疑的了。而政府的確已把事變引到了這個地步！死傷成千，這就是彼得堡一月二十二日（九日）流血星期日的總結。軍隊戰勝了手無寸鐵的工人、婦女和兒童。軍隊射擊了倒在地下的工人，而把敵人打敗了。「我們給了他們一個好教訓！」，現在沙皇的奴僕和他們在保守派資產階級中的歐洲式的走狗都無恥已極地這樣說着。

是的，教訓是很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不會忘記這個教訓。工人階級中最無經驗的、最落後的階層會天真爛漫地相信沙皇，並誠意希望和平地把飽受苦難的人民底請求交給「沙皇本人」，——所有這些階層都從沙皇或沙皇叔父烏拉基米爾大侯爵所指揮的武力方面受到了教訓。

工人階級受到了國內戰爭底偉大教訓，無產階級所受的革命教育在一天內前進了這樣的一大

步，是在平凡、通常、閉塞生活中幾月幾年所不能走到的。英勇的彼得堡無產階級所發出的「自由毋寧死！」的口號得到全俄各地的響應。事變發展得驚人迅速。在彼得堡的總罷工日益增長起來。全部工業生活、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被麻痺了。在星期一，一月二十三日（十日）工人和軍隊的衝突更加激烈。正與虛假的政府消息相反，在京城許多許多區域都流着鮮血。戈耳坪諾的工人起來了。無產階級正在武裝自己，並武裝人民。傳說工人佔據了曳斯托羅列茨克軍械庫。工人儲備手槍，把自己的工具鍛成武器，搜集炸彈，來進行爭取自由的拚命鬥爭。總罷工蔓延到了外省。在莫斯科已有一萬人罷工。並已決定明天（星期四，一月二十六日（十三日））宣佈莫斯科總罷工。在里加爆發了騷動。在洛茲工人遊行示威，在華沙準備起義，在赫爾森福斯發生了無產階級底示威運動。在巴庫、敖德薩、基輔、哈爾科夫、科夫諾和維爾諾，工人底不滿正在增長，罷工正在擴大。在塞瓦斯托坡里海軍部所轄的倉庫和兵工廠被焚燬，而且軍隊拒絕射擊起義的海軍兵士。在列維里和薩拉托夫發生了罷工。在拉多姆工人及後備軍兵士同軍隊發生武裝衝突。

革命日益增長着。政府已開始徘徊起來。政府企圖從血的壓迫政策過渡到經濟的讓步，企圖用九小時工作制的小惠或口惠來脫身了事。但是，流血星期日底教訓是不會空過的。已起義的彼得堡工人底要求——立刻根據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選舉制來召集立憲會議——應當成爲一切罷工工人底要求。立刻推翻政府——這就是甚至曾相信沙皇的彼得堡工人用來答覆對一月九日

屠殺的口號，他們會借他們的領袖加邦牧師的口來作回答，加邦在流血星期日後曾說過：「我們再沒有沙皇了。血河已把沙皇和人民分開來了。爲自由而鬥爭萬歲！」

我們要說，革命的無產階級萬歲！總罷工掀起和動員着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中日益廣泛的羣衆。武裝人民成爲革命時局最近任務之一。

只有武裝的人民才能成爲人民自由的真正長城。而且，無產階級能武裝得愈迅速，無產階級堅持其所站的罷工者——革命者的陣地愈久，則軍隊就會愈快地動搖起來，在兵士中間愈會出現更多的人們，終究會懂得他們自己幹着什麼，而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專制魔王、反對暴君、反對那些屠殺手無寸鐵的工人及其妻室兒女的兇手。不管彼得堡本地現時的起義怎樣結局，但它無論如何都必然而不可避免地會成爲走向還更廣泛、更自覺、更有準備的起義的第一個階段。也許政府能做到推延清算的時間，可是，這種推延只會把革命進攻底下一步驟變爲更加規模宏大的。這種推延只會被社會民主黨利用來團結有組織的戰士隊伍和傳播關於彼得堡工人首倡的消息。無產階級將離開工廠，準備自己的武器來參加鬥爭。爲自由而鬥爭的口號將日益廣泛地傳播到城市貧民中，到千百萬農民中去。革命委員會將在每個工廠中、每個城區中、每個比較大的鄉村中建立起來。起義的人民會起來推翻沙皇專制制度所有一切政府機關而宣佈立刻召集立憲會議。

立刻武裝工人和全體公民，準備和組織革命力量來消滅政府權力和政府機關，這就是所有一切革命者可能並且應當以之爲根據而聯合起來實行總攻擊的實踐基礎。無產階級無論何時都應當

走自己的獨立道路，而不削弱其與社會民主黨的聯系，並記住其偉大的最終目的是要替全人類解除任何剝削的。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黨底這個獨立性無論何時都不會使我們忘記在現時革命關頭總的革命攻擊的重要性。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可能而且應當不管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者而獨立前進，來保持無產階級底階級獨立性。但是，在起義時，在給沙皇制度以直接打擊，在抵抗軍隊，在攻擊全體俄國人民死敵底巴士底獄時，我們應當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者手携手地前進。

現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都以熱烈萬分無可忍耐的情緒望着全俄無產階級。我們工人階級所英勇首倡的推翻在俄國的沙皇制度，將是全世界歷史底轉變關頭，將使全球各國家，各民族所有一切工人底事業輕易起來。讓每個社會民主黨人，每個有覺悟的工人都記着他現在擔負着怎樣最偉大的全民鬥爭任務。讓他莫忘記，他同時也還代表着全體農民、全體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全體人民底需要和利益而反對全體人民底共同敵人。現在，在一切人們底眼前屹立着彼得堡無產者——英雄的模範。

革命萬歲！

起義的無產階級萬歲！

一九〇五年一月

兩個策略

自從在俄國發生羣衆的工人運動的最初時起，即已近十年的過程中，在社會民主黨人中存在有策略問題上的深刻的意見分歧。大家知道，在九十年代後半期中正是由於這類的意見分歧產生了經濟主義，而其結果使黨分裂爲機會主義派（工人事業派）和革命派（舊火星派）^①。可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是比西歐機會主義有其不同的特點。俄國機會主義會是非常明顯地反映出黨內知識分子派底觀點，或者可以說，反映出這個知識分子派沒有任何獨立的觀點，它既沉迷於伯恩施坦派底時髦字眼，也沉迷於純粹工人運動底直接結果和形式。這種沉迷，就使得合法馬克思主義者^②底紛紛叛變而投到自由主義方面，又使得有些社會民主黨人造出有名的「過程策略」的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的機會主義者得有永傳不朽的外號——尾巴主義者。他們一籌莫展

① 關於九十年代後半期中的經濟主義，工人事業派和舊火星派，請參閱本書第一冊中各文，特別是「做什麼？」一書。——俄文版編者註

② 關於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請參閱本書第一冊中所載「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和司徒盧威先生著作中對民粹主義的批評」一文。——俄文版編者註

地跟着事變尾巴跑，從這一極端跳到另一極端，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削弱革命無產階級活動底範圍和對於它的力量的信任，而且，大都通常藉口於無產階級底自動性來掩蓋所有這一切。這是奇談，但這是事實。沒有人像工人事業派這樣嘵嘵不休地談論着工人底自動性，也沒有人像工人事業派這樣以自己的說教來縮小、削短、降低工人底自動性。「請你們少講些什麼『提高工人羣衆積極性』的話吧」——有覺悟的、先進的工人向其熱心的、可是不聰明的忠告者說。——「我們有的積極性比你們所猜想的要多得多，我們甚至對於絕對不能盼望有『具體結果』的要求，都善於用公開的街道上的鬥爭來加以擁護。並且不是你們可以來『提高』我們的積極性，因為你們自己的積極性恰恰就不夠。先生們，請少崇拜些自發性，多去想一想提高自己的積極性吧！」你看，會需要怎樣來形容革命工人對機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態度（「做什麼？」第五五頁）。

新「火星報」向「工人事業」雜誌倒退兩步，又使這種態度復活起來。在新「火星報」底篇幅上又充滿着尾巴主義的說教，並同樣是用這樣令人作嘔的誓詞掩蓋着：上帝呵！我是真正虔誠信奉無產階級自動性的呵！藉名無產階級底自動性，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丁諾夫，馬爾托夫和李伯爾（崩得分子）曾在代表大會上擁護大學教授和學生有權掛名為黨員，而不加入黨底任何一個組織。藉名無產階級底自動性而杜撰出辯護破壞組織行為和褒揚知識分子無政府主義的「過程組織」論。藉名無產階級底自動性而發明了把那經過三級選舉所精選出來的工人代表與地方自治局紳董們訂立的關於不引起驚惶害怕的和平示威運動的協定，作為「高等形式示威運動」的同樣著名

的理論。藉名無產階級底自動性而把武裝起義底思想曲解了，庸俗化了，貶削了，弄得糊塗不堪了。

因爲最後這個問題具有巨大的實踐上的重要性，我們特意要使讀者來留意這個問題。工人運動底發展尖刻地嘲笑了那些新「火星報」底才子們。新「火星報」底第一封信還沒有來得及分送到俄國各地，在這封信中藉名「有計劃地發展無產階級底階級自覺和自動性的過程」而主張「把工人底聲明書郵寄到地方自治局代表們家裏去，並把大批聲明書拿到地方自治局會場中去散發」，作爲高等形式的示威運動；——它的第二封信還沒有來得及送到俄國，在這封信中更有已經是完全令人目瞪口呆的新發明，說什麼在現時「歷史時期，政治舞台已被有組織的資產階級和官僚間的角逐所充滿！」，什麼「任何（聽呵，聽呵！）下層革命運動底客觀意義只有一個（！），就是歸結到擁護在這兩個（！！）勢力中的那個利於破壞現有制度的勢力所提出的口號」（竟把民主主義的知識界宣佈爲「勢力」了）；——有覺悟的工人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這兩封美妙絕倫的信和好好地將它們嘲笑一頓，而真正無產階級鬥爭的事變馬上就已把新「火星報」政論家們這種全部政治廢物拋到垃圾堆去了。無產階級表明了還有第三個（當然，其實不是第三個，而是按次序來說是第二個，按戰鬥能力來說是第一個）勢力，這個勢力不僅利於破壞專制制度，而且決心着手來實行真正破壞專制制度。從一月二十二日（九日）起，我國工人運動很快就長成爲人民起義。

且來考察一下，那些曾把起義當做策略問題預先來討論過的社會民主黨人怎樣估計了進到起義的這個過渡——而工人自己又怎樣已在實際上解決着這個問題。

請看，在三年以前在論起義是決定我們最近實踐任務的口號時怎樣說的吧：「就拿人民起義來講吧。大概現在大家都會同意，我們應當想到起義和準備起義。但是怎樣準備呢？當然不是由中央委員會指定特派員到各地去準備起義吧！即使我們就有中央委員會的話，在現時俄國條件下，它用這種指定的辦法也是不會得到絲毫結果的。恰恰相反，在創辦和發行共同報紙的工作上自然形成起來的代辦機關網，不應當『坐待』號召起義的口號，而正是應當進行這樣的經常工作，這種工作會保證這個代辦機關網最可能在起義時獲得成功。正是這種工作會鞏固起既與最廣大工人羣衆，又與不滿意專制制度的各階層的聯系，而這一點對於起義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這個工作上鍛鍊出正確估計一般政治形勢的能力，因而就是選擇起義底適當時機的能力。正是這種工作會訓練所有一切地方組織同時起來響應同樣一些驚動全俄的政治問題和政治事件，盡可能積極地，盡可能一致地和適當地來回答這些事件，——須知起義在實際上就正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最積極、最一致和最適當的『回答』哩。最後，正是這種工作會訓練俄國各地一切革命組織建立那造成黨底實際統一的最經常而又最秘密的聯系，——沒有這樣的聯系就不能集體討論起義計劃和採取那應當嚴守秘密的在起義前夜所必需的準備辦法。

「總而言之——『全俄政治報計劃』不僅不是那些沾染了學理主義和文人習氣的人們之書房工作的果實（如那些沒有對它仔細思索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恰恰相反，它是最切實的計劃，從各方面和立刻開始準備起義，同時一刻不忘記其日常迫切工作的最切實的計劃。」（「做什麼？」）

我們加上了着重點的結語，對於革命社會民主黨又怎樣設想準備起義工作的問題給了明顯的「回答」。但是，不管這個回答是怎樣明顯，舊的尾巴主義策略還是不能不也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馬爾丁諾夫在最近出版了爲新「火星報」第八十四期所特別介紹的小冊子：「兩個專政」。作者以其工人事業派的心懷表示憤慨地說道，而列寧竟敢於說出什麼「準備、指定和進行全民武裝起義」呀。威風凜凜的馬爾丁諾夫衝殺敵人說：「國際社會民主黨根據歷史經驗和對於社會力量發展過程的科學分析，向來都認爲只有宮廷政變和軍事政變才能預先指定和有成效地按預定計劃來進行的，正是因爲這些政變不是人民革命，即不是社會關係底變革，而只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更迭。社會民主黨向來到處都認爲人民革命是不能預先指定的，人民革命不是人爲地製造出來的，而是自行發生的。」

也許讀者在讀過這套空論以後會說，馬爾丁諾夫顯然「不是」一個嚴重的反對者，拿他來嚴重看待是未免可笑的。我們會完全同意這樣的讀者。我們甚至會向這樣的讀者說，在天地間沒有比較把我們新火星派底一切理論和一切議論拿來嚴重看待更痛苦些的事情。不幸的是，這套無聊的話也發現於「火星報」底社論上（第六十二期）。更大的不幸是，在黨內竟有人，且有不少的人，拿這些無聊話塞滿自己的腦袋。於是我們就必得來說及嚴重的東西，如同必得說羅莎·盧森堡所發明的「過程組織」的「理論」一樣。必得向馬爾丁諾夫解釋，不要把起義和人民革命混爲一談。必得說明，在解決關於推翻俄國專制制度的實際問題時而這樣深思地援引到社會關係的變革的，只有奇發·莫奇耶維契（一）一類人才說得出來。這種變革，在俄國從農奴法制崩壞時起就已

開始了，且正因為我國政治的上層建築落後於在社會關係中已實現了的變革，就使上層建築底傾倒成爲不可避免的，而且，完完全全有可能由於一個打擊而一下子傾倒，因為俄國的「人民革命」已給了沙皇制度一百次的打擊，而將它打死的會是第一百零一次的打擊或是第一百一十次的打擊，這是不可知道的。只有那些把自己的庸俗主義推到無產階級身上的機會主義知識分子才能在討論怎樣給以第二百次打擊中的一次打擊的實際方法時而表揚自己對於「社會關係變革」的學生知識。只有新「火星報」底機會主義者才能對於那種將其重心放在——如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藉助於政治報紙來進行各方面羣衆鼓動上的計劃，瘋狂地高喊着什麼可怕的「雅可賓式的」計劃！

說人民革命是不能指定的，這是正確的。馬爾丁諾夫和「火星報」第六十二期上社論的作者竟能知道這一真理，這是不能不予以誇獎的（馬爾丁諾夫底忠實戰友或學生在該社論上攻擊「烏托邦主義者」時，問道，「而且一般說來，我們黨可以談到什麼起義準備呢」）。但是，說到指定起義時，則如果我們真正準備了起義和如果因在社會關係中實現了的變革而使人民起義成爲可能時，則指定起義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事情。且試用最簡單的例證來爲新火星派把這個問題解釋一下吧。可否指定工人運動呢？的確是不可以的，因為它是由社會關係變革產生出來的成千的個別行動所構成的。可否指定罷工呢？是可以的，雖然——馬爾丁諾夫同志呵，真是這樣哩，——雖然每個罷工都是社會關係變革底結果。在什麼時候可以來指定罷工呢？當指定這個罷工的組織或小組在這些工人羣衆中有影響，且善於正確估計在工人羣衆中不滿和憤怒增長的時機時就可以指

定罷工。馬爾丁諾夫同志和「火星報」第六十二期「社論作者」同志，現在懂得了是怎樣一回事麼？如果懂得了的話，那末，就請費力把起義與人民革命比較一下吧。「人民革命是不能預先指定的」。而起義則是可以指定的，如果指定起義者在羣衆中有威信，且善於正確估計時機的話。

可幸的是，先進工人底自動性却是遠超於新「火星報」底尾巴主義哲學之上。當它統盡腦汁想出那證明起義是不能由那些組織革命階級先進隊伍來準備起義的人們所指定的理論時，事變却已表明了，起義是可能由甚至沒有準備的人來指定的，而且有時他們迫不得已來指定它。

請看彼得堡同志寄給我們的宣言吧。這份宣言是那些在一月十日在彼得堡佔領了一個公開印刷局的工人們自己排印和散發了一萬份以上的。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公民們！昨天你們看見了專制政府底凶惡暴行！看見了流滿街道的鮮血！看見了成千成百被打死了的爲工人事業而奮鬥的戰士，看見了死屍，聽到了成千成百被打傷了的婦女和不能自衛的兒童底哀號！工人底鮮血和腦汁濺滿了他們親手鋪砌的街心。究竟誰把軍隊和槍砲子彈指向於工人底胸膛呢？——這就是沙皇、王公、大臣、將軍和一般宮廷惡徒。

他們是殺人兇犯！——宣佈他們的死刑吧！同志們，拿起武器來，佔領兵工廠、軍械庫和軍器店。同志們，打毀牢獄，解放爭取自由的戰士。打毀憲兵局和警察署以及一切官廳機關。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革命萬歲！國民代表立憲會議萬歲！——俄國社會民主黨。

這一小羣倡首的先進的工人對於起義的號召，却是沒有成功的。幾次沒有成功的對起義的號召或幾次沒有成功的對起義的「指定」是不會使我們驚奇，不會使我們喪氣的。對於這一問題，我們且讓新「火星報」去談論什麼必需有「社會關係的變革」和大言不慚地去責斥那些高喊「建立自己政府」的工人們底「烏托邦主義」吧。只有無可救藥的迂儒或糊塗蟲才能認為這個宣言底重心是在這個口號上。對於我們重要的是指出和着重指出這個對於解決現在擺在我們眼前任務的美妙的、大胆的、實踐上的開端。

彼得堡工人底號召不會實現起來，而且也不能實現得如他們所想的那樣快。這個號召還會不止一次地重複着，而起義底企圖也可能不止一次地遭受挫折。可是，工人自己提出這個任務的事實本身就已有巨大的意義。工人運動已引進到覺悟這個任務在實踐上的迫切性，並使得要在任何一個人民激動時都把這個任務提到最近日程上，——工人運動所造成的這個成果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從無產階級方面奪去的了。

社會民主黨人還在三年以前就已根據一般的思考而提出了準備起義的口號。無產階級底自動性又在國內戰爭直接教訓影響之下前進到了這個口號。有各種不同的自動性。有革命倡首的無產階級底自動性，也有不發展的、須要撐持的無產階級底自動性，有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底自動性，也有祖巴托夫底自動性。而竟有這樣的社會民主黨人，甚至在現時還以恭敬虔誠的態度來觀賞正是這個第二種的自動性，這些社會民主黨人以爲千百次重複着「階級的」這幾個字，就可

以推脫對於目前迫切問題的直接回答。且拿「火星報」第八十四期來看吧。「爲什麼——「火星報」底「社論作者」以得勝的神情來攻擊我們說，——爲什麼給這個決堤洪流（一月九日）以推動力的不是狹隘的革命職業家組織而是工人會社呢？因爲這個會社是真正（聽呵！）廣泛的、基於工人羣衆自動性上的廣泛組織。」如果這句古範語句底作者不是馬爾丁諾夫底信徒的話，那他也許會懂得其所以這個會社能有助於推動革命無產階級的原因，正是由於這個會社已從祖巴托夫底自動性過渡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底自動性（過此後，這個會社馬上就不能公開存在了）。

如果新火星派分子或新工人事業派分子不是尾巴主義者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看見，正是一月九日的事變，證實了那些人們底預言，這些人們曾說過：「工人運動底合法化終究會正是有利於我們，而不是有利於祖巴托夫輩。」（「做什麼？」）正是一月九日的事變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了，在該書上所提出的任務底全部重要性，這個任務就是：「要準備這樣的割禾手，這些割禾手既善於割今天的莠草」（即是麻痺今天的祖巴托夫派的誘惑作用），「也善於割明天的麥子」（即是以革命精神來領導那藉合法化而前進了一歩的運動）。而新「火星報」底傻子却藉口於麥子收成底豐饒來降低革命割禾手堅固組織底意義！

這個新「火星報」社論作者繼續說，「如果擾亂革命底後方」，那就是犯罪的行爲。這句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真是天知道。關於這句話與新「火星報」一般的機會主義面目有怎樣聯系的問題，我們，大概在下一次要來特別說說。現在只要指出，這句話的真正政治意義只有一個，就是：社

論作者諂媚着革命後方，好來以輕視的態度對於「狹隘的」和「雅可賓式的」革命先鋒隊聳鼻頭。

新「火星報」愈是熱心於馬爾丁諾夫的精神，則尾巴主義派策略和革命社會民主派策略間的全部對立性就愈加顯明起來。我們在「前進報」第一期上已指出過，起義應當接合於一個自發運動。可見，我們絲毫也沒有忘記「保障後方」的重要性，如果拿戰爭來作比喻的話。在第四期上，我們說過彼得堡委員會委員底正確策略，他們在一開始時就會用一切力量去贊助和發展自發運動中的革命成分，同時對於這個自發運動陰暗的祖巴托夫式的後方則持慎重的、不信任的態度。現在我們在結束時，且對新火星派作一忠告，——這個忠告，我們還會要再三向他們提出的：請你們不要降低革命先鋒隊底任務，不要忘記我們必須以我們有組織的自動性來贊助這個先鋒隊。少說些什麼發展工人自動性的一般的詞句——工人表現着無窮盡的、你們所看不見的革命自動性！多注意到不要以你們自己的尾巴主義來敗壞政治認識不發展的工人。

一九〇五年二月

註 釋

〔一〕「奇發·莫奇耶維契」，是俄國文學家果戈里所著小說「死魂靈」中的人物之一，這個人物一生都愛好發揮「深奧」的議論，如說：「禽獸是裸體降生的。但究竟爲什麼裸體呢？」諸如此類等等。

無產階級底鬥爭和資產階級底奴顏婢膝

在洛茲的起義和建設街壘的武裝戰鬥，——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大屠殺，在華沙和敖德薩的總罷工和槍擊工人，——地方自治局代表團所演滑稽劇的可恥結局，——這些就是一星期來的主要政治事變。如果加上今日（六月二十八日〔十五日〕）日內瓦報紙所載關於哈爾科夫省列別金縣的農民騷動，搗毀五個地主田莊和政府派遣軍隊到該地去的消息，那末，我們就看見，在一星期以內的事變中反映出一切基本社會力量在現時革命時期暴露得如此公開而明顯的性質。

無產階級不斷地激動起來，特別是在一月九日後，它一分鐘也不讓敵人休息，主要是以罷工來進攻，而避免與沙皇制度底武裝力量發生直接衝突，以準備自己力量去進行偉大的、堅決的戰鬥。在那些工業最發展、工人在政治上最有訓練、除經濟的和一般政治的壓迫外又加上民族壓迫的地方，——沙皇制度底警察和軍隊底行動就特別挑釁，簡直是故意挑撥工人。而工人們，甚至對鬥爭沒有準備好的，甚至在開始時僅限於防衛的，如同洛茲無產階級那樣，都不僅向我們表示着革命熱情和英勇精神底新模範，而且表示出鬥爭底更高形式。誠然，他們的武裝還是薄弱、極端薄弱，他們的起義還照舊是局部的與一般運動沒有聯系的，但他們終究前進了一步，他們以最

大的速度用幾十個街壘佈滿着城市中各街道，他們給沙皇制度底軍隊以嚴重的損害，他們拚命地在個別房屋中實行抵抗。武裝起義無論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增長起來。沙皇劊子手刀頭下的新犧牲者——在洛茲死傷達二千人——燃起了新的無數萬公民對可惡的專制制度的激烈仇恨。新的武裝戰鬥日益明顯地表示出人民與沙皇制度武裝力量的武裝決鬥是不可避免的。從個別的爆發愈益描繪出正在燃燒的全俄熊熊大火底景象。無產階級的鬥爭蔓延到新的最落後的區域，且沙皇衛兵好像是熱心於幫助革命，而把經濟衝突變為政治衝突，到處都用工人自己的命運來向工人解釋絕對必須推翻專制制度，把他們訓練為將來的人民起義的英雄和戰士。

事變本身，正在擴大和加深的革命運動自發過程本身日益把人們引近到接受人民武裝起義的口號——這個由無產階級政黨，以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為代表所如此堅決提出的口號。讓任何動搖和懷疑都趕快消滅下去吧！讓一切人和每個人都趕快覺悟到，在現時來託詞拒絕這個刻不容緩的任務——最積極地準備武裝起義的任務——是如何的荒謬，如何的不堪，延宕是如何的危險，把到處發生的局部起義統一起來，團結起來，是如何迫切需要。這些爆發在各自孤立時是沒有力量的。如果運動如現在這樣自發地、緩慢地從一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區域傳到另一個區域，那末，沙皇政府有組織的力量會能把起義者先後各個擊破。但是，這些爆發統一起來便能匯合為如此強大的革命熱流，在天地間會沒有任何力量能阻遏它的。而這種統一是在進行着，是在以我們所不知道的，所未猜想到的成千的道路進行着。人民是在這些個別的爆發

和爭鬥中學習革命，——我們的責任僅在於不落後於時局底任務，善於時常指出下一個更高的鬥爭階段，從過去和現在中間吸取經驗和指示，更勇敢地、更廣泛地號召工人和農民前進又前進，前進到人民底完全勝利，前進到完全消滅那在現在以死囚的拚命神情來進行鬥爭的專制制度匪黨。

在社會民主黨中，特別是在其知識分子派中竟時常遇到有這樣的人們，這些人們降低運動底任務，卑怯地不信任工人階級底革命毅力。某些人直到現在還以為既然民主革命按其社會經濟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當力圖去爭取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去實行最努力的參加，去提出推翻沙皇政權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等先進的口號。事變也教訓着這些落後的人們。事變證明着從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中得出的戰鬥結論。民主革命底資產階級性並不是說，它就只能對資產階級有利。恰恰相反，它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最有利和最需要的。事變愈益明顯地表明，只有無產階級能於不管資產階級底不可靠和不穩定而進行堅決的鬥爭來爭取完全的自由，爭取共和制度。無產階級能成爲全體人民底首領，而把農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這些農民除了遭受壓迫和暴力外是從專制制度方面得不到任何其他東西的，除了遭受背叛和叛賣外是從人民底資產階級朋友方面得不到任何其他東西的。無產階級，由於其在現在社會中的階級地位的本身，就能比一切其他階級更早了解到，偉大的歷史問題歸根到底只有強力才能解決，自由是只有經過最偉大的犧牲才能獲得，沙皇制度底武裝抵抗是應當用武力來摧毀和擊潰的。否則，我們就會得不到自由。否則，俄國就會受到如土耳其一樣的命運，經受長期的、痛苦的衰落和瓦解，特別是對於人

民中一切勞動羣衆和被壓迫羣衆是痛苦的。讓資產階級去低首下心，奴顏婢膝，講價錢和乞求恩典，來求得可憐的、滑稽可笑的自由吧。無產階級是要進行戰鬥，率領那被最卑鄙的和無可忍受的農奴制度及愚弄政策所蹂躪够了的農民，前進到完全的自由，這種完全自由是只有武裝了的人民憑靠着革命政權才能保衛住的。

社會民主黨提出起義的口號並非輕率魯莽。它向來都反對，而且還要繼續反對革命的空話，要求清醒估計力量和分析時機。社會民主黨還是從一九〇二年起就曾說要準備起義，從來也不會把這種準備與無意義地亂行騷動混爲一談，人爲地去佈置騷動只會毫無結果，空耗我們的力量。而只是現在，在一月九日後，工人政黨才把起義提作當前的口號，而認爲必須起義和必須提出準備起義的任務。專制制度自己把這個口號變成了工人運動底實踐口號。專制制度給了第一批的廣泛的和羣衆的國內戰爭教訓。這個戰爭已開始了，且在日益尖銳的形式中日益擴大地進行着。我們的任務只是綜合這個國內戰爭底教訓，解釋「國內戰爭」這個名詞底全部偉大意義，從這個戰爭底個別戰鬥中吸取實踐的指示，組織力量，直接和立刻準備起進行真正戰爭所必需的一切。

社會民主黨不害怕直接看到真理。它知道資產階級底善於叛變的天性。它知道，自由帶給工人的，不是安寧，不是和平，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更偉大的鬥爭，與現在爭自由時期的資產階級朋友鬥爭。但是，畢竟——且正是因此——自由是工人一定需要的，工人需要自由是比任何人都要厲害些。只有工人能夠領導人民爲完全自由、爲民主共和制度而鬥爭，而工人也定會爲爭取自

由和共和制度而拚命到底。

無庸說，在人民中還存在有許多愚昧和馴順心理，還應當進行巨大的工作去發展工人底自覺，更不用說農民了。但是，請看昨天的奴隸怎樣迅速地抬起頭來了，甚至在半醒半睡的人們眼睛中都如何閃着自由的火花。請看農民運動吧。農民運動是散漫的，不覺悟的，關於它的範圍和性質，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很小一點的真實消息。但是，我們明白知道，自覺的工人和正在起來進行鬥爭的農民是極易於互相了解的，每一次的光芒都會把他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爲自由而鬥爭，那時他們就不會把自己的革命讓給怯懦得可鄙的和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與地主去支配，而這個民主革命是能給他們以土地和自由，能給他們以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可想像的對勞動者生活的改善，以便來繼續進行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請看中部的工業區域吧。不是在不久以前，我們還會覺得這些區域是處在睡夢沉沉中麼？不是在不久以前，還會認爲在那裏只能進行局部的、零碎的、細小的職工運動麼？而在那裏却已爆發總罷工了。成千累萬的工人都振奮起來了，而且繼續振奮着。政治的鼓動非常地增長起來。當然，那裏的工人還遠不及英勇的波蘭底無產階級，但是沙皇政府正在迅速啓迪他們，迅速迫使他們「趕上波蘭」。

不呀，全民武裝起義並不是幻想呀。無產階級和農民在現在民主革命中的完全勝利並不是空想。而這樣的勝利會對歐洲無產階級開闢着怎樣偉大的前途，歐洲無產階級已是多年來被軍閥和地主的反動勉強地阻遏其力求幸福的趨向呵！在俄國的民主革命底勝利將是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

信號，將是我們的弟兄，全世界有覺悟的無產者達到新的勝利的信號。

和無產階級底強大而英勇的鬥爭比照起來，那些地方自治局紳董們和「解放派」在有名的覲見尼古拉第二時的忠順發言，是顯得如何卑鄙不堪呵。這些丑角們是受到了應受的責罰。他們記述沙皇恩惠御言的厚顏得意報告中的墨跡未乾，這些言詞底真正意義，就已在新的事實中暴露於一切人們之前了。檢查機關是在橫行暴戾。「大俄羅斯報」僅由於登載一個小而又小的請求就被責令停刊。以特別坡夫爲首的警察獨裁是在興旺着。沙皇御言底官廳正式解釋是：他曾恩許在萬世不移的、「國粹的」專制制度神聖不可侵犯的條件下召集一個有參議權的人民代表會議！

墨舍爾斯基侯爵在「公民報」上對代表團覲見的估計竟證明是正確的了。他寫道，尼古拉竟能 *donner le change*（欺騙）地方自治局紳董們和自由派。尼古拉竟能當面欺弄他們！

真是神聖的真理！地方自治局紳董和解放派底領袖們受了當面欺弄。他們正該這樣呵。由於奴顏婢膝式的發言，由於隱匿其關於憲法的真正決議和意向，由於對沙皇底詭譎言詞表示卑鄙緘默，他們受到了應受的責罰。他們力圖得到對資產階級「無危險的」滑稽可笑自由，就再三再四的講價錢。施坡夫與布里根講價錢，杜魯別茨基與施坡夫講價錢，彼特龍克維奇和羅吉澈夫對杜魯別茨基講價錢，司徒盧威對彼特龍克維奇和羅吉澈夫講價錢。他們講來講去，「暫時」互相同意了地方自治局紳董代表團所提出的純粹施坡夫式的綱領。對這種買賣人給予了……憲兵槍把子的回答，真好得很。

難道俄國資產階級「解放派」底首領們這一次的恥辱還不會是結局底開端麼？難道那些能於成爲誠懇的和忠實的民主主義者的人們，甚至到現在還不離棄這個大名鼎鼎的「立憲民主黨」麼？難道他們會不懂得，既然他們擁護這樣的「黨」，在這個「黨」中「地方自治局的集團」則匍匐逢迎專制制度，而「解放派」又匍匐逢迎地方自治局集團，——既然他擁護這樣的「黨」，那末他們就會無可救藥地羞辱自己和叛賣革命事業麼？

我們歡迎地方自治局代表團底結局！假面具已被揭穿了。地主老爺們和資產者老爺們，請選擇吧！開明人物先生們和任何「會社」底會員社員先生們，請選擇吧！究竟是擁護革命還是擁護反革命？究竟是擁護自由還是反對自由？誰想成爲真正的民主主義者，誰就應當進行鬥爭，誰就應當與這些匍匐逢迎的人們，與這些叛徒們斷絕關係，誰就應當創立尊重自己及其信念的誠實的黨，誰就應當堅決而徹底地站到武裝起義方面來。而誰想繼續玩弄外交手段，玩弄字句，誰想講價錢和從事奴顏婢膝，放出誰也不信的口頭威脅，以及歡欣鼓舞地接受其所尊敬的皇上賜以貴族首長地位的諾言，誰就應當受到一切擁護自由者以一致鄙棄的態度來把他當衆加以侮辱。

打倒叛賣自由的資產階級叛徒！

革命的無產階級萬歲！爲爭得完全自由，爭得共和制度，爭得無產階級和農民底最切身最迫切利益而舉行的武裝起義萬歲！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在敖德薩的起義和「波將金」鐵甲艦轉到革命方面，顯示了在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發展中有了新的巨大的進步。事變發展以驚人的速度證明了號召起義和號召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是適時的，——這個號召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即無產階級有覺悟的代表們向人民發出的。革命火燄底新的閃爍，表明出這些號召底實踐意義，並迫使我們更確切地來決定革命戰士們在現時俄國時局中的任務。

全民武裝起義在事變自發進程底影響下在我們眼面前成熟起來、組織起來。在不久以前，人民與專制制度鬥爭的唯一表現還是騷動，即是不自覺的、無組織的、自發的、有時甚至粗野的激動。然而，工人運動，即最先進階級——無產階級——運動很快就從這個開始的階段長大起來了。社會民主黨自覺的宣傳和鼓動是有了自己的成果。有組織的罷工鬥爭和反專制制度的政治示威代替了騷動。在幾年中野蠻的武力摧殘，「教育了」無產階級和城市平民，訓練了他們去進行最高形式的革命鬥爭。專制制度把人民拋進犯罪的和恥辱的戰爭中，已使人民忍無可忍，開始了羣衆武裝抵抗沙皇軍隊的企圖。開始了人民同軍隊的真正巷戰，建設街壘的戰鬥。高加索、洛

茲、敖德薩、里巴瓦最近以來對我們提示了無產階級的英勇和人民的熱情的許多範例。鬥爭已經發展爲起義。自由之死刑執行人的可恥的職務，警察人員的職務，不能不漸漸地甚至把沙皇軍隊的眼睛也打開了。軍隊已經動搖起來。開始是不聽指揮，在鄉軍人的爆發、軍官們的抗議、士兵中的騷動及某些連或團拒絕射擊自己兄弟——工人的個別偶發事件。然後是——一部分軍隊轉到起義這方面來。

最近敖德薩事件的重大意義正是在於：這是沙皇制度軍事力量第一次大隊地——整個軍艦——公開轉到革命方面來了。沙皇政府急得手忙腳亂，並用盡一切陰謀詭計，以圖掩蔽人民耳目，以圖將海員們的起義在開始時就鎮壓下去。但這是沒有用的。被派去鎮壓革命軍艦「波將金」的艦隻都拒絕同志戰鬥。關於「波將金」投降的消息，關於沙皇下令擊沉這艘革命軍艦的消息傳遍歐洲，只是使專制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丟盡了醜。艦隊已開回到塞瓦斯托坡里，政府迅即解散了海員，解除了軍艦的武裝；據傳黑海艦隊的官長整批免職；當「喬治常勝」艦被繳械時，又一次激起了憤怒。在里巴瓦和喀琅施塔得，海員也發生起義；與軍隊衝突的事越來越多；海員和工人對軍隊進行了街壘戰鬥（在里巴瓦）。外國報紙上報道了其他好些軍艦（「米寧」、「亞歷山大二世」等等）的譁變。沙皇政府看來是沒有艦隊了。它現時所能做到的，至多是阻住艦隊，不讓它們踴躍地轉到革命方面罷了。但是「波將金」艦仍然是不可戰勝的革命的領地，不管它的命運如何，擺在我們面前的無可懷疑和意味深長的事實是：「波將金」艦仍然是組織革命軍核

心的嘗試。

任何壓迫，任何對革命的部分勝利，都不能消滅這個事變底意義。第一步已經走過了。決定不移的關頭已經渡過了。軍隊轉到了革命方面的事實已經發動了全俄國和全世界。隨着黑海艦隊事變而起的必然會有新的更加積極的組織革命軍隊的企圖。現在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用一切力量來贊助這些企圖，向無產階級和農民底最廣大羣衆解釋革命軍隊在爲自由而鬥爭中的全民意義，幫助這個軍隊底個別部隊提出能吸引羣衆的全民的自由旗幟，統一起能擊潰沙皇專制制度的力量。

騷動——示威——巷戰——建立革命軍隊隊伍——這就是人民起義發展底階段。現在我們終究走到了最後這個階段。自然，這不是說全部運動都已整個站在這個新的最高階段上。不是的，在運動中還有許多未成熟性，在敖德薩事變中還有明顯的舊時騷動底特點。但是，這就是說，自發巨流底先進浪潮已沖到了專制制度「堅壘」底門前了。這就是說，真正人民羣衆底先進代表，不是由於理論的考慮，而是由於發展着的運動底逼迫，已了解了新的最高的鬥爭任務，即與俄國人民公敵作最後決鬥的任務。專制制度做了爲準備這個鬥爭所需的一切。它在多年中推動人民去與軍隊進行武裝鬥爭，而現在它就自食其惡果。從軍隊本身中產生出革命軍隊。

這些隊伍底任務就是：宣告起義，給羣衆以進行國內戰爭——也如進行其他任何戰爭一樣——所必需的軍事領導，建立公開全民鬥爭底根據地，把起義傳播到鄰近地域，保證——起初哪怕是在國內一個不大的地區中——完全政治自由，開始用革命手段來改造那腐朽了的專制制

度，盡量廣大地開展人民下層羣衆底革命創造力，這些下層羣衆在和平時期是很少參加這種創造的，但他們在革命時代就站到第一綫上來了。只有覺悟到這些新的任務，只有大胆地和廣泛地提出這些任務，革命軍底隊伍才能獲得完全勝利，才能成爲革命政府底支柱。而革命政府，在人民起義底現階段上，也是如革命軍隊一樣迫切必需的東西。革命軍隊所以必要，是爲要進行軍事鬥爭，是爲要在軍事上領導人民羣衆來反對專制制度軍事力量底殘餘。革命軍隊所以必要，是因爲只有強力才能解決偉大的歷史問題，而在現代鬥爭中強力底組織就是軍事組織。除了專制制度軍事力量底殘餘外，還有鄰近國家底軍事力量，正在場台的俄國政府已向這些國家乞求援助，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再說。

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爲要在政治上領導民衆——起初在革命軍隊已從沙皇制度方面奪來的這部分區域裏，然後就在全國。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爲要立刻着手來實行那爲革命所爭取的政治改造，爲要建立革命的人民自治，爲要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憲的會議，爲要實行那些是正確表示人民意志之必要條件的「自由」。革命政府所以必要，是爲要在政治上統一已起義的、已在實際上最終地脫離了專制制度的這部分人民，爲要在政治上組織這部分人民。當然，這種組織只能是臨時的，正如同那代表人民掌握政權來保證實現人民底意志，來經過人民活動的革命政府也只能是臨時的一樣。可是這種組織應當與起義底每個勝利步驟緊相聯系而立刻開始進行，因爲政治的統一和政治的領導是一分鐘也不能延擱的。爲了人民對沙皇制度的完全勝利，這樣立刻實

現在政治上來領導起義人民並不比在軍事上來領導起義人民力量次要一些。

專制制度擁護者和人民羣衆間鬥爭底最終結局會是怎樣，這是每個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會懷疑的。但是，我們應當明白認清，嚴重的鬥爭還才開始，巨大的考驗還在前面等待着我們。無論革命軍隊或革命政府都是如此高等式樣的「機體」，都要求這樣複雜的機關，這樣發展的公民自覺，而如果希望一下子就簡單、立刻、必然地實現這些任務，那就是錯誤的了。不，我們並不希望這樣，我們善於重視社會民主黨向來進行過而且將始終繼續進行的那種頑強的、緩慢的、且時常是看不見的政治教育工作底意義。但是我們也不應當犯着那種在現時還更危險的不相信人民力量的錯誤，我們應當記得，當強大的歷史事變極力把那些庸俗人從山洞中、角樓上和地窖中拉出來而強迫他們成爲公民時，革命是具有如何巨大的啓發和組織的力量。革命時期底幾個月有時比之政治停滯時期底幾十年要更迅速和更完滿地教育着全國公民。革命階級自覺的領導者底任務就在於在這種教育公民事業上經常走在這個階級底前面，解釋新任務底意義和號召前進到我們偉大的最終目的。我們在繼續企圖組織革命軍隊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時所不可免會遇到的挫折，將只會教會我們在實踐上解決這些任務，只會吸引那些在現時深藏潛伏的新生的民衆力量來參加這些任務底解決。

且拿軍事來說吧。任何一個多少懂得歷史的，從偉大的軍事泰斗恩格斯學習過的社會民主黨人從來也不曾懷疑過軍事知識所具有的巨大意義，軍事技術和軍事組織底巨大重要性，這個爲人

民羣衆和人民中各階級利用來解決偉大歷史衝突之武器的巨大重要性。社會民主黨從來也沒有降低到玩弄軍事陰謀，在還沒有存在着已開始了的國內戰爭條件時，它從來也沒有把軍事問題提到第一位[○]。但是，現在，現在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都提出了軍事問題，如果不是提到首位，那至少也是提到首位之一，把研究軍事問題和使人民羣衆認識軍事問題提作當前的任務。革命軍隊應當在實踐上運用軍事知識和軍事武器來解決俄國人民今後的全部命運，來解決第一個最重要迫切的問題，即關於自由的問題。

建立革命政府的任務也如同在軍事上組織革命力量的任務一樣是同樣新穎、同樣困難而複雜的任務。但是，這個任務也可以，而且應當由人民來解決。在這個事業上每個部分的挫折也會引起改善手段和方法，鞏固和擴大結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其決議案中指出了解決新任務的一般的條件——現在已應當着手來討論和準備實現這種任務的實踐條件了。我們黨有最低綱領，即是在民主的（即資產階級的）革命範圍內完全能立刻實現的，且是無產階級爲其爭取社會主義革命而繼續鬥爭所必需的種種改革辦法之完滿的綱領。但是，在這個綱領中有基本的要求，也有從基本要求中產生出來的，或不言而喻的部分要求。在每次企圖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時所必須提出的，正是基本的要求，以使用簡短的公式，尖銳而顯明的輪廓向全體人民，向一切甚

[○] 請參閱列寧所著「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任務」一文中關於（在一八九七年）談論對沙皇制度作堅決進攻的方法問題是不適時的一段（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五七頁）。——俄文版編者註

至最落後的羣衆來表明這個政府底目的和它的全民任務。

我們想，可以指出六個這樣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應當成爲任何革命政府底政治旗幟和最近綱領，這些基本要求應當吸引人民對這個政府的同情，而人民底全部革命毅力也都應當集中到這些要求上，集中到這些最迫切的事業上。

這六個要求就是：一、全民立憲會議；二、武裝人民；三、政治自由；四、被壓迫的和無全權的各族人民之完全自由；五、八小時工作制；六、農民革命委員會。自然，這只是大約的綱目，這只是標明那爲爭得民主共和制度所必須立刻實行的許多改革辦法的標題。我們並不企求在這裏列舉得完滿無遺。我們只是想顯著地闡明自己對於某些基本任務重要性的意思。必須使革命政府力求憑靠着人民的下層，憑靠着工人階級羣衆和農民羣衆，——不這樣，革命政府就不能保持，沒有人民底革命自動性，革命政府就等於零，比零還壞些。我們的任務在於警告人民不要相信那些響亮而荒謬的空喊的冒險主義（如同什麼立刻實行「社會化」，其實談社會化的人們自己都不知這是什麼意思）^①，同時提出在現時真正可以實現的和真正爲鞏固革命事業所必需的那些改革辦法。革命政府應當發動「人民」和組織它的革命積極性。被壓迫的各民族人民底完全自由，即是承認它們有權不僅在文化上自決，而且在政治上自決，——保證實行迫切辦法來保衛工

① 列寧此語是指社會革命黨人而言。——俄文版編者註

人階級（八小時工作制是許多這樣辦法中的第一個），最後，保證實行毫不顧及地主私利的嚴重辦法來造福於農民，——這在我們看來，就是任何革命政府所應當特別着重提出的主要要求。我們不來說前三個要求，這些要求是異常明顯，無待解釋的。我們不來說，甚至就在不大的，例如在從沙皇制度手裏奪來的區域中在實踐上實現改革辦法的必要，在實踐上的實現是比任何宣言都重要千萬倍，當然，也困難千萬倍。我們只是要注意到，現在就已必須立刻用一切方法來傳播那關於我們的全民的和最近的任務之正確觀念。需要善於向人民——就這個名詞底真正意思說——號召，不僅一般地號召他們進行鬥爭（這在組織革命政府以前時代是足夠了的），而且直接地號召他們立刻實現各種最基本的民主改革辦法，立刻自動實行這些辦法。

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這是如同一個紀念章底兩面。這是爲了起義勝利和鞏固起義果實的兩個同樣必要的機關。這是一定必須作爲唯一貫徹的革命口號來提出和解釋的兩個口號。現在在我們有許多自稱民主主義者的人們。但是，冒牌貨很多，真貨却很少。「立憲民主黨」底空談家很多，而在這個鼎鼎大名的「會社」中，在似乎是民主主義的地方自治局中的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即是誠懇主張完全人民專制的，能與人民專制底敵人，與沙皇專制底衛士進行決死鬥爭的人們，——却很少。

工人階級沒有如資產階級之爲階級所固有的這種怯懦性，這種虛偽的半途性。工人階級可以，而且應當成爲完全一貫的民主主義者。工人階級以其在彼得堡、里加、里巴瓦、華沙、洛

茲、放德薩、巴庫以及其他許多城市街道上所流了的鮮血來證明了自己有權充當在民主革命中的先鋒隊的使命。他在現時嚴重關頭也應當能勝任這個偉大使命。無產階級有覺悟的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員，應當——在一分鐘也不忘記自己的社會主義目的，自己階級的和黨的獨立性——在全體人民面前提出先進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對於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只是進到把勞動從任何剝削下完全解放出來，進到偉大的社會主義目的的第一階段。正因此，我們就應當更迅速地走過這個第一階段，我們就應當更堅決地掃除人民自由底敵人，我們就應當更大聲地鼓吹徹底民主派底口號：革命軍隊和革命政府。

一九〇五年七月

抵制布里根杜馬與起義

俄國現時的政治形勢是這樣的。大概會在最近召集布里根杜馬，即是由地主和大資產階級代表構成的參議會，而且這些代表是在專制政府奴僕底監督和援助之下根據那簡直是侮辱人民代表機關思想的，粗蠻地限制資格的，等級性的和間接的選舉制產生的。對於這個杜馬應持何種態度呢？自由民主派對這個問題有兩個回答：它的左翼，以「團體聯合會」——即主要是資產階級知識界底代表——為代表主張抵制這個杜馬，主張不參加選舉並利用這個時機來加強鼓動去促進那以普選制為基礎的民主憲法。它的右翼以鄉區自治局和市自治局紳董七月代表大會為代表——更正確些說，是以該代表大會底一部分人為代表，——反對抵制，主張參加選舉，主張盡量使自己的候選人多多當選入杜馬。固然，該代表大會關於這個問題還未通過任何決議，而把此案移到下屆代表大會解決，下屆代表大會預定在布里根「憲法」公佈後即應以電報來召集的。可是，自由民主派右翼的意見却已十分確定了。

革命的民主派，主要是無產階級及其覺悟的代表——社會民主黨——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都是無條件地主張起義的。上述這種策略間底區別是被自由君主派資產階級底機關刊「解放」雜

誌所正確地抓住了，在該雜誌最近一期（第七十四期）上，一方面，堅決指斥「公開宣傳武裝起義」爲「胡鬧和犯罪」；而另一方面，又批評抵制思想是「實際上毫無效果的」，並且表示確信，「不僅立憲」「民主」（請讀爲：君主）黨中的地方自治局派，而且就是團體聯合會也「會經受住國家考試的」，即是說，會拒絕抵制思想的。

試問，覺悟的無產階級底黨對於抵制思想應當持何種態度，它在民衆面前應當把何種策略口號提爲首要的口號呢？爲要回答這個問題，應當先來追述布里根「憲法」底實質和根本意義何在。這個實質和意義就在於沙皇制度與地主和大資產者的妥協分贓，這些地主和大資產者定會被那對於專制制度無傷的和完全無害的似乎是立憲的小惠所誘餌，而逐漸同革命，即是同奮鬥的人民分離，並同專制制度調和。因爲我國的整個立憲「民主」黨渴望着保存君主制度和上議院（即是，預先保證「一萬上層」富翁在國內國家制度中的政治特權和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所以這樣妥協分贓的可能就是無可懷疑的了，況且：這樣的妥協分贓，至少同一部分資產階級，是遲早會必然在某種形式中實現的，因爲這樣的妥協分贓是由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階級地位本身所預定了的。問題只在於，在何時和如何成立這個妥協分贓，而無產階級黨底全部任務——乃是盡可能推遲成立這個妥協分贓的時間，盡可能分散資產階級，盡可能利用資產階級暫時對人民的呼籲來吸取對革命的利益，同時在此期間培養革命人民（無產階級和農民）底力量去用強力推翻專制制度，去排除和中立那叛變成性的資產階級。

真的，資產階級政治地位之實質，就正如我們已屢次說過的那樣，它是站在沙皇與人民中間，想起公正中介人的作用，而同時背着奮鬥的人民竊取政權。因此，資產階級今天向沙皇請求，明天向人民呼籲，向沙皇——則提出關於政治分贓的「莊重切實的」建議，向人民——則提出關於自由的空洞詞句（意·彼特龍克維奇先生在七月代表大會上的演詞）。資產階級向人民呼籲是對我們有利的，因為它的這種呼籲會給以材料來在政治上喚醒和在政治上教育那樣落後的和那樣廣大的羣衆，對於這些羣衆若想用社會民主主義的鼓動來包括他們，暫時還是空洞的幻想。讓資產階級去搖動那些最落後的羣衆吧，讓它去在某些地方開墾荒地吧，——我們將在這種地面上毫不倦怠地播種社會民主主義的種子。在西歐各處，資產階級爲同專制制度作鬥爭會不得不喚醒人民的政治自覺，同時力圖在工人階級中播種資產階級理論的種子。我們的任務——則是利用資產階級對於專制制度所作的破壞工作而一貫地啓發工人階級，說明它的社會主義任務，說明它的利益與資產階級利益是互相敵對而不可調和的。

由此很顯然的，現時我們的策略，第一，應當是贊助抵制底思想。這個抵制問題的本身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內部的問題。工人階級在這裏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可是它無條件地是利於贊助那一部分比較革命些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是利於擴大政治鼓動並使之尖銳化的。抵制杜馬——是資產階級對人民的極力呼籲，是它的鼓動的發展，是給我們的鼓動增多機會，是加深政治危機，即是加深革命運動底泉源。自由資產階級之參加杜馬——在現時是削弱它的鼓動，是它的呼籲多

向着沙皇而少向着人民，是接近到沙皇與資產階級間的反革命的妥協分贓。

不成問題，布里根杜馬，即使它不會「被撕破」，它自己將來也必然會產生政治衝突，這些衝突是無產階級一定應當利用的，然而這是將來的問題。如果「誓言拒絕」利用這個資產階級的官僚的杜馬去進行鼓動和鬥爭，那就是可笑的了，但是，現在問題並不在此。現在資產階級民主派自己的左翼提出了用抵制方法來公開直接同杜馬作鬥爭的問題，而我們就應當竭盡全力來幫助這個更堅決的攻擊。我們應當用資產階級民主派、解放派自己的話去揭穿他們：盡量廣泛地傳佈他們的「彼特龍克維奇」輩所說的向人民呼籲的詞句，在人民面前揭穿他們，指明對這些詞句的初步的和最小的實際考驗，正是抵制杜馬還是接受杜馬的問題，抵制杜馬就是實行抗議來向人民呼籲，接受杜馬就是拒絕抗議，再去請願於沙皇，接受那種侮辱人民代表機關的把戲。

其次，第二，我們應當竭盡全力使抵制在擴大和加深鼓動的意義上帶來實際的利益，而不是簡單的消極的放棄選舉。如果我們沒有錯的話，那末這個思想似已在俄國工作同志中頗為廣泛地傳播着，這些同志們是用積極抵制幾字來表示其意思的。恰與消極放棄選舉相反，積極抵制應當是十倍地擴大鼓動工作，到處組織會議，利用選舉會議，哪怕是用強力侵入這些會議都可以的，組織示威運動和政治罷工等等，等等。不言而喻的，在這裏爲了進行鼓動和鬥爭的目的來與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某些集團訂立那爲我們黨許多決議所一般容許的暫時協定是特別適宜的。同時我們應當，一方面，徹底保存無產階級黨底階級獨立性，一分鐘也不放棄對我們那些資產階級同

盟者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批評。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善於在鼓動中提出民主革命現時機內的先進革命口號，那我們就沒有執行自己爲先進階級黨的使命。

這就是我們第三個直接的最近的政治任務。正如我們說過的那樣，「積極抵制」就是用加倍的毅力，三倍的加緊，在擴大了的範圍中，去進行鼓動、吸收、組織革命力量。可是這樣的工作，若沒有一個明顯的、確切的、直接的口號，那就會是不可想像的。這樣的口號只能是武裝起義。政府召集粗蠻偽造的一人民」代表機關，就給以最好不過的機會來進行爲爭取真正人民代表機關的鼓動，來對最廣大羣衆解釋，現在（在沙皇這樣欺騙和這樣欺侮人民之後）只有臨時革命政府才能召集這個真正的人民代表機關，而爲要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就必須有武裝起義底勝利和在實際上推翻沙皇政權。爲了號召起義而作廣泛鼓動的比現在更好的時機是不能設想到的，而爲進行這樣的鼓動也就必須有對臨時革命政府政綱的完全顯明的說明。這樣的政綱應當是我們先前所已擬定的（見「無產者報」第七期上所載「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①一文）六條：一、召集全民立憲會議；二、武裝人民；三、政治自由——立刻廢除一切與之相抵觸的法律；四、給一切被壓迫的和無全權的民族以完全的文化自由和政治自由。俄羅斯人民，若不爲其他各族人民的自由而鬥爭，就不能爲自己爭得自由；五、八小時工作制；六、建立農民委員會來贊助和施行一切民

① 見本冊第六一頁。——譯者註

主改革辦法，包括直至沒收地主土地爲止的土地關係改革在內。

總之：要最熱烈地贊助抵制底思想；揭穿那排斥抵制思想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右翼之叛賣性；把這個抵制變成積極的，即是，發展最廣大的鼓動工作；鼓吹武裝起義，號召火速組織戰鬥隊和革命軍隊來推翻專制制度而建立臨時革命政府；傳佈並解釋這個臨時革命政府底基本的和絕對必須的政綱，這個政綱應當成爲起義底旗幟和在一切將會重新發生的敖德薩事變中的模範。

覺悟的無產階級黨底策略應當是如此。爲要完全說明這個策略並達到它的一致起見，我們還應當來講講「火星報」底策略。在「火星報」第一〇六期所載「防禦或進攻」一文中敘述了這個策略。我們不來講那些在一開始企圖着手實行時就會自然不成問題的細小枝節的意見分歧，而只指出根本的意見分歧。「火星報」在公正地責斥消極抵制時，提出立刻「組織革命自治」作爲「可能進到起義的序幕」之思想來與它對立。我們應當——據「火星報」底意見——「用設立工人鼓動委員會的辦法去奪得進行選舉鼓動權」。這些委員會「應當抱定目的去組織由人民選舉其革命代表之選舉而不受那些將由內閣草案規定的『法律』範圍的限制」，我們應當「在全國佈滿革命自治機關」。

這種口號是毫不中用的。從一般政治任務方面來看，它是糊塗的，而從目前的政治形勢來看，它是替解放派助威的。組織革命自治，由人民選舉其代表——這並不是起義底序幕，而是起義底結局。抱定目的要在現時，在尙未起義之前，不經過起義來實現這種組織，這就是給自己

提出荒謬的目的並使革命無階級底意識糊塗起來。必須先獲得起義勝利（即使是在個別的城市中）並建立臨時革命政府，以便使這個政府，能以起義機關資格，以革命人民公認的首領資格來着手組織革命自治。若用組織革命自治底口號來遮蓋或即使是遷延起義底口號——這就如勸人先捕兔後放鷹的辦法一樣。如果在著名的敖德薩事變時日有人勸敖德薩的同志們不以組織革命軍而以組織由敖德薩人民選舉其代表為起義序幕，那末，敖德薩的同志們自然會把這樣的提議置之一笑。「火星報」重複了經濟主義者想把「為法權的鬥爭」看成同專制制度鬥爭的序幕之錯誤。「火星報」現在又來重蹈它在那不幸的「地方自治局運動計劃」中用「高等形式示威」的理論來遮蓋起義口號的這一可痛事件的覆轍了。

在這裏不來講「火星報」這個策略錯誤底根源，——請有興趣的讀者去看尼·列寧所著「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吧^①。在這裏更重要的是要指出，新「火星報」的口號怎樣會與解放派底口號混淆不清。在實踐上想在起義尚未勝利以前組織由人民選舉其代表之企圖就會是完全替解放派助威，並使社會民主黨人墮落為解放派底尾巴。專制制度，當它尚未被臨時革命政府所代替的時候，不會讓工人和人民實行任何稍微配稱為是人民的選舉（而社會民主黨決不贊同那種在專制制度下進行「人民」選舉的滑稽劇），——而解放派，地方自治局的紳董，市議

① 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所載該書第九章。——譯者註

會議員却會進行選舉並會公然把這些選舉冒稱是「人民的」，冒稱是「革命自治」。現在自由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底全部立場就在於試圖避免起義，不用人民戰勝沙皇制度而迫使專制制度承認地方自治局的選舉爲人民的選舉，不用真正革命而把現今的鄉區自治和城市自治變爲「革命的」（照彼特龍克維奇輩的意義）「自治」。在「解放」雜誌第七十四期上，這個立場表現得極爲明顯。再沒有比這個怯弱資產階級底思想家更可惡的了，他竟斷言，鼓吹起義既會「沮喪」軍心，也會「沮喪」民氣！這是在這樣的時機說的，當時即使是瞎子也會看見，俄國的老百姓和兵士只有實行起義才能使自己避免最終的沮喪並證明自己有權成爲公民！資產階級的馬尼羅夫（一）給自己描畫出世外樂土，認爲僅在一個「社會輿論」壓制之下，「政府就會不得不日益作出新讓步，最後，當它無處可退之時，它就會迫不得已把政權讓給那爲社會所要求的按普遍、平等、直接、不記名的選舉制所選出的立憲會議」……（一連同上議院麼？）。「政權這樣由現政府手中和平地（二）過渡到那按新原則來組織國家政權和政府政權的全民立憲會議是毫不奇怪的」。而這個奴顏婢膝的資產階級之天才哲學又以下述的勸告作爲補充：把軍隊特別是把軍官吸引到自己方面，「自動」組織民警，組織地方自治（請讀爲：地主的和資本家的）機關，當作「未來的臨時政府之原素」。

在這個糊塗思想中是很有意思的。資產階級正是想不經過人民起義而使政權「和平」轉到它的手中，因爲人民起義也許會勝利，會爭得共和制度與真正自由，會武裝無產階級及掀起數百萬的農民。遮蓋起義底口號，託詞拒絕起義並勸阻別人，勸告立刻組織（只有對於杜魯別茨基輩，彼

特龍克維奇輩、非多洛夫輩及其同流才能插足的）自治來當做「序幕」，——這正是那為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和與沙皇（君主和上議院）妥協分贓反對「暴民」所需要的東西。所以自由派的馬尼諾夫精神是表現資本底最隱秘的思想和其最深刻的利益的。

「火星報」底社會民主派的馬尼羅夫精神只是表現着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底未熟考的思想，他們離開無產階級唯一革命策略的傾向，這個策略就是無情地揭穿那種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幻想，彷彿沙皇制度底和平讓步是可能的，彷彿不用推翻專制制度可以實現自治，彷彿由人民選舉其代表當做起義序幕是可能的等等。不然，我們應當明顯地，堅決地說明在現時客觀形勢下起義是必須的，應直接號召起義（自然，不預先決定起義的日期），號召火速組織革命軍。只有最勇敢地、最廣泛地組織這種軍隊才能是起義底序幕。只有起義才能實際保障革命勝利，——同時，自然，誰知道地方條件，誰就會始終提防過早起義的企圖。而真正組織真正人民的真正自治，只能是勝利起義底結局。

一九〇五年八月

註 釋

〔一〕馬尼羅夫是果戈里所著小說「死魂靈」中的主角之一。「馬尼羅夫精神」，是指苟且偷安，消極無為，虛玄幻想而言。

革命軍隊伍底任務

(一) 獨立的軍事行動。

(二) 領導無組織的人羣。

隊伍底人數可多可少，哪怕兩三個人都可以。

隊伍應當自己武裝起來，誰能找到什麼就用什麼（槍、手槍、炸彈、刀、鐵尺、棍、放火用的浸了煤油的破布、繩或繩梯、建築街壘用的鐵鏟、炸藥盒、有刺的鐵絲、釘子——反對騎兵用的——及其他等等）。無論如何不要等待從旁邊、上頭、外面來的幫助，一切都要自己去措辦。

隊伍應當盡可能由彼此鄰居的或是準定在一定時間經常會面的人組織起來（最好是兩者兼有，因為定時的會面能被起義所隔絕）。他們的任務是要做到甚至在最緊急的時機，在特別意外的條件下都能集合一塊。因此每個隊伍都應當預先規定出共同行動底手段和方法：在窗上畫記號等等，以便彼此易於找到；約定口號或暗音，以便在人羣中辨識自己的同志；約定在夜晚相會時的暗號等等、等等。任何一個堅毅果敢的人與兩三個同志都能制定出很多這樣的規則和方法，這些規則和方法須要編製好，學會記熟並練習如何應用。必須牢牢記着，百分之九十九是事變的來

到會出乎意外而須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去集合的。

甚至連手無寸鐵的隊伍也能起極重大的作用：一、領導無組織的人羣；二、在便利的場合襲擊崗警，襲擊偶然落伍的哥薩克（在莫斯科曾發生過）等等而奪取武器；三、在警察很少的時候去營救被捕的人或受傷的人；四、爬上屋頂、樓房上層等處而向軍隊拋擲石塊，潑開水等等。有組織的、團結緊密的隊伍，如能奮發起來，就是巨大的力量。無論如何都不應借口缺乏武器而拒絕組織隊伍或是遷延其組織。

各隊伍都應當盡可能地預先分配職能，有時候可預先選舉領導者，隊長。假使陷入委任官銜的兒戲，那自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不要忘記一致的領導，迅速的和果斷的行動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果斷性和進攻就是四分之三的勝利。

各隊伍都應當在一組織成時就馬上——這就是說現在即刻——着手從各方面進行工作，並不是進行理論工作，而且也定要進行實際工作。關於理論工作，我們所指的是研究軍事科學，學習軍事問題，作軍事問題演講，請軍人（軍官、軍士等等直到先前當過兵的工人）參加談話會，閱讀、研究和領會那些論巷戰問題的秘密小冊子與報上文章等等，等等。

關於實際工作，重說一遍，應當馬上開始進行。實際工作可分為預備工作與軍事動作。預備工作是指籌措各種武器和各種彈藥，尋找那位置便於巷戰的房間（便於居高臨下作戰，便於用作存放炸彈和石塊等等，或是存放用以潑警察的鏟水等等，等等的倉庫，以及便於用作參謀部駐在

地，便於收集情報，便於掩藏被追緝的人和便於用作收容受傷人的房間等等、等等）。其次，預備工作是指各種火速探訪、偵察的工作：訪知監獄、警察所、內閣各部及其他機關底房屋佈置情形，訪知政府機關、銀行等等內部工作之分配，這些機關的防衛情形，努力與能有益於工作的人（在警察所、銀行、法庭、監獄、郵局、電報局等機關內服務的職員）發生聯系，訪知存放武器的倉庫，城中一切軍器店等等。這裏的工作非常多，而同時這樣的工作是任何一個人，甚至絕對不能作巷戰的人，甚至完全軟弱無力的人，婦女、兒童、老頭子等等都能貢獻巨大益處的。必須努力即刻把所有願意參加起義的人絕對無條件地團結到隊伍中來，因為沒有而且也不會有這樣的人，他既然願意工作而不會貢獻出巨大益處的，哪怕他沒有武器，哪怕他的身體不適於作戰。

再者，革命軍底隊伍無論如何都不應僅限於一種預備動作，而應當儘速轉到進行軍事動作，以便：一、練習戰鬥力；二、偵察敵人底弱點；三、給敵人以局部的打擊；四、解放被俘虜的人（被捕的）；五、獲得武器；六、獲得供起義用的經費（沒收政府的金錢）等等、等等。各隊伍能够並且應當立刻抓住任何一個良好機會來進行活的工作，而決不要把事情攔延到總的起義，因為若沒有在火燄中的鍛鍊就不能獲得實行起義的能力。

自然，一切走極端的態度都是不好的，一切良好而有益的事情，若引伸到極端，就會成爲並且甚至——超過一定界限時——一定會成爲壞而有害的。無秩序的、沒有準備的小的恐怖行動，引伸到極端時只會分散力量與消耗力量而已。這是正確的，這也自然是不應忘記的。但是，另一

方面，無論如何也不應忘記，現在起義的口號已經發出了，起義已經開始了。在順利的條件下開始攻擊，不惟是任何一個革命者底權利，而且是他的直接義務。打死偵探、警察、憲兵，炸毀警察所，解放被捕者，奪取政府金錢來供給起義底需要，——這樣的戰鬥行動在起義熾烈起來的地方都已到處盛行着，在波蘭是這樣，在高加索也是這樣，而且每個革命軍隊底都應當火速準備去進行這樣的戰鬥行動。每個隊伍都應當記着，如果放過今天現有的便於這樣行動的機會，那末它，這個隊伍，就會犯着不可寬恕的萎靡不振的、消極的罪過，——而這樣的罪過乃是起義時代革命者底最大的犯罪行為，是一切非僅空談而是實際力求自由的人底最大恥辱。

關於這些隊伍底成分可以作如下的說明。關於適當的隊員人數和如何分配他們的職能，經驗會告訴我們的。必須自己開始來創造這種經驗，不要等待別人的指示。當然，必須請地方革命組織派遣革命軍人作講演、談話和磋商，可是若沒有革命軍人，也一定必須自己進行的。

至於說到黨的區分，那末同黨的黨員，自然會願意結合為一個隊伍。但是不應該絕對阻止其他黨底黨員加入隊伍。正是在這裏我們應當來實現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同革命民主派在實際上的聯合和協定（自然，不應有任何的黨的合併）。誰願意為自由而作戰並以事實來證明其決心的，誰就能被認為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必須力求與這樣的人共同進行準備起義的工作（當然是在對於這個人或這個團體有完全信任的條件下）。必須把一切其他「民主主義者」，當做假民主主義者，當做自由派的空談家而嚴格地同他們區分開來，一個革命者如果依靠這些人，便是不可容許的，

如果信任這些人，便是罪惡。

各隊伍互相聯合起來，當然是最好的事情。規定共同行動底形式和條件乃是非常有益的。但是無論如何不可因此就陷於走極端，去編製複雜的計劃，一般的格式，以及爲着學究式的臆造而延誤活的工作等等。起義必然會發生在這樣的條件下，那時無組織的分子要比有組織的更多千倍；必然會遇到這樣的場合，那時需要立時、就地、一兩人獨自動作起來，——所以必須準備着挺身負責而作戰。遷延、爭執、遲緩和猶疑不決，就是起義事業底滅亡。最大的果斷性，最大的剛強毅力，火速運用每一個順利的時機，火速燃起羣衆底革命熱情，指引他們去做更堅決的、最堅決的行動——這就是革命者底首要責任。

那種既會給革命軍兵士以教育，給他們以戰鬥的洗禮，也會給革命以巨大益處的最好的軍事行動，就是同黑幫作鬥爭。革命軍隊底應當馬上研究，有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和如何組織黑幫，然後不要單以宣傳爲限（這是有益的，可是僅僅這一個方法是不夠的），而是要也用武力來行動，毆打黑幫分子，打死他們，炸毀他們的參謀部的房屋等等，等等。

一九〇五年十月

總解決的關頭快到了

均勢的局面形成了，——在兩星期前，第一次聽到全俄政治罷工的消息，當開始顯出政府不敢立刻使用其軍事力量時，我們就這樣寫過。

均勢的局面形成了，——在一星期前，當十月三十日（十七日）的宣言會是「最新的」政治新聞，它在全體人民和全世界面前顯出了沙皇制度底不堅決性及其退却時，我們又這樣重複說過。

然而均勢的局面絲毫不排除鬥爭，而且相反，會使鬥爭特別尖銳化。正如我們已說過的那樣，政府之退却只是選擇它所認為對它是新的，更有利的廝殺陣地而已。一紙空文的宣佈「自由」的佈告，即所謂十月三十日（十七日）的宣言，只是企圖準備同革命作鬥爭的精神條件，——同時特列坡夫又統率全俄黑幫黨徒準備着進行這個鬥爭的物質條件。

總解決的關頭快到了。新的政治形勢用那僅僅是革命時代所特有的驚人速度顯示出來。政府已在口講讓步而同時又已開始準備實際進攻。在允諾製憲之後緊隨着最野蠻的和最醜惡的暴行，好像是故意為的在人民面前更明顯地表示專制制度真實政權的全部真實意義。在空洞約許、空口白話、紙上虛文與實際情形間的矛盾愈加非常明顯了。事變已開始燦爛地證明着我們早已不斷地

肯定說過的並且將來還要始終對讀者肯定說的那個真理：當尚未推翻沙皇制度底實際政權時，它的一切讓步，甚至直到「立憲」會議，——都只是一種虛影幻象，海市蜃樓，遮眼手術而已。

彼得堡的革命工人在其日刊之一上非常精彩地把這種情形表明出來了，這些日刊我們還未收到，可是那些被無產階級底威勢所震駭，所嚇倒的外國報紙日益增多的登載關於這些日刊的消息。「已經賜給了我們集會自由，——罷工委員會這樣寫道（我們是從英文轉譯為俄文，由此自然，就不免有某些不確切的地方）——但是我們的會議仍被軍隊包圍着。已經賜給了我們出版自由，但是書報檢察局却繼續存在着。已經允許了科學自由，但是大學却被軍隊佔據着。已經賜給了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但是在監獄內却充滿着囚犯。已經賜給了維特，但是特列坡夫却繼續存在着。已經賜給了憲法，但是專制制度却繼續存在着。賜給了我們一切，但是我們却一無所有。」——停止了實現「宣言」的是特列坡夫。阻止了憲制的是特列坡夫。解釋了所謂自由底真實意義的仍是特列坡夫。把大赦令弄得殘缺不全的又是特列坡夫。

究竟這個特列坡夫是個什麼人物呢？他是一個非要把他剷除不可的非凡人物麼？一點也不是。他是一個指揮軍警而執行專制制度最平常工作的最平常的警察。

究竟爲什麼這個最平凡的警察及其最普通的「工作」會忽然獲得這樣無限大的意義呢？因爲，革命已向前邁進了無限大的一步，使真正總解決的關頭接近了。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成熟不是逐日增長而是逐時增長，——或是，如果要說得確切一些，那末可以說不是逐年增長

而是逐週增長。在政治上還未醒悟的人民看來，特列坡夫曾是最平常的一個警察；而在已覺悟到自己政治力量的人民看來，特列坡夫就成爲體現沙皇制度底全部野蠻性、罪惡性和荒謬性的不可忍受的人了。

革命教導着人們。革命給俄國人民各階級和俄國各族人民以關於憲制實質問題的最好的實物課程。革命所以教導着人們，就是因爲它把各種應當解決的目前政治任務提出得最明顯最觸目，而迫使民衆深切感覺到這些任務之重要，使民衆覺得不解決這些任務就連生存都不可能，同時在事實上揭穿所有一切的掩飾、遁詞、約許、承諾都是毫無用處的。「賜給了我們一切，但是我們却一無所有」。因爲「賜給」我們的只是些空洞約許，因爲我們沒有真正政權。我們已走近到自由的面前了，我們已迫使所有一切的人，甚至沙皇都承認自由底必要了。然而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承認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那允許給人民代表以各種立法權的一紙空文，我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民專政。我們越是接近到人民專政，就越覺得沒有人民專政之不能忍受。沙皇的宣言越是甜蜜動人，則沙皇政權就越是不可容忍。

鬥爭接近到總解決的關頭了，接近到要解決是否讓真實政權保留於沙皇政府之手的問題的時候了。至於說到承認革命，那末現在一切人都已承認它了。司徒盧威先生和解放派在頗早以前就已承認了，現在維特先生也承認了，尼古拉·羅曼諾夫也承認了。沙皇說道，你們要求什麼，我就允許什麼，只請你們保留我的政權，讓我自己來執行我的允許吧。沙皇的宣言就是歸結到這一

點，所以顯然它就不能不推動到堅決的鬥爭。除了政權，一切我都賜予，——沙皇制度這樣宣稱。除了政權，一切都是幻影，——革命的人民這樣回答。

俄國事變所走到的那種似乎是無意思的局面底真正意義，乃是在於沙皇制度力圖用與資產階級分贓妥協的方法來欺騙愚弄革命。沙皇給資產階級的允許越來越多，來試試各有產階級是否終究會開始紛紛轉變到「秩序」方面去。可是當這個「秩序」是體現為特列坡夫及其黑幫底橫行暴戾時，——沙皇底號召始終會是石投大海毫無應聲。無論維特或特列坡夫都是沙皇同樣需要的：需要維特是為的誘惑這一部分；需要特列坡夫是為的抑制那一部分；需要維特是為的空口允許，需要特列坡夫是為的實際行事；需要維特是為的對付資產階級，需要特列坡夫是為的對付無產階級。於是在我們面前又展開了——只是在更高得無比的發展階段上——那個我們在莫斯科罷工開始時所見過的景象：自由派進行着談判，工人們進行着鬥爭。

特列坡夫非常明白了他自己的作用和他自己的真正意義。他，也許，只是忙得過火一點，——這是在愛玩外交手腕的維特看來，——然而，他却看見革命前進得如何迅速，而惟恐會來不及的。特列坡夫甚至是迫不得已而着忙的，因為他覺到，他所擁有的力量是在減少着。

在專制制度宣佈憲制宣言之日，同時就開始了專制制度防止憲制的手段。黑幫分子幹起在俄國從未見過的罪行來了。關於毆打、關於蹂躪、關於空前未聞的獸行等消息，如雪片一般從俄國各處飛來。白色恐怖到處猖獗。只要有可能的地方，警察就煽起和組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壞蛋來

實行行兇打劫的勾當，以酒肉誘餌市民中的敗類，組織對猶太人的蹂躪，挑唆毆打「學生」和所謂暴徒，幫助「教訓」地方自治局的紳董們。反革命拚命努力。特別坡夫「不負厚望」。他們用快砲轟擊人民（敖德薩），挖眼睛（基輔），把活人從五層高樓上投到街心，強佔大批民房，實行公然搶劫，放火燒屋而不許人救火，誰敢反抗黑幫黨徒，他們就槍斃誰。從波蘭到西伯利亞，從芬蘭灣到黑海，——到處都是一樣。

但是與黑幫底這種瘋狂暴行，與專制政權底這種肆行暴虐，與萬惡的沙皇制度所作的這些最後掙扎同時而起的，又有無產階級日益增長的新的進擊明顯地開始發動起來，無產階級也如向來那樣，在每次運動高潮之後，只是在表面上沉靜下去，而在實際上乃是集聚力量，準備進行堅決的攻擊。警察之橫行暴戾，在現時俄國所具有的性質已是與它們先前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了，——其原因是我們已在上邊說過的。與哥薩克的復仇和特別坡夫式的「報復」之爆發並行的乃是沙皇政權之解體日益加激。這是無論在外省，在芬蘭，在彼得堡都可看得出來的，這是無論在那些民智最閉塞、政治發展最爲薄弱的地方，無論在那些住有其他部族的邊疆，無論在那將表演最偉大革命事變的京都中，都表現出來的。

其實，只要把放在我們面前的維也納資產階級自由派底報紙上所載的這兩個電報來互相比較一下：「特維爾電：暴民當着省長斯列普曹夫面前實行攻擊地方自治局機關底房屋。被暴民包圍的房屋過後竟被焚燬了，消防隊拒絕救火。軍隊雖近在咫尺而沒有採取任何辦法制止這些暴徒」

（我們自然不能担保正是這個消息是完全確實可靠的，可是類此的事件和更壞百倍的事件到處盛行着，這是決不容爭辯的事實）。「嘉桑電：人民解除警察的武裝。把從警察手中奪來的武器分給了居民。組織了民警。秩序井然」。

把這兩個情景對照起來不是非常值得玩味的麼？一個情景是：報復、暴戾、蹂躪。另一個情景是：推翻沙皇政權與組織勝利的起義。

在芬蘭也發生同樣的現象，而其範圍則更廣大得無可比擬。沙皇所派的總督被驅逐了。奴僕式的參議員們被人民掃除了。俄國的憲兵被趕跑了。他們試圖報復（新曆十一月四日由卡巴郎得來的電報），而破壞了鐵路交通。當時為逮捕肆行暴戾的憲兵而派去了武裝民警隊。在多爾尼亞的公民大會上已決定要設法輸入武器和鼓吹自由的出版物。在各城市和各鄉村中有成千成萬的人報名充當芬蘭民警。傳說，堅強堡壘底（斯維亞波爾格）俄國的衛戍隊對起義的人民表示了同情並把堡壘讓給了民警。芬蘭正在歡欣鼓舞中。沙皇實行讓步，準備召集芬蘭議會，取消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十五日）的非法宣言，批准那些被人民驅逐的參議員「辭職」。而同時，「新時代報」却建議封鎖芬蘭底一切海港並用武力鎮壓起義。按外國報紙底電報消息，在赫爾森福斯駐紮了很多俄國軍隊（不知道這個軍隊對於鎮壓起義是否中用）。俄國軍艦似乎已開進赫爾森福斯港去了。

在彼得堡，特列坡夫因為革命人民之歡樂（爲了從沙皇手中奪得讓步）而實行報復了。哥薩

克橫行暴戾起來。毆打行爲加劇了。警察公開地組織着黑幫。工人們曾有意在星期日，十一月五日（十月二十三日）組織盛大示威。他們想爲那些因爭自由而遇害的英勇同志舉行全民追悼。而政府方面則準備實行一次大流血。政府已預備把那曾在莫斯科較小規模內演過的這個流血慘案（在工人首領巴烏曼出殯時的殘殺）來在彼得堡重演一次。特列坡夫想利用還未因派遣部隊往芬蘭去而分散其軍隊的時機，——想利用工人們準備示威，而不是準備打仗的時機。

彼得堡的工人們識破了敵人底惡謀，就取消了示威的舉動。工人委員會決定不在特列坡夫所想選定的時機來作最後的決鬥。工人委員會正確地估計了，有許多的原因（芬蘭起義就是其中之一）使延期鬥爭對於特列坡夫不利，而對於我們有利。而暫時則加緊準備武裝。在軍隊中的宣傳有着非常顯著的成績。有消息說，逮捕了海軍第十四和十八聯隊中的一百五十個海軍兵士；在最近十日間控告了九十二個軍官與革命者發生同情。號召軍隊轉變到人民方面來的傳單甚至分發到了「防衛」彼得堡的巡查隊。革命的無產階級用其雄壯的手把那在特列坡夫所許可的限度內約許的出版自由擴展到比較廣泛一些的限度。按外國報上的消息，在星期六，十一月四日（十月二十二日）只有那些贊成工人要求不受書報檢查局檢查的報紙出了版。兩種願意仍舊當「順民」（逢迎旨意）的彼得堡的德文報未能出版。那些「合法的」報紙——自從合法的界限不是由特列坡夫決定，而是由彼得堡罷工工人聯盟決定的時候起——就說起非常大膽的話來了。「停止罷工只是暫時的，——據『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所載十一月五日（十月二十三日）的電訊，

——聲稱，當着給舊制度以最後打擊的時機來到時，就會重新舉行罷工。無論什麼讓步都已完全不能對無產階級發生任何印象了。時局非常危急。革命思想日益包括更廣大的羣衆。工人階級覺到自己已成了時局的主人翁。那些被將近到來的大禍所嚇倒的人已經開始離開此地（彼得堡）。」

總解決的關頭日益接近了。人民起義底勝利已爲期不遠了。革命社會民主派底口號實現得意外迅速。讓特別坡夫還在革命的芬蘭和革命的彼得堡間，在革命的邊疆和革命的外省間去徘徊吧。讓他去試試給自己選擇即使是一個可以用來自由施展軍事行動的可靠的小地點吧。讓沙皇的宣言更廣泛地散播吧。讓那關於在各革命中心的事變消息多多地傳佈吧。——這就會給我們以新的贊同者，這就會使在沙皇贊同者底正在縮小的隊伍中發生新的動搖和瓦解。

全俄政治罷工卓越地完成了它的事業，它推進了起義，它使沙皇制度受到了可怕的創傷，它打破了卑鄙的國家杜馬之卑鄙的滑稽劇。總的演習已經完結。我們顯然是站在真正表演底前夜。維特滔滔不斷地講話。特別坡夫滔滔不斷地殺人流血。沙皇還能給予的約許已經太少了。特別坡夫還能於用來作最後決戰的黑幫軍隊也太少了。而革命軍底隊伍却日益增長着，力量在個別戰鬥中鍛鍊起來，紅旗在新俄國之上更高更高地飄揚着。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

軍隊與革命

塞瓦斯托坡里的起義日益擴大着。事變快到總解決的關頭了。爲自由而鬥爭的海陸軍兵士驅逐長官。秩序毫不紊亂。政府這次未能再用對付喀琅施塔得的可惡的詭計，未能引起任何的殘殺蹂躪。艦隊拒絕了開往海中，並且威脅着要攻擊城市，如果當局試圖鎮壓起義羣衆的話。曾因「擅敢」宣稱要用武器來保護十月三十日（十七日）的宣言上所約許的自由而被撤職的海軍中尉史米特接收了奧察科艦的指揮。據「大俄羅斯報」底消息，指定海軍兵士們繳械的日期要在今天，二十八日（十五日）滿期了。

這樣，我們是正處於決定關頭底前夜。在最近幾天內——也許在幾小時內——就能看出起義者是否將完全勝利，他們是否將被鎮壓下去或是將簽訂某種妥協。不管怎樣，塞瓦斯托坡里的事變是表示着：在軍隊中舊的奴隸制度，即把兵士變成爲武裝機器，把他們變成爲鎮壓極小自由趨向的武器的制度已完全破產了。

俄國的軍隊——像在一八四九年那樣——越過俄國國界去鎮壓革命的那樣時期，已一去不返了。現在軍隊已不可挽回地離棄了專制制度。但還不是全部軍隊都已成爲革命的。海陸軍兵士底

政治覺悟還很低。然而重要的，是在於自覺心已經覺醒了，在兵士中已開始了自己的運動，在各地營房中到處都侵入了自由精神。俄國的營房往往比任何監獄還壞，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像在營房裏這樣壓制和壓迫個性；無論在什麼地方，對人的摧殘、毒打和凌辱都沒有盛行得這樣厲害。而這個營房竟變成革命底策源地。

塞瓦斯托坡里的事變不是孤獨的，也不是偶然的。我們不來講以前在海軍陸軍中的那些直接起義底企圖。我們只拿那些彼得堡的火星來同塞瓦斯托坡里的大火來比照一下吧。我們來回想一下那些現時在彼得堡的各種部隊中提出的兵士們的要求吧（這些要求已在昨天本報上登載了）。這一張要求表是何等絕妙的文件呵！它是何等明顯地表明奴隸的軍隊正在變成革命的軍隊。試問現在有什麼力量能阻遏着這些要求在一切海陸軍中的傳佈呢？

彼得堡的兵士們想爭得改良飲食、衣服和住房，增加兵餉、縮短服務期間和每日操練時間。但是在他們的要求中，有其他更多的條件是只有自覺是公民的兵士才能提出的。有權穿着軍服來「與一切公民一樣」參加一切會議，有權在營房中閱讀和存放一切報紙，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權，完全取消在營房以外的一切對長官的服從敬禮，取消隨從兵，取消各種軍事法庭並把一切軍事法庭的案子都交歸普通公民法庭審判，有權提出集體的控告，有權在長官們稍微企圖打人時都實行自衛。這就是彼得堡兵士底最主要的各項要求。

這些要求表明，大部分的軍隊已與爭自由的塞瓦斯托坡里的起義者表示同情。

這些要求表明，那些專制制度底僕役們說什麼軍隊中立，什麼須使軍隊不干預政治等等的偽善言詞，是不能指望到兵士底絲毫同情的。

軍隊是不能而且也不應當中立的。不使軍隊參預政治——這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底偽善僕役們底口號，而實際上他們向來都是把軍隊牽引到反動的政治中去，把俄國的兵士變成黑幫底僕役和警察底助手。對於爭自由的全民鬥爭是不能袖手旁觀的。誰要是對這個鬥爭漠不關心，誰就是幫助了警察政府底暴戾橫行，這個政府約許自由，只是對自由的揶揄而已。

兵士——公民底要求就是社會民主黨底要求，就是一切革命政黨底要求，就是覺悟工人們底要求。加入到擁護自由者底隊伍中，轉到人民方面來，——這就會保障自由事業底勝利和兵士要求底實現。

可是，爲要真正完全和鞏固地實現這些要求，就需要向前再走一小步。需要把那飽受可惡的營房——苦工牢獄磨折的兵士們所有的個別願望集合到一塊，集成一個整體的要求。把這些要求集合一塊後，就會是：取消常備軍，用全民武裝來代替常備軍。

在世界各國任何一個地方，常備軍底作用與其說是反對外部敵人不如說是反對內部敵人。常備軍到處都成了反動勢力底武器，成了在反對勞動鬥爭中資本底僕役，成了摧殘人民自由的劊子手。在我國偉大的解放革命中，我們決不要僅僅停留在一些局部的要求上。我們要把禍根剷除。完全取消常備軍。讓軍隊匯合到武裝人民中去，讓兵士們把自己的軍事知識帶給人民吧。讓營房

消滅而用自由的軍事學校來代替它吧。如果武裝人民取消了軍閥等級，並把一切兵士變成了公民，把一切能執武器的公民變成了兵士，如果俄國自由底砥柱將是這樣的武裝人民，那末，在世界上會沒有任何力量敢於來侵犯自由的俄國的。

西歐底經驗已表明了常備軍底整個反動性。軍事科學已證明了國民民警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民警無論在防禦戰中，無論在進攻戰中都能很好地完成軍事任務。讓那些假仁義或偽慈善的資產階級去幻想解除武裝吧。在世界上存在有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時候，——我們應當要求爭得的不是解除武裝，而是全民武裝。只有全民武裝才能完全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裝才能完全傾覆反動勢力。只有在實現這種改革的條件下，自由才能真正為千百萬的勞動者所享受，而不僅為少數的剝削者所獨佔。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

自由派的職業團體與社會民主黨

知識界底「職業」團體對於無產階級有什麼意義？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是否應加入這些團體來進行反對模糊工人階級意識的鬥爭呢？

知識界底「職業」團體和「團體聯合會」是政治的組織。實際上這是自由派的團體。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這就是組成那所謂立憲民主黨，即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黨之核心的團體。現在我們負有最嚴重的責任——即是用一切力量促進對無產階級中的黨的教育，促進它的先進部隊團結成爲真正的政黨，絕對不依賴於一切其他黨的、絕對獨立的黨。所以我們對於那能混亂各黨間清楚確定關係的一切步驟都應當非常小心。整個自由資產階級現在都拚命地妨害着組織無產階級底完全獨立的階級政黨，以便把全部「解放」運動都「統一」和「溶合」爲一個民主主義潮流，藉此來遮蓋這個民主主義之資產階級性。

在這樣的條件下加入自由派的團體，就會是社會民主黨員方面的重大錯誤，就會使他們處於一身兼爲兩個彼此不同、互相敵對的政黨黨員之極其兩難的地位，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上帝。一個人不能做兩個黨底黨員。在我們國內沒有政治自由的條件下，在專制制度底黑暗中，很容易使

各黨互相混亂，而資產階級底利益就是要求這樣的混亂的。無產階級底利益却要求各黨間確切而明白的分界。而在現時保證那部分加入知識界「職業」團體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能保持自己的完全獨立性，保證他們只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之黨員而不是任何其他黨之黨員，並將他的每個步驟都報告給他自己的黨組織，——這樣實際的而不只是口頭上的保證在現時是不會有的。這樣的黨員百分之九十九是會無法保持獨立性的而只好去作「狡猾勾當」，從其結果來看，這是無益的，從敗壞工人們初獲得的黨的自覺性來看，這是有害的。

一九〇五年九月

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

在昨天，十二月六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決議拒絕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出的關於准許他們的代表參加執行委員會和工人代表蘇維埃底請求。執行委員會自己敘述這個決議底理由如下：「一、在全部國際實踐中社會主義國際代表大會和社會主義國際代表會議在其成分中都沒有無政府主義者底代表，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政治鬥爭是達到自己理想的手段；二、代表只能由政黨派遣，而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是政黨。」

我們認為執行委員會底決議是非常正確的步驟，它無論在原則上或實際政治上都具有巨大的意義。當然，如果把工人代表蘇維埃看成工人底議會或無產階級底自治機關，那末拒絕無政府主義者的參加便是不對的了。不管無政府主義者在我國工人隊伍中的影響是如何的微小（這是可幸的事），總還有些工人無疑地是站在他們那一方面的。無政府主義者究竟是政黨、或是組織、或是集團、或是同思想者底自由聯盟，這是形式上的問題，沒有嚴重的原則意義。最後，如果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鬥爭，同時自己又請求參加進行政治鬥爭的機關，那末這種可驚的不徹底性當然是又一次證明無政府主義者宇宙觀和策略底全部動搖性。但是，爲了動搖性而開除出「議會」

或「自治機關」，那當然是不可以的。

我們覺得執行委員會底決議是完全正確的，並且絲毫不與這個機關底任務及其性質和成分相矛盾的。工人代表蘇維埃並不是工人的議會也不是無產階級底自治機關，它根本就不自治機關，而是爲達到一定目的的戰鬥組織。

根據臨時的、未正式締結的戰鬥協定，而加入這個戰鬥組織的，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黨）底代表，「社會革命」黨（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底代表或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極左翼）底代表，最後，還有很多「無黨」工人。這些「無黨」工人並不是一般的無黨者，而只是無黨的革命者，因爲他們是完全同情革命的，他們用忠純的熱忱、毅力和犧牲精神爲革命底勝利而奮鬥。因此，把革命農民底代表包括到執行委員會中來，會是完全自然的。

在實際上，工人代表蘇維埃是社會主義者與革命民主主義者未正式締結的廣大的戰鬥聯盟，同時，「無黨的革命性」自然是包含着在社會主義者與革命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很多的過渡階段。爲進行政治罷工和其他更積極形式的鬥爭來爭取各種迫切的、爲大多數人民所公認和贊同的民主要求，顯然必須有這樣的聯盟。無政府主義者在這種聯盟中會是不惟無益而且有害的；他們只會起解體作用；他們會以此削弱總攻擊底力量；他們還「可能爭論」政治改革底迫切性和重要性。把無政府主義者從所謂進行我國民主革命底戰鬥聯盟中開除出去，從這個革命的觀點和爲着這個革命的利益來看都是完全必要的。在戰鬥的聯盟中只有爲這個聯盟底目的而鬥爭的人才有立足的

地方。舉例來說，即使「立憲民主黨」或「法制黨」〔二〕在其彼得堡的組織中收集了甚至幾百個工人，——工人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也未必會讓這種組織底代表進門的。

執行委員會引證社會主義國際代表大會底實踐來解釋自己的決議。我們熱烈歡迎這個聲明，這就是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機關承認國際社會民主黨底思想領導。俄國革命已具有國際的意義了。俄國革命敵人已來與威廉第二，與歐洲一切極端反動派、暴徒、丘八式的惡棍及剝削者一塊進行陰謀來反對自由的俄國。我們也不會忘記：我國革命底完全勝利是要求俄國革命無產階級與全世界社會主義工人們底聯合的。

社會主義國際各次代表大會通過拒絕無政府主義者底決議，不是偶然的。在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中間橫貫着整整的一條鴻溝，警察暗探局底奸細和反動政府底報界奴僕們企圖把這鴻溝形容得好似不存在的那樣，是徒然無益的。無政府主義者底宇宙觀只是翻了面的資產階級宇宙觀。他們的個人主義理論，他們的個人主義理想是與社會主義直接對立的。他們的觀點所表現的不是那猛力使勞動社會化的資產階級制度底將來，而是這個制度底現在且甚至是它底過去，即是盲目性對零散的、單個的、小生產者的統治。他們的那種歸結到否認政治鬥爭的策略，把無產者分裂起來，並在實際上把他們變為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政治底消極參加者，因為完全棄絕政治對於工人是不可能的，並且是無從實現的。

在現時的俄國革命中，團結無產階級力量，組織無產階級及對工人階級施行政治教育和訓練

的任務正在迫切重要起來。黑幫派的政府愈是暴戾橫行，政府底奸細愈是盡心挑起愚昧羣衆底裏的狂熱，和腐敗的專制制度底衛士愈是拚命地亂用那由他們組織起來的搶劫、蹂躪、暗殺勾當，用酒肉收買流氓等手段來企圖破壞革命威信，則這個組織任務就愈加重要，這個任務首先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政黨要担负起來的。因此，我們要採用一切思想鬥爭方法來使無政府主義者對俄國工人的影響仍然會是如前此一樣的微小。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

註 釋

〔一〕「法制黨」出現於一九〇五年秋天。參加該黨的是大地主、沙皇政府底高級官吏和大資本家。到一九〇七年時遂不復存在了。

新的任務與新的力量

俄國羣衆的工人運動底發展在與社會民主黨發展相聯系上看來是以下述三個非常重要的過渡爲其特徵的。第一個過渡是從狹隘的宣傳小組進到在羣衆中的廣泛經濟鼓動；第二是進到巨大範圍內的政治鼓動和公開的在街道上的示威；第三是進到真正的國內戰爭，進到起義。其中每個過渡都由於以下兩方面準備起來的，一方面是由於主要按着一個方向進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工人階級生活條件上和全部心理狀態上發生深刻的變化，由於日益增多的工人階級階層被喚醒起來參加更自覺、更積極的鬥爭。這些變化有時是寂然無聲地發生的，無產階級聚集力量是在幕後、暗中進行的，而往往引起知識分子對於羣衆運動底鞏固性和生命力的失望。然後進到了轉變關頭，全部革命運動好像一下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階段。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社會民主黨之前實際地提出了新任務，爲要解決這些新任務好像從天上降下了新力量，這些力量在轉變的前夜都還沒有人猜想到的。但是，所有這一切，並不是一下子發生的，不是沒有動搖，不是沒有社會民主黨內各派別間的鬥爭，不是沒有那種向着陳腐了的，似乎是久已死滅和埋葬了的觀點的倒退。

現在我們黨又正經歷着這樣的一個動搖時期。爲要使我們的策略和組織適應於新的任務，必得克服什麼「高等形式的示威運動」（地方自治局運動計劃），或什麼「過程組織」的機會主義理論之抵抗，必得進行鬥爭來反對那種害怕「指定」起義，或害怕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反動心理。

運動的進程，在這一次也會把那些陳腐了的和無生氣的觀點底餘毒掃蕩掉，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種掃蕩應當不僅限於駁斥那些舊錯誤，還需要在無可比擬的更大程度上進行積極的革命工作，來在實踐上實現新的任務，來吸引那在現時正在如此大批地湧上革命舞台的新力量到我們黨方面來和使我們黨利用這些新力量。正是這些積極革命工作問題應當是將近開會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工作底主要對象，現在我黨全體黨員在其地方工作和一般工作上都正應當將其一切思慮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什麼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任務，我們在大體上已屢次說過了，即是：擴大鼓動到城鄉貧民底新階層中去，創立更廣大的、更靈活的和更堅固的組織，準備起義和武裝人民，爲了這些目的而與革命民主派訂立協定。什麼是爲實現這些任務的新力量，——對於這一點的極好的說明就是關於全俄到處發生總罷工的消息，關於罷工和關於青年、一般民主知識分子，和甚至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都發生革命情緒的消息。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底存在，特別是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這些力量底存在——就是使新任務可以解決而且一定會解決的充分保證。擺在我們面前的實踐問題，首先在於究竟怎樣來利用、指導、統一、組織這些新力量，究竟怎樣來把社會民主

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當前時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務上去，同時並不忘記那些舊的和通常的任務，這些任務是當資本主義剝削世界存在時始終會擺在我們面前的。

爲要指出一些解決這個實踐問題底辦法，先來說一個局部的，可是據我們看來却是非常標本的例子。在不久前，在革命開始底直接前夜，自由資產階級的「解放」雜誌（第六十三期上），論到了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工作問題。「解放」雜誌留心觀察社會民主黨內兩派間的鬥爭，而毫不錯過機會地一次又一次利用着新「火星報」到經濟主義的轉向，並着重指出（論到一個工人所著的那本蠱惑羣衆的小冊子時）其對經濟主義所抱的深刻的原則的同情。自由主義的機關報正確地指出了從這本小冊子中（參看「前進報」第二期上關於這本小冊子的論文）不可避免地產生否認或降低革命社會民主黨作用的結論。而「解放」雜誌論到該小冊子所謂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勝利後忽視了經濟鬥爭的這種全不正確的斷語時說道：

「現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幻想，就在於它害怕文化工作，害怕合法道路，害怕經濟主義，害怕所謂非政治形式的工人運動，而不懂得，只有文化工作，合法的和非政治的形式才能替那配稱爲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運動造成充分鞏固和充分廣泛的基礎。」

於是「解放」雜誌就勸解放派分子「自己倡首來創立職工運動」，不是反對社會民主黨，而是與它一塊進行，並且舉出德國工人運動在有反對社會民主黨人非常法令時代所處的條件來作比擬。

這裏無須說及這個極端錯誤的比擬。首先必須把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合法形式態度的真象

恢復起來。「在俄國的非社會主義的和非政治的工會底合法化已經開始了」——在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做什麼？」一書上這樣寫着——「今後我們不能不顧及這種潮流」怎樣來顧及呢？在該書上提出這個問題，並指出必須不僅揭破那些祖巴托夫派（二）學說，而且要揭破一切談論「關於階級合作」問題的任何好聽的、自由主義的言詞（「解放」雜誌既邀請社會民主黨合作，便是完全承認第一個任務而對第二個任務則默不作聲）。「執行這一點——該書繼續說——完全不是忘記工人運動合法化終究會正是有利於我們，而不是有利於祖巴托夫派的。」我們在合法會社中揭破祖巴托夫派和自由主義時，是把莠草和麥子分開的。「麥子，這就是指把還更廣泛的和最落後的工人階層底注意吸引到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上來，這就是說使我們革命者卸去那些在實際上是合法的工作（散佈合法的書籍、儲金、互助等等），而這些工作底發展將一定供給我們以日益增多的鼓動材料。」

由此很明顯的看到，在所謂「害怕」運動底合法形式問題上，成了一「幻想」底犧牲品的，恰恰完全是「解放」雜誌自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僅不害怕這些形式，而且直接指出在這些形式中既有莠草，也有麥子。因此，「解放」雜誌只是以自己的議論來掩蓋自由派惟恐革命社會民主派揭穿自由主義階級實質的那種真實的（和有根據的）害怕心理。

但是，從現時任務的觀點看來，關於使革命者卸去其一部分工作的問題是特別有利於我們的。正是我們所處的革命開始了的時局，使這個問題具有特別迫切重要和特別廣大的意義。「我

們進行革命鬥爭越積極，政府就會越不得不把一部分職工會工作合法化，這樣就從我們肩上卸去了我們一部分重擔」，在「做什麼？」一書上這樣寫着。但是，熱烈的革命鬥爭免除「我們一部分重擔」不僅經過這一道路，而且還經過其他許多道路。現在時局不僅把許多以前被禁止的東西都「合法化了」，而且它把運動如此擴大，以至除了被政府將其合法化了的以外，還有許多以前認爲只有革命者，而且的確只有革命者才能做的事情，現在已在實踐中成了通常的、大衆能做的事情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展底全部歷史進程之特徵，就是這個運動，不管一切障礙，不管沙皇制度底法律和警察辦法，奪取了日益增大的活動自由。革命無產階級好像是既在工人階級中，也在其他階級中（當然，這些階級只是贊同工人民主派一小部分要求的）造成了一定的、爲政府所不能打破的同情和贊助空氣來環繞於自己的周圍。在運動開始時，社會民主黨人會必得執行大批的單純文化工作。或者是把自己的力量差不多完全用在經濟鼓動上。過後，這樣的工作一件一件逐漸增多地轉交給新力量，被吸引到運動中的更廣泛的階層之手。在革命組織底手裏逐漸集中着真正政治領導底事業，從工人抗議和人民不滿的表現中指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結論的事業。在開始時，我們會必得教工人識字，這是既按直接意思，也按比喻的意思來說的。現在政治知識底水平已是如此大大提高了，就可以而且應當把自己力量集中到有組織地領導革命巨流的更直接的社會民主主義目的上去，現在自由派和合法刊物執行着大批這樣的「準備」工作，這種工作在以前曾是過於佔據我們力量的。現在，公開的、爲削弱的政府所不追究的那種民主主義思想和要求

底宣傳，已散佈得如此廣泛，以至我們應該去適應完全新的運動規模。當然，在這個準備工作中是既有莠草，也有麥子的；當然，現在社會民主黨人必得日益加強地注意到同資產階級民主派對工人的影響作鬥爭。但是，正是這種工作也定會比之我們在以前主要用在喚醒政治上不覺悟羣衆的那種活動包含着更多更多的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內容。

人民運動愈加擴大起來，則各個階級底真正本性就愈加暴露出來，而黨應當領導階級，擔任階級組織者，而不做事變尾巴的任務就愈加成爲迫切。一切革命的自動性愈加到處普遍發展起來，則工人事業派那些空談一般的自動性，而爲新火星派所樂意背誦着的字眼，就愈加明顯地表現其空洞而無內容，社會民主主義自動性底意義就愈加顯明起來，事變向我們革命開創力的要求也就愈加增高。社會運動日益增多的新巨流愈加廣闊，則善於替這些巨流創立新河床的鞏固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就愈加重要。不以我們爲轉移而進行的那種民主主義的宣傳和鼓動愈加幫助着我們的時候，則社會民主黨爲保衛工人階級獨立性不受資產階級民主派侵犯的那種有組織的領導就愈加重要。

革命時代之對於社會民主黨正如同戰爭時期對於軍隊一樣。必須擴大我們軍隊底幹部，把它從平時編制變爲戰時的編制，動員後備軍和預備軍底戰士，召還休假的軍士回軍服務，整理新的輔助的軍團、支隊和其他附屬隊伍。不要忘記，在戰爭中必然而且必須要用較少訓練的新兵來補充自己的隊伍，常常要用普通兵士來代替軍官，必須把升調兵士爲軍官的手續加速和簡單化起來。

直截了當說：必須極力擴大所有一切黨的和接近黨的組織，以便稍稍跟得上百倍增長的人民革命毅力的巨流。自然，這不是說應當把那堅持不移的訓練和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教育擱置一旁。不是的，可是應當記得，現在軍事行動本身在訓練和教育事業上有了更大得多的意義，因為這種軍事行動正是在我們的方向上，完全在我們的方向上來教育沒有受過訓練的人們。應當記得，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理性的」忠實態度，現在正由革命事變進程到處給予羣衆的實物課程所鞏固着，而這些課程正是證實我們的信條。因此我們所說的不是放棄信條，不是減弱我們對於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識分子和華而不實的革命家們所持的不信任與猜疑態度，完全相反的。我們所說的是關於傳授信條的新方法，社會民主黨人忘記這些新方法便是不可容許的。我們說，現在非常重要是利用偉大革命事變底明顯教訓來向羣衆——已經不是向小組——傳授我們舊的「信條式的」課程，例如，必須在實際上把恐怖手段和羣衆起義溶合起來，例如，應當善於看見那藏在俄國開明社會底自由主義後面的我國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參看「前進報」第三期上關於本問題與社會革命黨人的辯論）。

所以，並不是說削弱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嚴格要求態度與我們正統的不調和態度，而是要用某些新的手段、新的教育方法去鞏固它們。在戰爭時候，應當直接在軍事行動上來教育新兵。同志們，更大胆些來採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胆些去日益增多地組織新的戰鬥隊，派遣他們去進行戰鬥，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擴大一切黨組織底通常範圍，從委員會起直到工廠小組、職業支

部、學生小組爲止！要記得在這個事業中我們的任何延緩都會是對於社會民主黨底敵人，因爲新的水流急於尋找出路，而如果找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它們就會沖入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河床中去。要記得，革命運動底每個實踐步驟將必然而不可避免地正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來教育青年新兵，因爲這個科學是建立在客觀正確地估計各個階級底力量和趨向的基礎上的，而革命却正是舊的上層建築底破壞和力圖按自己意向創立新的上層建築的各個階級底獨立行動。絕不要把我們的革命科學降低到僅是一種書本上的信條，不要拿什麼過程策略、過程組織這類辯護散亂、遲疑、消沉的可鄙詞句來糟蹋我們的革命科學。讓各種不同的團體和小組有更多的自由來進行各種各色的活動，記着，它們道路的正確性，除開我們的忠告，和不管有否我們的忠告，是有革命事變進程本身偏強的要求來作保證的。早已說過，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敵人學習。而在革命時期敵人總是特別有效地和迅速地強迫我們做出正確的結論。

「組織起來呵！」這個口號，是多數派擁護者在黨底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曾想用完備形式規定的，現在應當把它立刻實現起來。如果我們不善於大胆地倡首建立各種新的組織，那末，我們就應該放棄那想担任先鋒隊作用的空洞野心。如果我們軟弱無力地停止在獲得的委員會、團體、協會、小組等等的界限、形式和範圍中，那就是以此證明我們自己庸碌無能。現在，不由我們發動而到處發生着的小組何止幾千，都無任何一定的綱領和目的，而簡單是受着事變底影響。必須使社會民主黨人負起責任來盡可能與更多的這樣小組建立和鞏固直接的聯系，必須使社會民主黨

人給這些小組以幫助，用其積蓄的經驗和知識去啓發它們，用其革命的開創性去鼓舞它們。讓所有一切這樣的小組，除了自覺的非社會民主主義的以外，或者直接加入黨，或者作爲接近黨的組織。在後一種情形下，就不應當要求它們接受我們的綱領，也不應當要求它們一定要與我們發生組織上的關係；只要是它們懷有革命的情感，抱着幫助與專制制度鬥爭的願心，就足夠使這些接近黨的小組在社會民主黨人對它們的積極鼓舞下，在事變進程底督促下，起初造成爲社會民主黨底民主主義的助手，然後就成爲它的有堅確信念的黨員。

人材多得很而同時又沒有人材，社會民主黨底組織生活和組織需求間的矛盾是老早就可用這個矛盾公式來形容的。這個矛盾，在現在表現得特別厲害：到處都一樣時常聽到渴望新的人力的呼聲，埋怨在組織內缺乏人材的怨言，同時却到處都有極多的人力自請效勞，青年的力量，特別是工人階級中的青年力量正在成長起來。實踐的組織家，在這樣條件下而埋怨缺乏人材，這就陷入到如同法國大革命最高發展時代羅蘭夫人所陷入過的同樣的幻夢中。羅蘭夫人在一七九三年寫道：法國沒有人，遍地都是些侏儒。誰這樣說，誰就是只看見樹，而不看見樹林，誰就是承認，他已被事變弄得眼花目亂，不是他這個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識和活動中支配着事變，而是事變支配着他，事變壓倒了他。這樣的組織家，倒不如滾開去好些，讓位給青年人材，這些青年人材是常常能以其毅力來補償其經驗的不足的。

人材是有的，革命的俄國從來也沒有像現在一樣有這樣衆多的人材。革命的階級從來也沒有

像現代俄國無產階級一樣有這樣非常順利的條件，——這是就暫時的同盟者、有覺悟的朋友和無意的助手方面來講。人材多得很，只是須要拋棄那些尾巴主義的思想和格言，只是須要讓開創力和首倡性，「計劃」和「謀略」能自由發展，而那時我們才配當偉大革命階級底代表，那時俄國無產階級才會如它開始革命時那樣英勇地把整個俄國大革命進行到底。

一九〇五年三月（二月）

註 釋

〔一〕「祖巴托夫派」是莫斯科暗探局局長祖巴托夫底黨徒，祖巴托夫曾受沙皇政府委託（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三年），在憲兵和警察保護之下建立偽工人組織，以便誘惑工人離開革命運動。沙皇暗探局這種統制工人運動的企圖是沒有成功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在其向前發展中把這些警察組織一一掃除了。

第三次代表大會

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爲召集代表大會而進行的長期的和頑強的鬥爭終告結束了。第三次代表大會舉行過了。對於代表大會全部工作的詳細估計，是只有到代表大會記錄出版之後才有可能的。在現時我們只想根據公佈了的「通知」^①和參加代表大會者底印象來指出那爲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所規定了的黨的發展之主要路標。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之前夜，在俄國自覺無產階級底黨的面前擺着有三個主要問題。第一，是關於黨的危機問題。第二，是更重要的問題，即關於黨底一般組織形式的問題。第三，是主要的問題，即關於我們在現今革命時期中的策略問題。我們現在就來檢討這三個問題底決議，從次要的問題說到更重要的問題。

黨的危機問題已由召集代表大會這一事實自行解決了。大家知道，危機底根源就在於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少數頑強地不願意服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多數。這個危機之所以痛苦難受和具有持久

① 指「關於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通知」。——俄文版編者註

性質是由於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集之遲延，由於存在有黨底實際分裂、潛藏的和隱匿的分裂，當時在一方面有人對於表面的和粉飾的統一之虛偽保持，另一方面則有多數派爲要加速地直接走出不堪忍受狀況的拚命努力。代表大會給了這個出路，就是向少數派堅決提出了承認多數派決議案的問題，即或者就實際恢復黨的統一，或者就完全公開破壞黨的統一。少數派寧願實行分裂而按照第二個意思解決了這個問題，總委員會違反着那無疑是黨內大多數全權組織所表示的意志而拒絕參加代表大會，全體少數派拒絕出席代表大會，這就正如已在「通知」上說過的那樣，是走到分裂的最後一步。我們在這裏不來講代表大會形式上的合法性，因爲這是已在「通知」上完全證明了的。在有過全部黨內衝突歷史之後，對於那種說代表大會既不是由總委員會召集的，即不是按黨章召集的，便是非法代表大會的論據，甚至難於認真說及的。凡懂得任何黨的一般組織基礎的人都會明白，對於某一下級委員會的服從是以該下級委員會對上級委員會的服從爲條件的；對於總委員會的服從是以總委員會對於其信託者的服從，就是說對於各地委員會及其總和，即黨代表大會的服從爲條件的。誰要是不贊成這個初步原則，誰就必然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似乎不是受信託者對信託者負責並向信託者作報告，而是相反。可是，我們再說一次，對於這個問題不值得多講，這不僅是因爲只有那不願意懂的人才能不懂這樣的事情，而且也是因爲從分裂時起，在分裂部分彼此間關於形式手續的爭論便已成了特別乾燥無味和沒有意思的煩瑣哲學。

少數派現在從黨內分裂出去了，這是已成的事實了。它的一部分大概從代表大會底決議，尤

其是從代表大會底記錄中會信服那關於機械式的壓迫等等的各種胡說是幼稚可笑的，會信服在新黨章中一般地對少數底權利是有完全保障的，會信服分裂是有害的，——而回到黨內來。另一部分，也許會在某些期間內頑強地不承認黨的代表大會。對於這一部分，我們只有希望它趕快組織成爲具有其特殊策略和特殊章程的內部完整的組織。這個事情實現得越快，就越能使一切人和每個人，使廣大的黨工作人員羣衆，易於了解分裂底原因及對於它的估計，就越易於使黨按地方工作需要來實現其與分裂出去的組織間之實際工作上的協定，最後，就越能更快地出現那達到將來必然實現的恢復黨統一的道路。

現在我們來講第二個問題，講到黨底一般組織的標準。第三次代表大會重新審查了全部黨章，就頗切實地重新規定了這些標準。這次重新審查所涉及的有下列三個主要點：一、改變黨章第一條；二、準確地規定中央委員會底職權和各地方委員會底自治權而把後者擴大了；三、建立統一的中央。關於黨章第一條的鼎鼎大名的問題，那末，黨的出版物已經把它充分闡明了。在原則上擁護馬爾托夫那個曖昧條文的立場底不正確性已被完全證明了。考茨基不用原則的理由而用方便於俄國秘密條件的觀點來擁護這個條文的企圖，是沒有成功而且也不能有成功的。誰在俄國工作過，誰就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方便理由是不存在的。現在只有等待着黨實行黨章新第一條的集體工作底初次經驗了。我們要着重指出，爲實現黨章新第一條還必須進行工作，進行很多的工作。爲要把自己列名爲「處在黨內某一個組織的監督下」的黨員，——這是不要求任何工作的，

因爲這個條文是一句空話，而且它本來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到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所有時期中都是一句空話。爲要建立各種各樣的黨組織底廣大綱，從窄狹的和秘密的組織起到盡量廣大的和盡量少帶秘密性的組織止，——爲了這一點，就需要頑強的、長久的、靈活的組織工作，而這種工作現在就正是落在我黨中央委員會，而尤其是落在我黨各地方委員會的肩上了。正是各地方委員會須得去批准最多數組織加入黨來，在這裏須得避免那些無謂的拘泥沉滯和吹毛求疵，須得經常地和不倦地在工人中去宣傳必須盡量建立那加進我們黨的各种各樣的工人組織之思想。我們不能在這裏再多講這個有興趣的問題。我們僅指出，革命時代使得把社會民主黨同所有各種民主黨嚴格分開成爲特別必要。而若不經常地進行工作去擴大黨組織底數量並鞏固它們間的相互聯系，那末這種分界就會是不可能的。就中，在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每兩週作一次報告的辦法應當用來幫助這種鞏固聯系的事業。我們希望，這種作報告的辦法不會成爲紙上空文，希望實際工作者不會由此描畫出一幅拘泥形式、官僚主義的可怕情景，希望實際工作者能學會起先做簡短的通知，哪怕是簡單通知每個黨組織底黨員人數，甚至是最小的，離中央最遠的黨組織底黨員人數也罷。俗話說得好，「萬事開頭難」，將來就會看見，習慣於彼此發生經常組織關係，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關於只要有一個中央的問題，我們不來多講。第二次代表大會曾以巨大多數的票數通過了「兩個中央並立制」，而第三次代表大會却以同樣的巨大多數推翻了它。這裏的原因，凡留心觀察黨史的人都易於懂得的。與其說是代表大會創造新的，不如說是鞏固已造成的結果。在第二次代表

大會時，「火星報」編輯部曾是並且被認為是穩定性底支柱，——這就給予編輯部以優勢。在當時黨的發展的水準上，俄國境內同志對國外同志的優勢是令人覺得還成問題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暴露了不穩定的正是國外的編輯部，——而黨却長大起來了，且正是在俄國境內無疑而且大大地長大起來了。在這種條件下，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由黨中央委員會指定的辦法就不能不得到廣大的黨工作人員羣衆底同情。

其次，想更準確地分清中央委員會與地方委員會間職權的範圍，分清思想鬥爭與破壞組織的爭鬧間的界限之企圖，同樣是從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全部事變進程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在這裏我們有一貫的、系統的「黨的經驗底積累」。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於一九〇三年十月六日寫給那些心懷不滿的編輯員的信——即是努力把氣憤成分和意見爭執成分分清界限的企圖。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委員會提出的最後通牒——也是這樣的努力企圖，而是以提議讓少數派建立分別的文學團體的形式表示出來的。一九〇四年一月尾中央委員會底代表在總委員會上的聲明——是企圖號召全黨來把思想鬥爭與抵制等分開起來。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寧寫給在俄國的中央委員的信——是承認必須正式保證少數派底權利。著名的「二十二年底宣言」（一九〇四年秋天）——也是這樣的表示，而用更明確的、更精密的、更絕對的形式提出來的。完全自然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也就照這條道路走去了，它「用正式決議把那種所謂戒嚴狀況底幻象最終地吹散了」。這些正式決議，即黨章改變的內容究竟何在，我們在這裏不再重述了，因為這可在黨章和「通

知」上看到的。我們僅指出兩件事情。第一，可以指望，由於保證出版刊物之權和保證地方委員會之不受「解散」，能使那分裂出去的各民族的社會民主主義組織易於回到黨內來。第二，地方委員會人選不可侵犯性之規定使到要預防濫用這個不可侵犯性之可能，即是，要預防絕對無用的委員會之「不可更換性」的缺陷。於是就產生了新黨章第九條，該條規定解散委員會之條件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加入黨組織的當地工人之要求。且等經驗底指示來判斷這個辦法在實踐中的效能。

最後，在講到代表大會工作底第三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即規定黨底策略問題時，我們應當指出，——敘述各個決議並詳細地分析這些決議底內容，在這裏是不可能的。或許，爲了這一點我們須得作幾篇專門論述最主要決議的論文。而在這裏却必須描寫出那爲代表大會所應當分析的一般的政治形勢。已開始的俄國革命也許能有兩個進程和結局。也許沙皇政府還能用一些微小的讓步，用什麼「施坡夫式的」憲法〔二〕逃出其受到各方逼迫的窘境。這樣的結局是難於置信的，但是，假使專制制度底國際形勢能有改善，例如獲得比較順利和平的場合，假使資產階級對於自由事業的叛賣會在與統治者分贓妥協中迅速實現起來，假使一次或數次不可避免的革命爆發都是以人民的失敗爲終結，——那末，這個結局是會到來的。那時，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並且全體覺悟的無產階級將要遇到長期的慘淡日子，在這些日子中將有殘暴的冒稱憲政的資產階級的

○ 關於這一問題列寧在其所著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中詳細論述了。——俄文版編者註

階級統治，將有對工人政治自動性的百般壓迫，將有新條件下的緩慢的經濟進步。自然，無論在革命底何種結局之下，我們都不會垂頭喪氣，我們將利用任何條件底改變來擴大和鞏固工人黨底獨立組織，來在政治上教育無產階級去作新的鬥爭。代表大會在其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公開行動的決議案內也顧到了這個任務。

可能而且更加可靠的，是革命底另一結局，就是在「通知」上所說的「以工人階級爲首的民主派底完全勝利」。用不着說，我們要盡力而爲以求達到這個結果，來消除那可能發生第一個結局的條件。而且客觀歷史條件是便利於俄國革命的。無謂的而且可恥的戰爭給沙皇政府套上不可解脫的絞索，並造成非常便利的時機來以革命手段去消滅軍閥，來廣泛宣傳用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的辦法，來在民衆對它同情之下迅速實行這個辦法。專制制度長久的和獨佔的統治，使在人民中間積聚了可說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巨量革命毅力，與巨大工人運動同時並進的，有農民起義底擴大和增長，有以主要是自由職業者代表爲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團結。歷史底諷刺已來懲罰專制制度，就是，甚至對它友善的社會力量，如同神權派，都必得打破或擴大警察官僚主義底局限而組織起來，有幾分也是反對專制制度的。在僧侶中的醞釀，僧侶力圖走向生活新形式之趨向，神權派的分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者之出現，「異教徒」和教派分子之憤怒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替那主張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的鼓動造成最順利的基地，而成爲最大不過的對革命的幫助。自願的和不自願的，自覺的和不自覺的革命同盟者都在逐日逐時成長起來，倍增

起來。人民戰勝專制制度底可靠性正在加強起來。

這個勝利，只有在無產階級英勇地緊張自己力量時才有可能。這個勝利向社會民主黨提出的要求，是歷史在民主改革時代，無論在任何地方，從未向工人黨提出過的。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不是進行緩慢準備工作的通途大道，而是組織起義，集中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把無產階級革命力量與全體革命人民力量團結起來，實行武裝進攻，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等最偉大的、宏偉的任務。在現時已經公佈出來俾衆周知的決議案中，第三次代表大會會竭力顧及到這些新任務並給覺悟無產者的組織以力所能及的指令。

俄國接近到一切進步人民力量反對專制制度的數百年來鬥爭的總解決關頭了。現在誰也不懷疑，無產階級會最堅強地參加這個鬥爭和正由於無產階級之參加就會決定俄國革命底結局。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現在應當證明自己真不愧爲最革命階級底代表和領導者，應當幫助它爭得最廣闊的自由，——即向着社會主義勝利邁進的保證。

一九〇五年五月

註 釋

〔一〕「『施坡夫式的』憲法」，是指領導地方自治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施坡夫底政綱而言。施坡夫底政綱僅要求設立沒有立法權的諮議性的代表機關。

致布魯塞爾社會主義國際局秘書處的信

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十一日）

親愛的同志們！在幾天以前，我們收到了你們六月二十八日的來信和隨信附來的有興趣的文件（倍倍爾同志和普列漢諾夫同志底信），可是，因為我們非常忙，所以未能即刻回答你們。

（一）至於說到普列漢諾夫同志底信，那我們就不得不表示以下的意見：一、普列漢諾夫同志硬說，似乎在我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八月）以後我們中間的意見分歧只限於組織問題，這是不完全合乎實際情形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底「少數派」（以阿克雪里羅得、維·查蘇利奇與馬爾托夫諸同志為首）在代表大會後馬上就在實際上分裂了黨，它宣佈了抵制由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中央機關並組織了「少數派」底秘密組織，而只是在一九〇四年秋天才把它解散的。普列漢諾夫同志——他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與俄國社會民主黨國外同盟底代表大會（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上是站在我們方面的，——既在「火星報」第五十二期上（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公開宣稱，要善於給「修正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底說法）以讓步來避免黨內分裂，——那就可見，他自己

在當時對於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事，顯然曾有過多少另外的意見。二、那種說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底

召集似乎會是「完全自由行動」的斷言，也是不合乎實際情形的。按照黨章規定，如果有半數的黨委員會要求召集代表大會時，則總委員會就必須召集之。從第三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已譯成法文——中你們知道總委員會會忽視了黨章。各地黨委員會和由它們所選出的「多數派委員會底常務局」在道德上和形式上都應當召集代表大會，哪怕這是違反那不願召集代表大會的總委員會底意志。三、你們從第三次代表大會底這些決議案中又知道，派遣代表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不是「什麼約近半數的全權組織」，而是大多數最大的委員會。四、在我們黨內，真是有被人在開玩笑時稱爲「泥潭」的同志。在我們黨內部意見分歧的過程中，這個「泥潭」中的人會不停地由這方面轉到那方面。這些倒戈專家中的第一個就是普列漢諾夫同志，他還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間就曾從「多數派」轉到「少數派」，而在今年五月間又由「少數派」退出一「火星報」編輯部。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贊成這種轉變，可是，我們覺得，「泥潭」中的同志要過無數手腕之後又決定歸附到我們方面來，這並不能歸罪於我們的。五、在致國際局的信（一九〇五年六月十六日（三日））中普列漢諾夫同志竟忘記提及他自己的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信，這是很不恰當的，這封信曾在「火星報」（第一〇一期）上發表，它的正確的全部的譯文我們已給你們寄上了。六、普列漢諾夫同志論到黨底另一派別即「火星派」時，又忘記了補述到，「少數派」代表會議（一九〇五年五月）既取消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黨章，又沒有建立新的中央機關報。我們料想社會主義國際局應當有這次代表會議一切決議案底全部譯文。如果「火星報」竟不願意把這些決

議案底譯文送交國際局，那我們就願意來擔負這件事情。七、普列漢諾夫同志說，贊同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只有兩個保全了的中央委員（其餘的都被捕了）。普列漢諾夫同志底信是在一九〇五年六月十六日（三日）發表的；於翌日，十七日（四日）在由第三次代表大會所建立的黨中央機關報「無產者」第四期上登載了以下的聲明書：「我們讀了中央委員會給黨總委員會底主席普列漢諾夫同志的公開信以後，完全贊同中央委員會的我們就覺得必須——由於那為熟悉黨內生活經過情形的同志們所能懂得的原因，——公開地聲明我們同是贊同中央的。」聲明書上底簽名都是用的假名：馬·貝姆、烏拉基米爾、應諾喀吉、安得列、瓦龍。我們可以秘密地通知你們，這些都是被捕的中央委員底假名。由此可見，中央委員一知道中央委員會與普列漢諾夫同志（也就是與總委員會）間對於召集代表大會問題發生了衝突時，他們的大多數就馬上發表了意見擁護中央委員會，反對普列漢諾夫同志。我們懇切地請求國際秘書處通知我們，普列漢諾夫同志是否曾認為需要把被捕的中央委員們底這個重要聲明書給國際局看呢，這個聲明書是完全反對普列漢諾夫同志在其六月十六日（三日）的信中所說的斷語的。八、普列漢諾夫同志說兩個派別組織都請他留任黨在國際局的代表，他是錯誤的，直到現在，我們黨底中央委員會關於這個問題並沒有提出過任何請求。在幾天以前，我們已通知過你們，這個問題還沒有最終決定，雖然已提到議程上了。九、普列漢諾夫同志覺得，他對於我們的意見分歧問題不難是毫無偏袒的。在有上述一切情形後，我們覺得這對於他是頗困難的，而至少在現時，是幾乎不可能的。

(二)現在我來談談倍爾同志有關這個問題的提議。

在這裏我必須表示以下的意見：一、我只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和黨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底責任編輯。我僅僅對國外事情和其他某些專門委託給我的事情，才能代表整個中央委員會解決。至少，我的一切決定都是能被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推翻的。因此，我不能解決國際局干預我們黨底事情的問題。可是，我馬上就把你們的信及倍爾同志和普列漢諾夫同志底信都寄往俄國給各中央委員去了。二、爲使中央委員會快些回答，我認爲從國際局得到下面幾個必要的解釋是很有益處的：(1)是否要把「干預」(intervention)一字了解爲只是僅有道德力量而沒有強迫力量的和解調停與勸告呢；(2)或者國際局認爲是經過仲裁法庭的必須服從的決議呢；(3)國際局常務委員會是否提議把對於我們意見分歧問題採取最終的和不能上訴的決議之權留給社會主義國際局底全體會議呢。三、在我自己方面，我認爲我必須通知國際局，倍爾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不久以前已向我和我的同思想者作過這種提議，他表示，他自己或是德國黨底整個領導機關(Parteivorstand)願意在「多數派」與「少數派」間的爭論中担任仲裁人。

我曾回答說，快要召集黨代表大會了，我個人不能代替黨或用它的名義來解決這一問題。

多數派委員會底常務局拒絕了倍爾底這個提議。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這個提議沒有通過任何決議，因而就是對多數派委員會常務局之回答表示默認。四、因爲國際局認爲可以從「某幾種德文報」上採取消息，所以我必得聲明，幾乎所有德文的社會主義報紙，而尤其是「Die Neue

Zeit」^①和「Leipziger Volkszeitung」^②都是完全站在「少數派」那一方面而對於我們事情的記載都是片面的和不正確的。例如，考茨基也是自稱毫無偏袒的，而在實際上他竟然拒絕在「Neue Zeit」上登載對羅莎·盧森堡袒護黨內破壞組織行爲的一篇論文的辯正。在「Leipziger Volkszeitung」上，考茨基會勸說，不要散佈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底德文譯本！！由此，就不難了解，爲什麼在俄國的許多同志都覺得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於俄國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分裂問題是不公正的並且是極有偏見的。

親愛的同志們，向你們致兄弟的敬禮。

弗·烏里揚諾夫（尼·列寧）

① 「新時代」。——譯者註

② 「萊比錫民衆報」。——譯者註

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一九〇五年十月三日（九月二十日）

親愛的朋友們！收到了一大堆文件並聽到了德爾達^①的詳細敘述。我就趕緊逐條答覆。

（一）我不能按所定的日期趕到，因為現在放棄報紙是不可能的。渥義諾夫^②滯留在意大利。阿爾羅夫斯基^③因事被派走了。無人可以託咐了。就是說，正如你們所指定的日期那樣，事情會遷延到俄曆十月間去。

（二）再一次向你們極懇切地請求：請你們正式答覆國際局。是否派人出席國外代表會議。確切說明：派誰去和在什麼時候派去。是否指定什麼人，——也要確切說明。不然你們就會在國際局面前大大損失自己的威信。

（三）關於普列漢諾夫問題也要給以正式的和最終的答覆：是或不是。究竟派誰？遷延這個

① 斯塔索華。——俄文版編者註

② 盧那察爾斯基。——俄文版編者註

③ 沃洛夫斯基。——俄文版編者註

問題就是極端危險的。

(四)關於公開出版的事情請趕速用正式決議解決。我起草的那個同馬萊哈訂立合同的草案是毫未妨害你們的，因為這還是草案。我要重複說的只是，馬萊哈給了一批這裏的人以工錢，而這些人是黨沒有力量來維持的。請不要忘記這一點。我想提議的是，既同馬萊哈訂合同，也按照史米特的辦法來繼續同他人辦理事情。

(五)關於幾乎所有特派員都與中央委員會對立的問題，我有以下的意見：第一，我十分歡迎補選印薩羅夫和劉碧奇兩人一事，這是可能大大地改善情形的。第二，某些特派員顯然是有幾分誇大其詞。第三，把一部分特派員派到各委員會中去，委託他們照顧全區的兩三個臨近委員會的工作，這不是適宜的麼？不要誇大策略一致的意義；不妨讓各委員會有某些不同的行動和計劃。

(六)我認爲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注意關於召集第四次代表大會。是時候了。它大概至少會延遲半年，或許還更久些。然而也是時候了。我覺得，我們放鬆了對某些委員會的監督和容許其不遵守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容納孟什維克的條件之決議案，我們是有點錯誤的。如果這些同時承認又不承認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委員會，在第四次代表大會前不決定立場，那就會弄成一團糟。其中一部分不出席第四次代表大會，就會重新吵架。一部分出席代表大會又會在代表大會上倒戈。我們不應當把統一「兩」一部分的政策與「混亂」兩部分相混淆起來。把兩部分統一起來——我們是

贊成的。把兩部分混亂起來——是永遠反對的。我們應當要求各委員會，先明白分清界限，然後召集兩個代表大會，那時再行統一。在同時同地召集兩個代表大會，而它們就討論並通過已預先準備好的關於合併的草案。

而現在必須同那把黨底兩部分混亂起來的行動作最堅決的鬥爭。我提議最肯定地向特派員提出這樣的口號，並責成他們實現這個口號。

如果不這樣做，那就會糟糕極了。一切混亂都是對孟什維克有利的，而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地去造成混亂。這對他們「是不會更壞的」（因為再沒有什麼能比他們所造成的組織紊亂狀況更壞些的），而我們是珍視自己的組織的，即使是萌芽的組織，我們也要用拳打腳踢來捍衛它。對於孟什維克有利的是混亂一切並把第四次代表大會變成新的吵架，因為他們關於自己的代表大會甚至連想都不想。而我們却應當用一切力量 and 一切思維去團結，去改善我們這部分黨組織。這個策略好像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它是唯一合理的。如果我們是團結得很好，組織得很完備，如果我們會從自己隊伍中驅除一切腐敗分子和倒戈家，那末我們的堅定核心，即使是不很大的核心，都一定會領導起全部「組織散亂的」大衆。而如果我們不會有核心，那末，孟什維克，既瓦解了自己，也會瓦解我們。如果我們會有堅定的核心，那末我們就會很快迫使他們與我們訂立統一。而如果我們不會有核心，那末，獲得勝利的不會是另一核心（它是沒有的），而會是那些糊塗蟲，那時我敢斷言就會有新的意氣鬥爭，新的不可避免的分裂和比先前更壞百倍的憤恨。

來準備真實的統一吧，加強自己的力量並制定黨章和策略標準底明顯草案。而對於那些混亂黨兩部分間關係的空談統一的清談家，在我看來是應該無情地把他們從我們隊伍中剷除出去的。

與你們握手。

你們的尼·列寧

論黨底改組

我們黨底活動條件正在根本改變着。已奪得了集會、結社、出版自由。自然，這些權利是極不鞏固的，如果指靠現時的自由，那就即使不是犯罪，也是愚蠢了。堅決的鬥爭還在前面，對於這門爭的準備應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務。黨底秘密機關是應當保存的。但同時絕對必須最廣泛地利用現時比較寬廣的自由。絕對必須除秘密機關外，日益增多地建立新的、公開的和半公開的黨的（和接近於黨的）組織。如果不進行上述這種工作，而要使我們的活動適應於新條件並能解決新任務，那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爲要把組織放到新基礎上來，就必須召集黨底新代表大會。按照黨章規定代表大會每年召集一次，是應於一九〇六年五月召集的，可是現在却必須加速來召集代表大會。如果我們不利用這個時機，那末我們就會失掉這個時機——這就是說，工人們所極端迫切感覺的組織需要，將會流入畸形的、危險的形式，將會加強那些什麼「獨立黨人」〔一〕等等。必須趕快按照新形式組織起

來，必須提出新辦法來共同討論，必須勇敢地、果斷地來決定「新方針」。

我深信在本期報上所登載的，由我黨中央委員會署名的向全黨的號召書是完全正確地決定了這個新方針。我們革命社會民主派，我們「多數派」，曾屢次說過：在秘密工作條件下，把黨底民主化進行到底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條件下，施行「選舉原則」只是空話而已。實際生活也證實了我們的話。在出版物上（參看由阿克雪里羅得作序的署名爲「一個工人」所寫的小冊子和在「火星報」上及在「工人論黨的分裂」小冊子上所登載的署名爲「許多工人之一」所寫的信）以前的少數派擁護者都已屢次指出了，實際上任何認真的民主化、任何真正的選舉都未能施行成功。可是，在新條件之下，在過渡到政治自由時，就必須過渡到選舉的原則，這是我們布爾什維克向來承認的：如果這還須要證明的話，那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底記錄就特別確切地證明了這一點。

總之，任務是很明顯的：暫時還要保存秘密機關，同時發展新的、公開的機關。若把這個任務應用到代表大會去（爲要具體實現這個任務，自然需要善於實際運用和熟悉地方與時間底一切條件），那就會是這樣：根據黨章來召集第四次代表大會而同時立即火速開始施行選舉原則。中央委員會把這個任務解決如下：各委員會委員在形式上是各全權組織底代表，在實際上是黨的繼承性底代表，都以有表決權的當然代表資格出席代表大會。凡由全體黨員所選舉的，因而也就是由工人黨員羣衆所選舉的代表，中央委員會根據自己所有權利邀請他們以有發言權的代表資格出

席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又繼續聲明說，它將即刻就向代表大會提議，把這個發言權改成爲表決權。各委員會底全權代表們，是否贊成這個提議呢？

中央委員會聲明說，它想，各全權代表是會無條件地贊成的。我個人深信如此。這樣的事情是不能不贊成的。決不能想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領導者底大多數會不贊成這個提議。我們相信，「新生活報」所極端精細登記着的黨工作人員底投票很快就會證明我們觀點底正確；甚至如果還需要爲這樣的步驟（爲把發言權改成表決權）進行鬥爭的話，那末結局也是不成問題的。

請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這個問題，不是從形式觀點而是按實質來看。是否會因實現我們所提出的計劃而使社會民主黨受到危險的威脅呢？

可能看做危險的，就是如果那些非社會民主主義的羣衆一下子加進到黨內來。那時黨將會溶解於羣衆中，黨將不再成其爲階級底覺悟先鋒隊，黨將墮落成爲尾巴。這就無條件地會能成爲可痛的時期。假設在我們黨裏真正有蠱惑羣衆的傾向，假設黨性底基礎（綱領，策略規則，組織經驗）是完全缺乏或是薄弱而動搖的，那末，無疑的，這個危險性會能有最嚴重的意義。但是，事實真相却在於，這個「假設」恰恰是不存在的。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不僅未曾有過蠱惑羣衆的傾向，而且相反，我們始終都是堅決地、公開地、直接地同那些極小的蠱惑羣衆的企圖作鬥爭，始終都要求凡入黨者都要有覺悟性，始終都堅持認爲繼承性在發展黨的事業上有巨大意義的主

張，始終鼓吹紀律，始終都要求一切黨員都在黨底某一個組織內受到訓練。我們有我們的堅定不移的綱領，這個綱領是全體社會民主黨人所正式承認了的，並且它的根本原則未曾引起過任何實質上的批評（至於批評個別的條文和語句乃是在任何有生氣的黨中完全當然和必要的東西）。我們有既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又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又在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之多年工作過程中，所一貫地和有系統地制定出來的各種策略決議案。我們也有一些組織的經驗和實際的組織，這個組織是起了教育的作用並且無疑地有了結果的，這些結果雖不能立即看出，可是只有瞎子或爲外物所蒙蔽的人才能否認這些結果。

不是的，同志們，我們不要誇大這個危險性。社會民主黨已給自己造成了榮譽，造成了方向，造成了社會民主黨底工人幹部。而在現今時候，當英勇的無產階級已在實際上證明了自己的鬥爭決心，證明了自己善於爲明顯自覺的目的作團結的、堅定的鬥爭，善於本着純粹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作鬥爭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那些已加入我們黨的和由於中央委員會的號召將在明天入黨的工人們，一百個中定會有九十九個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如果還懷疑這一點，那就簡直是可笑的。工人階級具有本能的、自發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而社會民主黨十餘年來的工作，對於把這種自發性變爲自覺性已有了非常不少的幫助。同志們！不要給自己製造臆想出來的恐懼吧！不要忘記，一切有生氣的和發展着的黨始終會有些不堅決的、不穩定的、動搖的分子。可是這些分子是正被而且一定會被社會民主黨人堅定團結的核心之影響所感化的。

我們黨在秘密環境中停滯住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底一個代表曾正確地說過，我們黨在最近幾年來爲秘密環境所窒息着。秘密環境正在打破着。勇敢前進吧，拿起新的武器吧，把它分發給新的人們吧，把自己所依靠的基礎擴大起來吧，號召所有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們到自己方面來，把他們成百成千的吸收到黨組織底隊伍中來吧，讓他們的代表來活躍我們的中心隊伍吧，讓他們把青年革命俄國底新精神灌入進來吧。直到現在，革命證明過並且證實了馬克思主義底一切基本理論原則和社會民主黨底一切主要口號的正確。而且革命又證明了我們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的正確，證明了我們對於無產階級底真實革命性的指望和信仰的正確。讓我們拋棄那在黨底必須改造方面的各種細枝末節吧，讓我們馬上走上新的道路吧。這是不會奪去我們舊有的秘密機關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是無疑地承認了和贊成了這種秘密機關：這種承認和贊成是已由實際生活與革命進程所證實了的，而這是比之決議案所能證明的要有力百倍些）。這就能給我們以許多新的、年青的力量，即從那唯一真正革命的和徹底革命的階級底核心內部產生的力量，這個階級已給俄國奪得了一半自由，它會給俄國奪得完全自由，它將引導俄國經過自由走向社會主義！

二

在「新生活報」第九期上所登載的我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召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

會的決議，對於在黨組織內完全實行民主原則方面作了一堅決的步驟。代表大會代表（起初是僅有發言權，以後無疑地要得到表決權的代表）之選舉，應在一個月內完竣。於是，黨底一切組織就要儘速地來討論代表候選人和代表大會任務的問題。對於垂死的專制制度重新企圖取消那些約許了的自由，迫害革命工人，尤其是迫害他們的領袖的可能性，是一定必須顧及到的。因此公佈代表底真姓名未必是適當的（只有特別情形可作例外）。在政治奴隸時代我們所學會的用假名的辦法，在黑幫尙在當權的時候，還是不能拒絕的。且不妨選舉候補代表——又是照舊有的辦法「預防發生破獲」。可是我們不來論述所有這一切秘密的謹慎辦法，因為熟悉工作地方條件的同志們是不難對付那些在此關係上所能發生的一切困難的。曾在專制制度條件下獲有豐富革命工作經驗的同志們，應當用自己的忠告去幫助所有那些在新的「自由」（暫時還在引號內的自由）條件下開始作社會民主主義工作的同志。不言而喻的，在此種情形下我們黨委員會底委員們應當非常機敏靈活：先前那些形式上的權威現在必然失去作用，而必須重新開始，往往是「從頭」開始來對黨內新同志底廣大羣衆證明堅定的社會民主黨綱領、策略和組織底全部重要性。不要忘記，迄今以前，我們往往只是對那些由本社會階層選拔出來的革命家進行工作，而現在我們將與那些標本式的羣衆代表工作了：這種變更就要求不僅改變宣傳和鼓動底方法（必須更通俗化，善於對付問題，善於用最簡單明瞭和真正有說服力量的方式去解釋社會主義底基本真理），而且改變組織底方法。

在本篇論文中我想講講新組織任務中一方面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決議邀請黨的一切組織派代

表出席代表大會並號召一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加入這樣的組織。爲要使這個良好的願望真正實現起來，只簡單的「邀請」工人是不夠的，只簡單的增加先前那樣形式的組織數量也是不夠的。不，爲了這一點就須要全體同志共同用自動的創造精神來規定出新的組織形式。在這裏是不能預先指出任何一定的標準的，因爲這件事情全是新的，在這裏應當應用對於地方條件的認識，而主要的，是應用全體黨員底開創性。新的組織形式，或更正確些說，工人黨基本組織支部底新形式，無條件地應當比舊式小組更爲寬泛。此外，大概新的支部應當是組織手續比較不很嚴格的，比較「自由的」，「Loose」的組織。設若在結社完全自由和居民公民權有完全保障的情形下，當然，我們就會應當到處建立各種社會民主主義的（不僅是職工會的，而且是政治的，黨的）團體。在現時的條件下，我們應當用我們所能找到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去努力走近這個目的。

必須立刻喚起全體黨工作人員，一切同情社會民主黨的工人底開創性。必須馬上到處去組織講演會、談話會、露天大會、羣衆大會來報告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消息，用最通俗易懂的形式敘說這屆代表大會底任務，指明代表大會組織底新形式，號召全體社會民主黨人去參加那根據新原則來樹立真正無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事業。這樣的工作會給我們以大批的經驗指示，會在兩三個星期內（如果積極地進行工作的話）就從工人隊伍中提出新的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來，會鼓舞起更廣大得多的階層對於我們現在已決定協同全體工人同志來重新改造的社會民主黨的興趣。這就會立刻在一切會議上提出關於建立黨底團體、組織、小組的問題。每個團體、

組織、小組都會立刻選出自己的常委會或理事會或幹事會。總而言之，就是選出領導的和經常的機關，以便執行組織事務，以便與黨底地方機關發生關係，以便領取和散發黨的書報，以便徵收黨費來供給黨工作的用費，以便組織會議、講演、公開報告會，最後，以便籌備選舉代表出席黨代表大會。黨委員會，自然要關心幫助每個這樣的組織，供給它材料以便使它認識什麼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黨底歷史和黨底現時偉大任務怎樣。

其次，現在還須關心於建立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組織底所謂地方經濟據點，如由黨員所開設的飯館、茶館、啤酒館、圖書館、閱書室、「Tit」^①等等。不要忘記，除了「專制」警察以外，「專制」老闆們也會來迫害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開除那些鼓動員們底工作，所以我們建立一種盡可能不受工廠主橫行壓迫的據點，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般說來，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對於現時推廣了的活動自由，應當多方利用，而這種自由越有保障，我們就會越加堅毅地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現在工人自己的開創性將發展到這樣

① 這是打靶的場所，在這裏存放有各種槍枝，任何願意打槍的人都可花很少的錢來到這裏用手槍和步槍打靶，我不知道相當的俄文字，於是就名之曰「Tit」。在俄國已宣佈了集會與結社自由。公民們當然也有權會集一處學習射擊，這對於任何人都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在任何歐洲大城市中，你都可看見大眾可入的「Tit」——設在地下室中，間或也在城外及其他地方等等。而工人們學習射擊，學習拿槍，却完全不是多餘的事。很明顯的，只有當結社自由有保障時，當已經可以把那些敢於封禁這類機關的警察壞蛋交付法庭懲辦時，我們才能認真地和廣大來進行這件事情的。

廣大的範圍，會是我們昨天的秘密工作者和「小組家」甚至不敢幻想的。現在社會主義底思想對於無產階級羣衆的影響正在並且還會以這樣一種途徑發展起來，這種途徑往往會是我們無法覺察到的。按照這樣的條件，就必須注意到更正確地分配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黨員^①，以便使他們不至於白白消耗在運動已立穩脚跟並能自力進行工作——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地方；以便使他們深入「到下層中去」，在那裏工作更艱難，條件更困難，需要有經驗的和有知識的工作人員更厲害，光明的來源更少，政治生活跳動得更爲薄弱。現在無論是在那將有全體居民——甚至連最偏僻角落裏的居民——參加的選舉時機，——無論是在公開鬥爭（這是更重要的）的時機，我們都應當實行「到民間去」，以便麻痺外省凡台^②底反動性，以便保證把那些會從各大中心城市發出的口號散佈到全國，散佈到全體無產階級羣衆中去。

毫無疑義的，任何走極端的辦法都是有害的；爲要完全鞏固地和盡量「模範地」佈置工作，我們就在現時也還往往須要把優秀幹部集中到這個或那個重要中心。經驗會指明，在這方面究應保持怎樣的比例。現在我們的任務，與其去空想那些根據新原則的組織標準，不如來開展最廣大的和最果敢的工作，以便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來總結和歸納黨經驗所給予的材料。

① 在黨底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曾表示，希望在黨委員會中，大概要是八個工人與兩個知識分子之比。現在這個希望已是如何的陳舊了！

現在應當希望在新的黨組織中有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黨員就有幾百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黨員。

三

在前兩節中，我們已經說過黨內選舉原則底一般意義和必須有新的組織支部和新的組織形式。現在我們再來檢討一個極迫切的問題，就是：關於黨的統一問題。

誰都知道，極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極不滿意黨的分裂並要求統一。誰都知道，分裂會引起了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或是準備成爲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某種冷淡情緒。

工人們對於黨底「上層」自己統一起來這一點，幾乎失望了。無論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無論是今年五月間孟什維克底代表會議都會正式承認統一底必要。從這時起已過了半年了，而統一幾乎沒有絲毫前進。無怪乎，工人們開始表示出不能忍耐的情緒。無怪乎，登載在「火星報」上和「多數派」所出版的小冊子中（於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中央委員會出版的「工人論黨的分裂」）署名爲許多工人之一所寫的論統一的信竟然以「下面的拳頭」來威脅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黨員。當時，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對於這個威脅是不喜歡的，而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布爾什維克）則認爲它是當然的並在基本上是完全公正的。

我覺得，現在已到自覺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能够並且應當實現其意向的時候了（我不講

「威脅」，因為這個字有責難和蠱惑羣衆的意味，而我們對於無論前者或後者都要用全力來避免的。其實，現在已到了，或者無論如何會來到這樣的時候，就是不是口說，而是可以在事實上在黨組織中施行選舉原則，不是把它當做漂亮的却是無內容的空話，而是當做真正能革新、擴大和鞏固黨內聯系的真正新原則。「多數派」以中央委員會爲代表會直接號召立刻採用並施行選舉原則。少數派也走着同樣的道路。而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在一切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中、機關中、會議上、露天大會上等等都是佔巨大的、絕對的多數。

這就是說，現在已有可能不僅說服需要統一，不僅爭求對統一的約許，而且可以用彼此兩個派別組織中多數有組織工人底簡單決議來在實際上統一起來。這裏不會有任何的「強制性」，因爲在原則上大家都承認統一是必要的，工人們只須在實際上來解決這個在原則上已解決了的問題而已。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中，知識分子的職能與無產者（工人）的職能之關係，本來也能用下面這樣一般的公式來頗確切地表現出來：知識分子善於「在原則上」解決問題，善於製擬格式，善於議論必須進行何種工作……而工人則實行工作，把暗淡的理論化爲活的實際。

如果現在我說出如下的話，那我是一點也不會陷於蠱惑羣衆的，是絲毫也不會減低自覺性在工人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的，是絲毫也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原則底巨大意義的，我要說的就是：我們無論是在代表大會上，無論是在代表會議上都建立了統一黨的「暗淡理論」；工人同志們！請幫助我們把這個暗淡理論化爲活的實際吧！請你們大批加入黨組織中來吧！請你

們把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少數派的第二次代表會議變成轟轟烈烈莊嚴盛大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代表大會吧！請協同我們來實際進行合併問題，——就讓這個問題如同例外一樣（這個例外乃是證實逆定理的例外！）會是一分理論九分實踐吧，的確，這種願望乃是合乎規律的，是歷史上必然的，也是心理上可以懂得的。我們在僑民習氣的空氣中花費了如此多的時間「專講理論」（有時候——用不着遮醜——是白費的），真的，現在不妨多少，一點點兒，稍微「把舵轉到另一方向」，而稍微把實踐向前推進一點。對於統一問題，即對於關涉到分裂原因，我們曾耗費了大量紙墨來談論過的統一問題，這種辦法無條件地是適當的。況且，我們僑民都愁悶着想做實際工作了。同時，我們也已經寫了很好的、很完全的整個民主革命綱領。就讓我們也來為這個革命事業統一起來吧！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

註 釋

〔一〕「獨立黨人」即所謂獨立工黨黨員，該黨於一九〇五年秋在沙皇暗探局直接庇護下在彼得堡成立，其目的在於誘惑工人離開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到一九〇七年初遂不復存在了。

〔二〕「凡台」是法國西北方的一個省區，是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時的農民反革命暴動底主要策源地之一。

工人政黨及其在現時情況下的任務

俄國解放運動中，學生界底一般任務，已在社會民主黨的刊物上屢次說明過了，所以在本文中我們就不再講到這些任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學生面前，既無須證明工人運動底主要作用和農民運動底重大意義，也無須證明那些已仔細思考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已經站到無產階級方面並準備把自己造成爲工人政黨底真正黨員的知識分子對此兩種運動子以幫助的重要性。

我們想來簡單地說說另一個現在具有最多實踐的意義的問題。

偉大的俄國革命現時情況底特點何在呢？

就在於，事變把十月三十日（十七日）宣言底全部幻影完完全全揭破出來了。憲制幻想消散了。反動到處猖獗。專制制度完全恢復起來了，並且由於從杜巴索夫直至下層警察的這般地方暴吏享有獨裁式的權力而甚至「變本加厲」起來了。

國內戰爭在沸騰着。政治罷工之爲政治罷工，已開始失掉作用，已開始退出舞台，成爲已陳舊的運動形式。例如，在彼得堡，精疲力竭的工人們已表現不能進行十二月罷工。另一方面，整個的運動，雖在現時爲反動所壓抑，但無疑義已提升到了更高的階段。

莫斯科英勇的無產階級表明了積極鬥爭底可能性，並吸引了大批這樣的城市人民階層加入鬥爭，這些階層至今都被認爲在政治上是冷淡的，如果不是反動的話。而莫斯科事變會僅僅是在俄國到處衝決過的「洪流」底最顯著表現之一。新的行動形式之前曾擺着有如此巨大的任務，自然，這些任務是不能一下子解決的。然而這些任務現在已經是顯然而明確地提在全體人民面前，運動提得更高了、堅固了、經過鍛鍊了。任憑什麼也不能把這種收穫從革命手中奪去。

杜巴索夫的大砲在空前未見的範圍之內，把新的人民羣衆加以革命化了。修飾過的諷刺式的杜馬，較之舊的布里根杜馬[○]說來，其在先進戰士的隊伍中已預先遇到更大得多的敵視，其在資產階級隊伍中已預先遇到多得無比的懷疑。

現在究竟怎樣呢？

我們將不掩飾實際情形的真象。現在擺在當前的新工作是把握與領會最後鬥爭形式之經驗，是在最主要的運動中心準備和組織力量。

對政府極端有利的就是去鎮壓照舊是散亂的無產者行動。政府想在最不利於工人的條件之下也在彼得堡立刻挑起工人作戰。但是工人們不會墮入這種挑撥詭計，並善於堅持其獨立準備下次全俄行動的道路。

○請參閱本冊所載「抵制布里根杜馬與起義」一文。——譯者註

爲實行這種行動的力量是有的；它們正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快地增長起來。曾捲入到十二月事變底激流中去的只是其中不大的一部分。運動還遠未盡量擴大和盡量加深。

就拿資產階級溫和派和黑幫派的刊物來看吧。任何一個人，甚至「新時代報」，都不相信政府方面關於立刻鎮壓一切尚在萌芽的新的積極行動的豪語。任何一個人也不懷疑，農民，這個浩大的燃燒體，只有到春天才會真正爆發起來。任何一個人也不相信，政府誠心願意召集杜馬和能夠在高壓、延擱、官僚主義、無權與黑暗的舊制度之下召集杜馬。

說政府在莫斯科所獲得的「勝利」，使政府地位較之在十月事變以前更加絕望，這並不是革命家的沉迷語，——在關於堅決行動這樣的問題上的沉迷是危險百倍的——而是連革命敵人都承認的顯然事實所證明着的實在情形。

農民起義增長着。財政破產逼近着。金本位就要塌台。五億盧布的虧空，甚至不管歐洲反動資產階級怎樣決心來幫助專制制度，都是無法填補的。能用來同革命作鬥爭的軍隊已經統統用盡了，而高加索及西伯利亞底「綏靖事宜」還在拖延着。十月三十日（十七日）以後在陸海軍中顯然呈現着的動盪現象，當然不會因在全俄各地對爭取自由的戰士施行暴力而平息下去。俘虜與滿洲軍隊之歸來就使這種動盪現象更加尖銳化。動員新的部隊來反對國內敵人就產生對專制制度之新的危險。莫斯科的「勝利」不僅沒有把危機解決，反而把危機擴大和加緊了。

就讓工人政黨明明白白看清自己的任務吧。打倒憲制幻想！應當收集一切新的、接近無產階

級的力量。應當「搜羅」革命中兩個偉大之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底「經驗」。應當重行適應於已經恢復的專制制度下的條件，應當善於在凡有必要的地方都重行轉入秘密狀況。應當更確定地在實踐上提出新的積極行動底浩大任務，更加堅定、更有系統、更加頑強地來準備這一行動，盡可能地去愛護那些爲罷工鬥爭所疲憊了的無產階級底力量。

一浪跟隨一浪的前來。外省跟隨京都。俄國最中心區跟隨邊疆。城市小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鄉村跟隨城市。反動政府在其執行自己最遼闊任務下的破產是不可避免的。俄國大革命第一階段底結局大都要取決於我們對一九〇六年春天的準備工作。

一九〇六年一月

是否要抵制國家杜馬？

（「多數派」底行動綱領）

工人階級底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正在統一起來。其兩個半體正在溶合並正在準備召集已經宣佈的黨底統一代表大會。

然而在黨底兩個半體中還剩下有一個關於國家杜馬的分歧意見。全體黨員都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具有明確的見解，以便自覺地選舉參加共同代表大會的代表，以便按全體黨員底意願，而不僅按黨底現時各中央機關及各地地方機關底意願來解決這一爭論問題。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雙方都認為現今杜馬是人民代表機關之可憐的贗造品，應當進行鬥爭反對這種騙局，應當準備武裝起義以便召集由全民自由選出的立憲會議。

爭論問題僅僅是關於對杜馬的策略。孟什維克說：我們黨應當去參加初選當選人與複選當選人底選舉。布爾什維克說：積極抵制杜馬。在這張傳單中，我們就來敘述布爾什維克底觀點，他們不久以前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二十六個組織底代表會議上通過了反對參加選舉的決議案。

積極抵制杜馬是什麼意思呢？所謂抵制就是拒絕參加選舉。無論杜馬代表也好，無論複選當

選人也好，無論初選當選人也好，我們一概不願意去選舉。所謂積極抵制並不是簡單地迴避選舉，而是廣泛地利用一切選舉會議來進行社會民主黨的鼓動與組織工作。利用這些會議——這就是說既用合法的方法（登記於選民名冊），也用非法方法侵入到這些會議中去，在這些會議上說明社會主義者底全部政綱與全部觀點，揭示杜馬底全部虛偽性和賈造性，號召為立憲會議而鬥爭。

爲什麼我們拒絕參加選舉呢？

因爲，參加選舉，我們就在無意中助長在人民中的對杜馬的信念，我們就會以此削弱自己反對賈造人民代表機關的鬥爭力量。杜馬不是國會，而是專制制度底騙局。我們應當撕毀這一騙局，拒絕對選舉的任何參加。

因爲，假使我們承認參加選舉是可容許的，那末就該參加到底，直到選舉杜馬代表爲止。資產階級民主派，例如，霍斯基在「人民經濟報」上，就勸我們在這些目的上去同立憲民主黨作選舉的分贓妥協。但是現在社會民主黨人，無論是布爾什維克，無論是孟什維克，統統拒絕這種分贓妥協，都了解到，杜馬不是國會，而是新的警察騙局。

因爲，我們現在不能從選舉中取得對於黨的益處。沒有鼓動的自由。工人階級底政黨處在摧殘壓迫之下。它的代表不經法庭而被逮捕，它的報紙都遭封閉，它的會議都受禁止。黨不能在選舉中公開地展開自己的旗幟，不能大衆周知地披露自己的被選人，如果不願把他們委諸警察之手

的話。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我們的鼓動與組織的目的說來，按革命方式利用選舉會議而不參加選舉，是比爲了合法選舉而來參加選舉會議要好得多。

孟什維克拒絕選舉杜馬代表，但是他們却想選舉初選當選人與複選當選人。這是爲了什麼呢？是爲了由他們來建立人民杜馬或是建立如同全俄工人（加上農民）代表蘇維埃那樣自由的合法的代表機關麼？

我們駁斥這一點說：如果自由的代表是需要的話，那末，爲什麼在選舉他們時要顧慮到什麼杜馬呢？爲什麼要把我們初選當選人名單交給警察呢？並且既然還有（例如在彼得堡）那些舊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又爲什麼要按新花樣來建立新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呢？這樣做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因爲它可以引起不正確的夢想情緒，彷彿這些正在衰落着和瓦解着的蘇維埃之重新活躍可以經過新的選舉，而不必經過新的準備起義與擴大起義一樣。而爲了起義目的竟指定在法定期間來實行法定選舉，這就簡直是笑話了。

孟什維克援引所有一切國家底社會民主黨人都參加國會，甚至參加惡劣國會的事實爲口實。這種援引是不對的。要是國會的話，那我們也會參加到底。可是孟什維克自己也知道杜馬不是國會，他們自己也拒絕參加杜馬。人們說，工人羣衆已經疲乏了而想在合法選舉中歇一歇氣。然而黨不能並且不應把自己的策略建築在某些中心區域的一時的疲乏上面。這樣就會是毀滅黨，因爲疲乏的工人會舉出只能去玷辱黨的非黨的被選人。應該堅毅地、忍耐地去進行工作，蓄積無產階

級底力量，但不要失掉這種信心，就是相信情緒衰落不過是暫時現象，工人們將要比在莫斯科更堅強地更加勇敢地振奮起來，他們會把沙皇的杜馬掃除掉的。讓那些不發展的、黑暗無知的人們走到杜馬中去，——黨不會把自己的命運同他們這些人聯串起來。黨要向他們說：你們自己的人生經驗定會證實我們的政治預言。你們會親身體驗到，這種杜馬是怎樣一種騙局，而當你們看清黨的忠告底正確之後，那時你們就回向黨來吧。

孟什維克底策略是自相矛盾而不一貫的（既參加選舉，但又不選舉杜馬代表）。這種策略對於羣衆的黨是不中用的，因為它所給予的，不是簡單明瞭的決定，而是混亂與含糊的東西。這種策略是不合實用的，因為假使初選當選人名單落到警察手裏，那末黨就會遭受嚴重的損失。最後，這種策略在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孟什維克如果拿着我們黨的綱領去在選舉大會上發言，就不免要弄成這樣的局面，即不會是合法的選舉而會是非法地利用選舉會議而不參加選舉。警察的條件會把孟什維克參加會議的行動，從孟什維克的參加選舉策略變成爲布爾什維克所主張的按革命方式利用選舉會議的策略。

打倒杜馬！打倒新的警察騙局！國民們！用重新準備武裝起義來紀念莫斯科殉難英雄！自由選出的全民立憲會議萬歲！

這就是我們的戰鬥口號。而只有積極抵制底策略才能够與這一口號相調協。

一九〇六年一月

杜馬底解散與無產階級底任務

杜馬底解散在工人政黨面前提出許多極重要的問題。我們來指出其中最主要的幾個：一、對我們革命進程中這次政治事變的一般估計；二、確定今後鬥爭底內容以及今後鬥爭必須本着進行的口號；三、確定今後這種鬥爭底形式；四、選擇鬥爭底時機，或者，更正確些說，估計可能幫助正確選擇時機的各種情況。

我們來把這幾個問題簡單說明一下。

杜馬底解散是最顯而易見地證實了這樣一些人們底觀點，這些人們曾警告過不要沉迷於杜馬底「憲制」外觀和一九〇六年第二季中俄國政治底憲制——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表面。我們的立憲民主黨人（及準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以前，關於杜馬和涉及杜馬時所喋喋不休地說出的無數「大話」，現在已被生活揭破其一切可憐相了。

請注意一個有趣的事實，杜馬是在嚴格的憲法根據上解散的。絲毫不是「驅散」。絲毫沒有違背法律。恰巧相反，是嚴格地根據法律，猶如在任何一個「君主立憲國」裏一樣。最高政權是根據「憲法」解散了議會。該「議會」底解散是根據某某一條，又以同一法令（法律專家們，歡呼吧！）指定了新的選舉或新杜馬的召集期。

但是，在這裏也就馬上表現出了那種俄國憲制底虛幻性，那種祖國國會制度底虛構性，這種虛幻性和虛構性就是左翼社會民主黨人曾在一九〇六年整個上半年中所堅持不移地指出過的。而現在已不是某些什麼「窄狹的與狂信的」「布爾什維克」，而是最和平的合法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都承認了，用自己的行爲承認了俄國憲制底這種特性。立憲民主黨人用以承認這點的行爲是，他們曾用大批地「逃走國外」，逃到維波爾格，來回答解散杜馬，曾用違法的宣言來作回答——會用最溫和的「言論報」上的文章來作回答並且繼續回答着。「言論報」不得不承認，事實上是恢復專制制度，不得不承認，當蘇渥林寫道，他未必能夠活到新的杜馬時，這是他偶然洩漏真情。於是立憲民主黨人底一切期望就一下子從「憲制」轉到革命方面來了，——而這僅僅是由於最高政權底一種嚴格憲法行爲底結果。然而昨天立憲民主黨人還在杜馬中自鳴得意的說，他們是「皇朝底盾牌」和嚴格憲制底擁護者。

生活底邏輯較之憲法課本底邏輯有力得多。革命教導着人們。

社會民主黨底「布爾什維克」關於立憲民主黨的勝利所寫的一切（參照尼·列寧所著：「立

憲民主黨底勝利與工人政黨底任務」這本小冊子）都已明顯證實了。立憲民主黨人底全部片面性與眼光短小已是昭然若揭了。憲制的幻想，——這是人們從而認識了堅如鐵石的布爾什維克的駭人名詞——已在一切人們的眼前顯示出正是一個幻想，一個虛影，一個迷夢。

杜馬沒有了！——「莫斯科新聞報」與「公民報」正在歡喜若狂的大叫特叫。憲制沒有了！——那些非常巧於徵引憲法，非常善於咀嚼憲法條款的我國憲制底內行專家——立憲民主黨人正在垂頭喪氣的隨聲附和。社會民主黨人既不會覺得歡天喜地（我們就從杜馬也拿到了所能拿到的東西），也不至於愁眉苦臉。人民所贏得的——他們會說——就是它失去了自己的幻想之一。

是的，全俄國人民正在從立憲民主黨人的例證上學習着，不是從書本上學習，而是從自己的，它自己所創造的革命中學習。有一次我們講過，人民在立憲民主黨人的例證上消除着自己第一批的資產階級的解放幻想，而在勞動派的例證上，它消除着最後一批的資產階級的解放幻想。立憲民主黨人曾經夢想着不必推翻舊的政權，而可以從農奴制，專橫暴戾，亞細亞式苛政，專制制度下面解放出來。立憲民主黨人這些狹窄的夢想已經破產了。勞動派正在夢想着不必消滅商品經濟而可以從羣衆底貧困，從人剝削人的制度中解放出來；他們也將要破產的，——假如我國革命達到我國革命農民底完全勝利時，那他們在不遠的將來就會破產的。

立憲民主黨人的急速繁榮，他們在選舉中衝昏頭腦的勝利，他們在立憲民主黨人杜馬中的高唱凱歌，他們從「寵愛的君王」龍筆一揮之下（可以說是君王把一口痰吐到向他講愛情的羅吉澈

夫底狗臉上)的急遽破產，——所有這一切都是具有嚴重意義的政治事變，所有這一切都是人民底革命發展階段。人民，即廣大居民羣衆，到一九〇六年時，就其大衆說來，還沒有成長到具有自覺的革命性。覺得專制制度不可忍受的意識是已經普遍化了，覺得官僚政府之不中用的意識——也是如此，覺得必須有人民代表機關的意識——也是如此。但是，對於舊的政權是與有政權的人民代表機關不可調和的這一點，當時人民還不能意識到與感覺到。原來對於這一點，它還會需要特別經驗，立憲民主黨人杜馬底經驗。

立憲民主黨人杜馬，在其生存的短短時期中，把無政權的與有政權的人民代表機關間的全部區別，明明白白地昭示於人民面前了。我們的口號，立憲會議（即具有全部政權的人民代表機關）原來是萬分正確的，但是，生活，亦即革命，引進到這一口號去所走的道路，却是較之我們所能預見的道路更長遠些和更蹉跎些。

只要對於俄國大革命那些主要階段去作一般的觀察，你們就可以看見，人民是根據經驗而一步一步地走近到立憲會議口號的。請看一九〇四年末所謂「信任」時代吧。自由派在狂歡中。他們佔據了全部前台。不十分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甚至說什麼當時的兩個主要力量：自由派與政府。然而，看吧，人民被「信任」的思想所浸潤，人民「持着信任態度」於一月二十二日（九日）到冬宮去，「信任」時代湧出第三個力量，即無產階級，並奠下人民對專制政府最大的不信任的始基。「信任」時代就以人民拒絕相信政府所說關於「信任」的空話來作結束。

下一階段。允諾了召集布里根杜馬。信任是被事實證明了。人民的代表在召集着。自由派在狂歡中，號召參加選舉。自由派的大學教授們，真不愧為資產階級底「思想」走卒，都號召學生們學習，而不要從事革命。不十分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屈服於自由派底論據。人民走上舞台。無產階級用十月罷工掃蕩布里根杜馬，並奪到自由，奪到宣言，奪到那按其形式和內容都是十足憲制的宣言。人民根據經驗而信服到，單只獲得給予自由的諾言是不够的，還須有奪取自由的實力。

再往下去。政府在十二月奪去自由。無產階級實行起義。第一次的起義被擊潰了。但是在莫斯科街上那手執武器的堅強而拚命的鬥爭使得杜馬底召集成爲不可避免。無產階級的抵制沒有成功。原來無產階級尙無充分的力量去擯棄維特杜馬。立憲民主黨人充滿於杜馬之中。人民代表機關是已成的事實。立憲民主黨人在狂歡中，他們的歡呼叫囂是無量數、無止境的。無產階級却在懷疑地期待着。

杜馬開始工作。人民利用着這點少許寬泛的自由，較之立憲民主黨人多上十倍。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按其情緒與堅決性來說，瞬息間就落在人民的後面去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時代（一九〇六年五月和六月）成爲那些比立憲民主黨左些的政黨獲得最多成功的時代。在杜馬內勞動派勝過立憲民主黨人，在人民羣衆大會上勞動派責備立憲民主黨人懦弱無能，社會民主黨及社會革命黨的刊物增加着，革命的農民運動和軍隊中的醞釀加強着，被十二月事件弄得疲憊不堪的無產階級重新活躍起來。立憲民主黨的憲制主義時代成爲既不是立憲民主黨運動的時代，也不是

憲制運動的時代，而是革命運動的時代。

這種運動逼得解散杜馬。經驗證明，立憲民主黨人——僅僅是一種「泡沫」。他們的力量是從革命力量生出的派生力量。而政府却用解散杜馬來答覆革命，這按實質說來，是革命的手段（雖然按形式說是憲制的手段）。

人民根據經驗而信服到，假如人民代表機關不是有完全政權的，假如它是舊政權召集的，假如如同它並列的舊政權還是完整的，那末，這種人民代表機關就等於零。事變的客觀進程所提在日程上面的，已經不是這樣或那樣來規定法律、憲法條文的問題，而是政權的問題，真實的政權問題。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被選舉者，假如沒有政權，便會都等於零。這就是立憲民主黨人杜馬所教給人民的東西。我們且來唱着永遠紀念死人的輓歌，並好好去運用他的教訓吧！

二

於是，我們就緊接到了第二個問題：關於由歷史規定的當前鬥爭底客觀內容及我們應當給予這個鬥爭的口號。

不十分堅定的社會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就在這裏也居然表現了動搖。他們第一個口號是：以召集立憲會議爲目的，爲恢復杜馬常會而鬥爭。彼得堡委員會實行抗議。這一口號的妄誕是太

觸目了。這甚至不是機會主義，而簡直是毫無意識的。中央委員會却前進了一步。其口號是：以召集立憲會議爲目的，實行反對政府爲保衛杜馬而鬥爭。自然，這是比較好些。這已經距離下面這個口號不遠了，就是：爲推翻專制政府以使用革命的方法來召集立憲會議而鬥爭。杜馬底解散，無疑義是爲進到爭取有政權的人民代表機關之全民鬥爭的導火綫；在這個意思上，「保衛杜馬」的口號，並不是完全不能採納的。但是，問題却在於，在這個意思上說，這個口號就已經包括在我們認爲解散杜馬就是鬥爭導火綫的意思中間去了。而這個「保衛杜馬」的措詞，若不在這種（即剛才所指出的）意思上，將它加以特別說明，就會成爲不明顯的，且能產生疑惑不定，能使人覺得要恢復已消除的、在相當程度上已陳舊了的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一言以蔽之，這樣的措詞產生出許多不正確的與有害的「復古」的思想。至於這一措詞中所有正確的東西則可完全無遺地包括在我們關於鬥爭決議底理由中，包括在說明爲什麼解散杜馬是一個足夠重要的導火綫的解釋裏面。

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忘記，一個直接當前的鬥爭口號是不能從某個綱領底一般的口號中簡單地照直地得出來的。僅依據我們的綱領（請看綱領底最後一句：推翻專制制度和召集立憲會議等等）來直接決定現在當前的、一九〇六年夏天或秋天的鬥爭口號，這是不夠的。爲了這，就應該估計具體的歷史形勢，應該檢討革命底全部發展和全部一貫的進程，不僅僅從我們綱領的原則中，並且還要從運動底已往步驟和階段中來得出我們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分析才是辯證

唯物論者所必須執行的真正歷史分析。

且正是這樣的分析向我們表明出，現在客觀政治形勢所提出了的問題，不是有沒有人代表機關的問題，而是，這個人民代表機關有沒有政權的問題。

立憲民主黨人杜馬死亡底客觀原因，並不是它不善於代表人民底需要，而是它沒有執行爲政權而鬥爭的這個革命任務。立憲民主黨人杜馬會自認是憲制的機關，而在事實上，它曾是革命的機關（立憲民主黨人曾咒罵我們把杜馬看成革命底階段或武器，但生活完全證實了我們的觀點）。

立憲民主黨人杜馬會自認是反對內閣的鬥爭機關，而在事實上，它曾是爲推翻全部舊政權而鬥爭的機關。因爲當時經濟狀況是這樣要求的，所以事實也就這樣出現了。然而，正是對於這個鬥爭，如立憲民主黨人杜馬這樣的機關，原來是「不中用的」。

現在，就是最無知的農夫也根據自身痛苦經驗開始了解：假如人民沒有政權，杜馬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任何杜馬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但怎樣去獲取政權呢？推翻舊的政權，並建立新的、人民的、自由的、選舉出來的政權。或者就推翻舊的政權，或者就承認革命底任務在其由農民和無產階級所提出的範圍上是不能夠實現的。

生活本身這樣提出了問題。一九〇六年這樣提出了問題。立憲民主黨人杜馬底解散這樣提出了問題。

自然，我們不能担保，革命一下子就能解決這個問題，鬥爭將會是容易、簡單，勝利是有了

完全的和無條件的保證。無論何時和無論何人在鬥爭開始之前都不能作這類的保證。口號並不是簡單而容易勝利的担保品。口號是爲了實現當前任務所必須達到的那個目的。的指示。從前這種直接當前任務是一般地成立（或召集）人民代表機關。現在這種任務是：保證政權歸人民代表機關。而這就是說：消除舊政權，破壞舊政權，推翻舊政權，推翻專制政府。

假如這種任務不會完全解決，那末人民代表機關也就不能成爲有完全政權的，——因此，也就不能充分保證這個新的人民代表機關不會遭受到立憲民主黨人杜馬底命運。

現在客觀情勢提在日程上的鬥爭，不是爭取人民代表機關，而是爭取造成這樣的條件，使之不能驅散或解散人民代表機關，不能把人民代表機關變成滑稽劇，如同特列坡夫一流人把立憲民主黨人杜馬變成滑稽劇一樣。

三

今後鬥爭底大體形式一部分是決定於鬥爭底內容，一部分是決定於人民革命鬥爭和專制制度反革命鬥爭底過去形式。

關於鬥爭底內容，那末，我們已經指明出來，怎樣在經過兩年革命之後到現在，已使鬥爭的內容集中到推翻舊政權上面。要完全實現這一目的，只有實行全民武裝起義才有可能。

至於講到過去的鬥爭形式，那末，在這一方面，俄國羣衆運動和全民運動之「最後一言」就是總罷工與起義。一九〇五年最後的三個月，在無產階級、農民以及軍隊底覺悟部分和各種知識界、職業團體底民主部分之意識與情緒中，不能不存留着消除不了的痕跡。因此，自然而然，在解散杜馬之後，能爲進行鬥爭的最廣大羣衆所想到的第一種思想，就是總罷工。對於解散杜馬的答覆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是全俄總罷工的這一點，彷彿任何人都不會有過絲毫的懷疑。

這種意見的普遍化帶來了相當的益處。革命的組織差不多到處都能够自覺地、有系統地掌握住工人，使其不致進行各種自發的、局部的爆發。從俄國所有各處傳來的消息中都得着這樣的材料。十月至十二月的經驗，無疑義是幫助了一切人們比以前加倍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總的與同時的發動上面去。除此以外，還得指出一個最標本的事實：就是從某些大的工人運動中心，例如從彼得堡的材料來看，工人不只是容易地與迅速地領會了必須作總的與同時發動的思想，而且，除此以外，還堅定地主張實行戰鬥的與堅決的發動。關於因爲解散杜馬而舉行示威性的（一天或三天的）罷工的這個不中用的思想——從某些彼得堡的孟什維克中發生出來的這個思想——是遇到了工人方面最堅決的反對。作過多次嚴厲鬥爭的人們底準確階級本能和經驗，馬上就提醒了他們，現在的事情已經完全不是什麼示威了。工人們曾說：示威我們不會去幹。當着總發動的時機一到來，我們就去幹那拚命的堅決的鬥爭。根據一切消息來看，這就是彼得堡工人們共同的意見。他們已經了解到，俄國經歷過一九〇一年（廣大示威運動開始的一年）以來的一切之後，部分的發

動，特別是示威，便會是令人可笑的；政治危機底尖銳化排斥着又來「從頭幹起」的可能性，和平示威對於在十二月中很快意地「嘗過血味」的政府只會有無可比擬的益處。和平示威會使無產階級削弱而得不到絲毫的利益，和平示威會幫助警察兵士對手無寸鐵的人們實行演習來捉拿並槍殺他們。和平示威又只會是多少證實斯托雷平所說的豪語，說什麼他已經戰勝革命了，因為他解散杜馬並沒有使反政府的運動因此尖銳化起來。現在所有一切人都把這樣的豪語，看做是一種空洞的自誇，都知道並感覺到，鬥爭還在前面。而如果實行了和平示威的話，那就會把「示威」解釋成爲鬥爭，會把「示威」變成（沒有希望的）鬥爭，而若停止示威就會宣揚全世界，當做是新的失敗一樣。

關於這種示威性的罷工的思想只有我們的立憲民主黨底列得留·羅連輩（「」才配得上的，他們這樣近視地過分估計國會制度正如一八四九年的列得留·羅連一樣。無產階級則馬上拋棄了這種思想，而拋棄這種思想是做得非常對的。隨時同革命鬥爭直接接觸的工人們，較之某些知識分子，是更加正確地估計了敵人底戰鬥準備以及作堅決的戰鬥發動的必要。

可惜，在我們黨內，由於現時在俄國部分內社會民主黨右派佔了優勢，遂使戰鬥發動的問題被棄如敝屣。俄國社會民主黨統一代表大會，曾被立憲民主黨人的勝利所迷惑，而不善於估計我們所處時局底革命意義，迴避了從十月至十二月的經驗中做出一切結論的任務。然而擺在黨的面前的利用這一經驗的必要性，較之許多國會主義崇拜者所想像的要急迫得多和尖銳得多。我們黨

的各中央機關在嚴重關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張皇失措，也就是這種環境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全部客觀情勢又要求把羣衆政治罷工與武裝起義結合起來。在這種情形下，把罷工當做獨立的鬥爭手段，則它的弱點就表現得特別明顯。大家都已深信，政治罷工成功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它的突然性，可能使政府措手不及。現在這是不可能的。政府在十二月中已經學會了怎樣同罷工作鬥爭，而在現在已非常周密地準備好進行這種鬥爭。大家都指出，在總罷工中鐵路是極端重要的。鐵路一停——罷工就有一切機會成爲總罷工。要是不能做到把鐵路完全停止——那末，罷工就幾乎一定不會成爲總罷工。然而，鐵路工人罷工特別困難：鎮壓罷工的列車已完全準備妥當地等候着；軍隊的武裝隊伍已經在全綫，在各站，有時甚至在各單個的列車上佈置妥當。在這樣的條件下，罷工就會是——並且大半將不免會是——照直的和直接的同武裝力量衝突。司機、電報生、轉轍夫就會馬上陷入這樣的困境：或者被就地槍決（哥魯特潤諾、留別爾茨及其他俄國鐵路車站之所以在全民中負有革命大名不是偶然的），或者就去做工和破壞罷工。

自然，我們可以去期待那許許多多的鐵路工人與職員們會表現出最偉大的英勇精神，他們都是用事實證明過自己對於自由事業的忠誠的。自然，我們決不否認鐵路罷工底可能及其成功機會。但是我們亦決不可以欺騙自己，隱蔽這一任務的真正困難：隱瞞這些困難就會是最壞不過的政策。而如果去直接觀察實際情況，如果不去閉眼不看事實，那就會明瞭到，罷工會必然而且立刻長成爲武裝起義的。鐵路罷工就是起義，這在十二月事變後是無容爭辯的了。而沒有鐵路的罷工，就

不會停止鐵路綫上的電報，就不會斷絕鐵路綫上郵信的轉運，因此，大規模的郵電工人的罷工就不可能了。

由此看來，罷工對於起義的從屬意義，是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事變後造成的當前客觀情勢中決然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的。已經尖銳化的革命形勢將變示威爲罷工、變抗議爲鬥爭、變罷工爲起義，這都會不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並與任何的「指令」相違背的。當然，起義就是武裝的羣衆鬥爭，只有在某一部分軍隊積極參加之下才能熾烈起來。因此軍隊底罷工，拒絕向人民開槍，這在某種情況下，無疑義是能使僅是和平的罷工都達到勝利。但是，未必有必要來證明，這樣的情況會是特別順利的起義底枝葉事件而已，爲着使這樣的情況更加頻繁起來，爲着能够使這樣的情況更快地來到，就只有一種方法，就是：起義底有效準備，第一批起義行動底毅力與力量，由於拚命地勇敢進攻或者軍隊巨大部隊底譁變而引起軍隊底瓦解等等。

總而言之，現時，在杜馬解散時已形成了的這一客觀情勢之下，不容絲毫懷疑到，積極的鬥爭會照直和直接地引到起義。可能，客觀情勢會發生變化，那時，這一結論就必得重新審查，但在現時，這是絕對無可爭辯的。因此，號召全俄罷工，而不去號召起義，而不去解釋罷工與起義之不可分離的聯系，那就會簡直是瀕於犯罪的輕舉妄動。因此應當用一切力量去在鼓動中解釋這兩種鬥爭形式間的聯系，去準備那可以幫助把三個鬥爭潮流——工人的爆發、農民的起義、軍隊的「騷動」——匯合成爲一個巨流的條件。還在很早以前，從去年夏天著名的「波將金」軍艦起義時

起，這樣真正人民的，即羣衆的，遠遠不是陰謀的、積極的運動，即爲推翻專制制度而舉行的起義。底所有這三種形式，就已經完全確定地表明出來了。全俄起義的成功，大概主要是會取決於這三條起義河流的匯合。無疑義的，像解散杜馬這樣的鬥爭導火綫，是強有力地幫助着這種匯合，因爲農民中最落後的部分（而因此還有主要是由農民組成的我國軍隊）對於杜馬抱過很大的希望。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正是要加強利用杜馬底解散，把它當做集中鼓動來號召全民起義的導火綫。要去解釋政治罷工與起義的聯系。要用一切力量使工人、農民、海陸軍兵士們互相統一起來，共同進行積極的武裝鬥爭。

最後，說到運動底形式時，也要特別提及農民的鬥爭。在這裏，罷工與起義的聯系特別明顯。同樣明顯的，在這裏起義的目的應當不只是完全破壞或消除所有一切的地方政權，而代之以新的人民政權（任何起義的總的目的，無論在城市、在鄉村、在軍隊等等，都是一樣）——並且還要驅除地主和奪取地主的土地。在全民立憲會議還未做出決議之前，無疑義的，農民就應當力圖在事實上，去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關於這點用不着多說，因爲農民起義而不懲罰地主與奪取土地，大概是任何人都不會去這樣設想的，顯然的，這種起義愈有覺悟和愈有組織，則毀滅房屋、財產、牲畜等等的事就會愈加減少。從軍事觀點說來，爲了達到一定的軍事目的而採取消滅手段——例如，燒房子有時甚至毀滅財產，——這在一定的情況之下是完全正當的和必要的辦法。只有迂儒（或人民的叛徒）才能因農民總是採用這種手段而特別表示悲痛。但是也無須隱瞞自己，

有時毀壞財產的行動只是沒有組織性與不善於把敵人財產拿歸自己並保留在自己手裏，來代替消滅行爲的結果，——或者是由於戰鬥者勢力薄弱，以至於無力消滅敵人，粉碎敵人而只圖報復敵人的結果。當然，我們在自己的鼓動上，應該向農民詳盡解釋，一方面說明同敵人作無情的鬥爭一直直到毀滅其財產，這是完全正當的和必要的，——而另一方面，須得指出，在有充分組織性時，就可能有更合理和更有利的結局，就是：毀滅敵人（地主與官吏，特別是警察）並把所有一切財產毫不加以損壞（或者可能少損壞些）而交歸人民或農民所有。

四

與鬥爭底形式問題密切聯系的，是鬥爭底組織問題。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的偉大歷史經驗即在這一方面也對現時的革命運動印上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工人代表蘇維埃及與之相類似的機關（農民委員會、鐵路委員會、士兵代表蘇維埃等等）享有完全應份享受的巨大威信。現在，很難找到社會民主黨人或屬於其他黨派的革命者會是一般地不同情這類組織，尤其是在現時會不主張建立這類組織的。

在這一點上，大概是沒有意見分歧的，或至少是沒有多少嚴重的意見分歧的。因此，本來是無須說到這個問題的。

但是，有一方面，因為特別常被人們忽視，就必須特別仔細地論述一下。本來在偉大的十月和十二月的時日中，工人代表蘇維埃底作用（爲了簡略起見，我們把它們當做所有這一切同類組織的典型來說）曾使這些機關獲得了如此的敬愛，以至人們有時幾乎把它們當偶像來崇拜。人們這樣想像，以爲這些機關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之下，對於羣衆的革命運動，都是「必需的和充分的」。由此，就對於選舉建立這種機關的時機，對於究竟要有怎樣的實在條件才可保證它們活動成功的問題，就抱着一種非批評的態度。

十月至十二月的經驗在這點上給了最堪借鏡的指示。工人代表蘇維埃是羣衆直接鬥爭的機關。它們在初發生時是罷工鬥爭的機關。它們在必然性的迫使之下，很快就變成了同政府作總的革命鬥爭的機關。它們由於事變的發展，由於罷工轉變爲起義，就不可抑制地變成了起義的機關。許多「蘇維埃」和「委員會」在十二月事變中所起的作用正是如此，這是完全無容爭辯的事實。且事變曾極顯然而令人信服地表明了，這些機關在戰鬥時期的力量與意義是完全取決於起義底力量和起義勝利底程度的。

不是什麼理論，不是什麼人的號召，不是哪一個人所想出的策略，不是黨的學理，而是客觀情勢底力量把這些非黨的、羣衆的機關引到必須實行起義，並把它們變成爲起義機關。

所以在目前，成立這類的機關，其意義就是建立起義機關，號召成立這類的機關，其意義就是號召起義。忘記這一點，或者在廣大民衆面前模糊這一點，那就會成爲最不容寬赦的近視病和

最壞的政策。

既然如此——而這無疑義地是如此，——那末，從此也就顯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爲了組織起義，單是建立「蘇維埃」及類似的羣衆機關還是不夠的。爲了團結羣衆，爲了戰鬥的統一，爲了傳達黨的（或經各黨協定而提出的）政治領導口號，爲了引起羣衆的興趣，爲了喚醒與吸引羣衆，這些機關是必需的。但是爲了組織直接的戰鬥力量，爲了組織起義，——在這個名詞底最直接的意義上說——這些機關就不够了。

且來簡單說明一下。工人代表蘇維埃常被稱爲工人階級的議會。但是沒有一個工人會同意把自己的議會召集起來爲的是要把它送交警察手中。人人都承認必須立刻組織力量，建立軍事組織來保衛自己的「議會」，建立如像武裝工人隊伍的組織。

現在，當政府已經根據經驗而確切相信到，「蘇維埃」會引起何種結果，這些機關是些什麼，當着政府已經從頭到腳武裝起來，並正在等待這些機關的成立以便向敵人猛撲，而不讓敵人有蘇醒的餘地及開展自己活動的時間，——現在，我們在自己的鼓動上就特別應當說明，必須對於客觀情勢有清醒的觀察，必須有軍事組織同蘇維埃組織並立，以便保衛它們，以便進行起義，如果沒有起義，則任何蘇維埃與任何由羣衆選出的機關都將是軟弱無力的。

我們所說的這些「軍事組織」——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應當力圖不是經過被選代表來包括羣衆，而是包括直接參加巷戰與國內戰爭的羣衆。這些組織應當建立很小的自願的小組，十人

團、五人團、甚至可以是三人團來作爲自己的支部。應該竭盡所有力量來宣傳，戰鬥快逼近了，任何一個誠實的公民在這個戰鬥中都必须犧牲自己爲反對人民壓迫者而作戰。在組織上少講形式，少遲滯些，多簡便些，這樣的組織一定要具有最高度的能動性與靈活性。一切與每個甘願站在自由方面的人都應當立刻統一爲戰鬥的「五人團」，——這是由一些同一職業、同一工廠、或者有同志關係的聯絡、有黨的關係的聯絡，最後，簡單是有鄰居關係（住在同一鄉村、城市中同一房屋或同一住宅）聯絡的人們所組成的自願的小組。這些小組應當也有是黨的，也有是非黨的，而以一個直接的革命任務聯系起來，這任務就是：起義反對政府。這些小組，不管武裝問題如何，應當最廣泛地建立起來，並一定要在獲得武器之前建立起來。

任何一個黨組織也不能把羣衆「武裝」起來。恰恰相反，使羣衆在輕便能動、小巧靈活的戰鬥小組中組織起來，是會在事變爆發時期對於奪獲武器一層盡巨大的作用的。

自願的戰鬥小組，或「戰鬥隊員」小組——如果那個會因莫斯科偉大十二月事變而獲得莫大榮譽的稱呼來稱呼它的話，——在爆發關頭是會帶來巨大益處的。善於射擊的戰鬥隊，可以解除街警的武裝，可以突然進擊敵哨，可以爲自己奪到武器。不善於射擊或沒有奪到武器的戰鬥隊可以幫助建築街壘、當偵探、組織交通聯絡、伏擊敵人、放火焚燒敵人盤踞的樓房，佔據可以作爲起義者底根據地的住宅，——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決心戰鬥、拚命到底，熟知地形，並與居民有最密切聯繫的人們底自願小組定會完成成千成萬種種色色的機能。

要在每個工廠，在每個職工會，在每個鄉村中去分途號召組織這樣自願的戰鬥隊。彼此很相識的人們就會預先去成立戰鬥隊。彼此不相識的人們也將在鬥爭的時日或鬥爭的前夜，在鬥爭的地方，形成五人團、十人團，假使組織這樣小組的觀念廣泛地傳佈開了，並且真正為羣衆所接受的話。

現在，當杜馬解散激動了日益增多的新階層時，你們常常可以從最缺乏組織性的，按其一般面貌說最帶「黑幫」性的城市老百姓底尋常代表人中，聽到最革命的反響和聲明。我們要關心到使他們統統知道，先進工人農民決定很快就要起來為土地與自由而鬥爭，使他們統統知道必須去成立戰士們底戰鬥隊，使他們統統透徹地相信起義是不可避免和起義是具有人民性的。那時我們就可以做到——這完全不是空想——在每個大的城市中不只有幾百個戰鬥隊員，像在莫斯科十二月事變時那樣，而是有成千成萬的戰鬥隊員。而那時就會是任何機關槍都阻擋不住的，莫斯科人在指出當地戰鬥隊底性質和成分不够羣衆化和沒有充分接近人民時，曾這樣說過。

總之：到處去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組織農民委員會以及其他類似的機關，同時要進行最廣泛的宣傳和鼓動來解釋必須舉行同時的起義，必須立刻準備舉行起義的力量和必須組織羣衆的自願的「戰鬥隊」。

*

*

*

P·S·（附記）當這一節已經寫成時，我們聽說在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口號中有了新的「轉變」，就是：擁護作為召集立憲會議機關的杜馬。

因此，關於組織的問題，要用關於組織臨時革命政府的問題來補充，因為能夠真正召集立憲會議的機關，其實就會是臨時革命政府。只是不要像我們那些準立憲民主黨人所愛做的那樣，忘記了臨時政府首先就是起義的機關。試問已死了的杜馬願意成爲起義的機關嗎？立憲民主黨人願意成爲起義的機關嗎？先生們，不勝歡迎之至，我們在鬥爭中對於由資產階級民主派方面來的任何同盟者都覺得高興的。假使你們的同盟——請原諒吧！——對於我們，甚至是如同法國的同盟對於俄國那樣（就是說，金錢的來源），那末，即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也都會很高興的；先生們，我們是現實的政治家。然而如果你們，立憲民主黨人的參加起義不過是孟什維克的簡單而空洞的夢想——那末，我們就只好說：孟什維克同志們，你們的夢想真是如何渺小淺微呵。恐怕你們只會在對立憲民主黨人的「無希望的戀愛」中歸於毀滅，因為他們是不能使你們的熱情如願以償的。

從理論方面來闡明臨時政府的問題已經不止一次了。社會民主黨可以參加這個政府是已經證明了的^①。然而現在更加有趣的是，十月至十二月事變所提出的這個問題的另一提法，即在實踐上的提法。顯然，工人代表蘇維埃等等曾經在事實上，是臨時政府的萌芽；在起義勝利的情況下，政權會不可避免地轉到它們手中的。正是要把重心移去研究這些在歷史上形成的新政權萌芽機關，研究它們的工作條件與它們的成功條件。這在現時，較之拿臨時政府作「一般的」推測是更

① 請參閱本冊所載「社會民主黨與臨時革命政府」一文。——譯者註

加緊迫，更加有益些。

五

最後我們還要來考察發動的時間問題。對立憲民主黨人杜馬的溫情熱愛引起了社會民主黨右翼中立刻發動的要求。這種觀念已經遭受了重大的失敗。工人階級與城市居民羣衆底態度一般地表明出，人們意識到了，或感覺到了情勢底嚴重性。當然，期待着的鬥爭，事實上全不會是擁護杜馬，而是推翻舊政權的鬥爭。遲遲未發不過是一般情緒願意去準備真正堅決的與決死的鬥爭，並力求行動一致的結果。

可能，也許是最可靠的，由於情緒高漲與不可避免的一次爆發之結果，會使新的鬥爭如像前幾次一樣也自發地、突然地熾燃起來。假使事變會是這樣發展，假使這樣發展的進程表現出是不可避免的，那末，我們就用不着來解決發動時間的問題了，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歸結於按上述一切方向去十倍地加強我們的鼓動與組織工作了。

但是，也有可能，事變會要求我們給以領導和指定發動的時間。如果真會是這樣的話，那我們就提議把全俄的發動，把罷工與起義的時間指定在夏末或秋初，在八月中或八月尾的時候。重要的是在於利用城市中進行建築工作的時期與夏天農忙完結的時期。如果對於發動時間的問題能

够得到一切有影響的革命組織及革命會社的同意，那末，在上述日期來進行發動的可能性是不會被除外的。如果全俄在同一時間開始鬥爭，那就會有很大的優點。即使政府知道罷工的日期，也大概不會有什麼重大危害的意義；須知，這不是定要突然行動的陰謀和軍事攻擊。假使在幾星期又幾星期中鬥爭不可免的思想驚嚇着全俄各地軍隊，使他們槍不離手，而所有一切的組織又能與大批「無黨」革命家一塊更加和衷共濟地進行鼓動，那末，可以相信，全俄各地軍隊都會是精神渙散到極點的，社會民主黨底和勞動派底有威信的杜馬代表也能够來幫助這一同時發動的成功。

如果整個的俄國都相信了這一偉大的總的戰鬥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也許能掌握住羣衆使其不致進行個別的與完全沒有益處的爆發，如兵士的「騷動」及農民之無希望的起義。

但是要重說一遍，這只有在一切有影響的組織完全商妥時才可做到的。否則，依然會是情緒自發增長的舊道路。

六

我們來做一個簡要的總結。

杜馬的解散是完全轉向到專制制度。全俄同時發動的可能性日益增長着。一切局部的起義匯合爲一個總的行動的可靠性日益加強着。爲政權而鬥爭的政治罷工和起義的不可避免性是爲擴大

居民階層所感覺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厲害的。

我們的任務就在於開展主張全俄起義的最廣大的鼓動，說明其政治的和組織的任務，用一切的力量去使一切的人都相信這個全俄起義之不可避免，都看見總的進攻之可能，並且已經不是去「騷動」，不是去「示威」，不是去進行簡單的罷工與搗毀，而是去為政權而鬥爭，去進行以推翻政府為目的的鬥爭。

全部客觀形勢有利於完成這一任務。無產階級準備着去領導這個鬥爭。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面前擺着嚴重的、困難的、然而偉大的與榮幸的任務，即：幫助工人階級，幫助這個全俄起義的先進部隊。

這次起義定會推翻專制制度而建立真正有政權的人民代表機關——即立憲會議。

P·S·這篇文章是在斯維亞波爾格起義開始之前寫成的。

一九〇六年七月

註 釋

〔一〕「列得留·羅連」(一八〇七至一八七四年)是法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領袖，一八四九年立法會議庭議員。會於是年六月間組織和平示威來反對立法會議中佔多數的反動派違背憲法的行爲。這次示威被軍隊驅散了。

在大風暴之前

從解散國家杜馬以來已經有一個月了。軍事起義和企圖援助起義者的罷工之第一個段落已過去了。在某些地方，長官爲「保衛」政府而採取「加強的」和「非常的」手段來防範人民的熱潮已開始減弱下去。革命已往階段底意義日益明顯地呈現出來。新浪潮之到來日益接近了。

俄國革命走着艱苦困難的道路。在每次高潮之後，在每次局部勝利之後，接着是失敗，流血，專制制度對於爭自由的戰士們的欺凌侮辱，然而在每次「失敗」之後，運動愈加廣闊，鬥爭愈見深刻，人民各階級和各集團捲入鬥爭與參加鬥爭的羣衆愈加衆多。在革命每次進擊之後，在組織戰鬥民主運動的事業上每前進一步之後，接着是反動勢力簡直瘋狂地襲擊，接着是在組織民間黑幫分子的事業上前進一步，爲求生存而拚命掙扎的反革命勢力之無恥橫行更加增長起來。但是，不管反動派底一切努力，反動派底力量是在照直跌落下去。昨天還是持冷淡態度的或懷有黑幫情緒的工農兵士中有日益增大的部分站到革命這方面來。幻想接連地打破，成見接連地消失，而俄國人那種隨便相信，遇事忍耐，純樸、順從、容忍一切和寬恕一切等習性，都是這些幻想和成見所造成的。

專制制度遭受了許多的創傷，但是它還沒有被打死。專制制度全身都纏着繃帶和傷布，但是它還在撐持，還在掙扎，且甚至血愈流得凶，它就愈加殘暴。而人民底革命階級，以無產階級爲首，正利用每次的沉寂，以便積聚新的力量，以便予敵人以新上加新的打擊，以便，最後，連根剷除這種毒害俄國的亞細亞式的、農奴制的、可恨的潰瘡。

除了把我們革命底過去作一般觀察之外，沒有更可靠的工具來戰勝一切怯懦病，來駁倒一切對我們革命將來所抱的狹隘的、單方面的窄小卑怯觀點。俄國革命底歷史還短，但是它已經充分地、向我們證實並表明，革命階級底力量及其歷史創造性之豐富是比人們在沉寂時期所感到的更大得多。革命所經歷過的每次高潮，都表現出比較無形無聲地積聚力量來解決新的與更高任務的事實，而那所有一切對政治口號之近視胆怯的估計每次都被這些積聚了的力量所爆發所推翻。

我們革命底三個主要階段已經顯然標示出來了。第一個階段是「信任」時代，是紛紛呼籲、請願及聲言必須制憲的時代。第二個階段是頒佈憲制宣言、法令與法律的時代。第三個階段是開始實現憲制，即國家杜馬時代。起初人們向沙皇請求頒佈憲法。後來人們用強力使沙皇鄭重其事地承認了憲制。現在：現在在杜馬解散以後，人們根據經驗而信服，所謂憲法，沙皇所賞賜的憲法，沙皇法律所承認的憲法，沙皇官僚所實行的憲法，是值不了一個破銅板的。

在這每一個時代我們都看見，起初出現於前台的是喧嚷成性、自私自利、市儈式故步自封、市儈式自滿自足、預先確信自己的「承繼權」的自由資產階級，它傲然教誨「小兄弟」要從事和

平鬥爭，做忠順的反對派並把人民的自由去與沙皇政權妥協。而這般自由資產階級每次都使某些社會民主黨人（右翼分子）惶惑起來，使他們服從其政治口號，服從其政治領導。而在事實上，却在自由派玩弄政治手腕的喧嚷下面，革命的力量就在下層生長與成熟起來。事實上，負起責任來解決歷史所提到當前的政治任務的，每次都是無產者們，他們引導着先進農民，走出街心，拋掉一切舊的法規與一切舊的桎梏，用直接革命鬥爭底新形式、新手段，配合各種辦法的新方式來充實宇宙。

回憶一下一月二十二日（九日）吧。工人們會是如何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而用自己的英勇行動來結束了沙皇對人民與人民對沙皇的「信任」時代呵！他們又如何一下子把全部運動提到新的、更高的階段呵！而在外表上，一月二十二日（九日）却是完全的失敗哩。成千的無產者粉身碎首，高壓手段橫行無忌，特列坡夫政策底黑霧籠罩全俄。

自由派又佔據了前台。他們舉行了燦爛的代表大會，組成了輝煌的代表團去謁見沙皇。他們用雙手去恭迎沙皇擲下的恩物——布里根杜馬。他們就像看見了一塊肥肉的狗似的，已經開始向着革命狂吠起來，並號召學生們專心學習，而不要過問政治。革命方面的怯懦之徒也就開始說：我們到杜馬中去吧，在「波將金」鐵甲艦事變之後武裝起義是無希望的了，在和議成立後戰鬥的羣衆行動是無可指望的了。

往下的歷史任務又只是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才把它真正解決的。憲法宣言是由全俄十月罷工

所奪得的。農民和兵士跟隨工人之後，重新活躍起來，而趨向於自由和光明。進到了短短幾星期的自由，而跟隨其後面的，又是幾星期的蹂躪，黑幫派的凶殘，鬥爭之驚人的尖銳化，對於一切拿起武器來保護那已從沙皇手裏奪到的自由的人們，施行空前未聞的血的懲罰。

運動又升到更高的階段，而在外表上却又是無產階級底完全失敗。殘暴的鎮壓，擠滿了的牢獄，無止境的屠殺，背棄起義和背棄革命的自由派之卑鄙叫囂。

忠順的、自由主義的市僧們又站上了前台。他們從那般信仰沙皇的農民之最後成見中搜括政治資本。他們斷言，一有民主派在選舉中的勝利，城堡就會百病俱消。他們在杜馬中居於統治地位，又開始表現自己好像一羣吃飽了的看門狗對付「乞丐」那樣，來對付無產階級與革命農民。

杜馬底解散，這就是阻礙革命、降低革命的自由派領導權底終結。農民從杜馬方面所學到的東西比一切人都要多。現在農民所得到的東西就是他丟掉那些最有害的幻想。而且全體人民有過杜馬的經驗後已是與前回不相同了。當前的任務已估計得具體些了，已從衆所寄望的代議機關底失敗事實中體驗到了。杜馬會有助於更正確地測量力量，它至少是集中了人民運動底某些分子，它在事實上揭示了各種政黨底行爲，它在日益增多的羣衆面前把自由資產者和農民底黨的趨向更加活生生地描畫出來了。

立憲民主黨人底揭破，勞動派底團結——這是杜馬時期中兩個最重要的收穫。立憲民主黨人底假民主主義在杜馬本身中幾十次地被痛斥過，且是被那般本來決意信從立憲民主黨的人們所痛

斥過。俄國的愚昧農夫都已經不是政治上不可了解的東西了。不管那對選舉自由的一切歪曲，農夫終能表現出自己的態度並造成了勞動派的新型的政治人物。從此在革命宣言下面署名的，除那些在幾十年過程中形成起來的組織和政黨而外，又增加了一個在幾星期中組成的勞動派。革命的民主派因增加了新的組織而更加充實起來。這個組織當然還帶有不少的爲小生產者所固有的幻想，但它在現時革命中無疑是表現同亞細亞式的專制制度及農奴制的地主土地佔有制作無情的羣衆鬥爭的趨勢。

革命階級經過杜馬經驗後是更加團結起來了，更加彼此接近，更加能於去進行總的攻擊了。專制制度又受到了一個創傷。它是更加孤立起來了。它在它所完全無力解決的任務面前是更加束手無策了。而飢餓與失業現象却是更加嚴重化。農民起義底爆發是更加頻繁起來了。

斯維亞波爾格與喀琅施塔得事變昭示了軍隊底情緒。起義被鎮壓下去了，但起義是生存着、擴大着與增長着。許多黑幫分子都參加到援助起義者的罷工中來了。先進的工人們停止了這次的罷工，而他們是做得正確的，因爲罷工變成了示威，而在事實上却擺着要進行偉大堅決鬥爭的任務。

先進的工人們正確地估計了時局。他們迅速地改變了在戰略上錯誤了的運動並爲着快要到來的斷殺保存了力量。他們以其靈敏的感覺懂得了爲了起義的罷工是必然到來的，而爲了示威的罷工則是有害的。

情緒，據一切徵象看來，是在增長着。爆發是必不可免，並且，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斯維亞波爾格與喀琅施塔得的屠殺，對農民的摧殘，對勞動派——杜馬代表——的追究，所有這一切都只有煽起仇視的烈火，種下那專心準備去進行決戰的決心。同志們，鼓起更大的勇氣吧，更多相信獲得了豐富新經驗的革命階級底力量，首先是無產階級底力量吧，更多作獨立的首倡吧！據一切徵象看來，我們是站在偉大鬥爭的前夜。應當用一切力量去使這一鬥爭成爲同時的、集中的、充滿那在俄國偉大革命底一切偉大階段上轟轟烈烈顯示出來了的羣衆英勇精神的鬥爭。讓自由派去專只爲着恐嚇政府而對這個行將到來的鬥爭卑怯畏縮地點頭吧，讓這般故步自封的市僧們把全部「思維與感覺」底力量都用來期待新的選舉吧，——無產階級準備着去進行鬥爭，同心協力地、精神煥發地去迎接大風暴，衝向戰鬥底怒潮中。這種卑怯的立憲民主黨人底領導權實在令我們討厭够了，這些「蠢笨的海鵝」，只會「怯懦地把肥胖的身體藏匿在岩礁中」。

「讓大風暴來得更強烈些吧！」[⊙]

一九〇六年九月

⊙ 引自高爾基名著「海燕之歌」。——譯者註

論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

孟什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全俄代表會議上藉崩得分子的幫助成立了容許同立憲民主黨人訂立聯盟的決議。立憲民主黨的刊物歡喜若狂，並把這個好消息傳播於全世界，而輕悄悄地把孟什維克推到更下一級，更右一步。讀者可在其他地方找到代表會議決議案和革命社會民主派底特殊意見及其告選民書草案。在這裏我們就試來把與立憲民主黨人聯盟之一的與基本的政治意義描寫一下。

「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第六期，特別是編輯部作的「極左派的聯盟」一文，供給這樣描寫以很好的材料。我們就從這篇論文中表現特徵的一個地方說起。

人們對我們說——「社會民主黨人」雜誌寫道——「孟什維克，本是以推進全部杜馬走上革命道路爲己任的，在杜馬解散之後，却離開了自己的立場，而與那些革命的政黨和團體締結了聯盟，這一聯盟表現在：第一，曾發佈了兩個聯名宣言，——告軍隊的與告農民的，——第二，曾爲了當前罷工，成立了配合行動的委員會。這種對成案的援引是基於巨大的誤會。在上述情形中，我們的黨同其他革命的政黨和團體所締結的不是政治的聯盟，而是戰鬥的協定，這種協定我

們向來都認爲是適當的和必需的。」

着重點是「社會民主黨人」雜誌加的。

……不是政治的聯盟，而是戰鬥的協定……不怕上帝嗎，孟什維克同志？！這真的是不僅毫無意識而且簡直是缺乏常識。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們把聯盟了解爲僅僅是國會的協定，或者不僅僅是國會的協定。假使是第一種的話，——那末，聯盟就是爲了國會戰鬥的戰鬥協定。假使是第二種的話，——那末，戰鬥協定就是政治聯盟，因爲沒有政治意義的「戰鬥」，這就不是戰鬥，而不過是鬧架罷了。

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你們要留心留心你們的編輯員呀，真的，要留心一下，不然，真會玷辱社會民主黨呵。

——中央機關雜誌上面貢獻讀者的廢話莫非是由於簡單的失言麼？莫非是由於笨拙的語法麼？

——完全不是。「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的錯誤並不在於它鬧出了笑話，恰巧相反，其所以鬧出笑話是由於它的全部議論和它的整個立場的基礎都是根本錯誤的。把什麼「不是政治的聯盟，而是戰鬥的協定」^①的字句無意識地湊合起來，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從孟什維主義那種基本的

① 這真是奇聞怪事，孟什維克是向來都責難我們，把「戰鬥」與「政策」對立的，而他們自己却恰恰把自己的全部議論都建築在這個無意識的對立上面。

「無意識性」所必然而不可避免地產生出來的，這種無意識就在於不了解現時在俄國的國會戰鬥是完全服從，而且是最直接地服從於國會外的戰鬥條件和特性的。換句話說，個別邏輯上的失錯表現出孟什維克一般地不了解杜馬在現時革命環境中的全部作用與整個意義。

當然，我們不會來模仿孟什維克及其領袖普列漢諾夫在關於「戰鬥」與「政策」問題上同我們論戰時所採取的手段。我們不會來呵責他們，說他們，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底領袖們，竟能於締結非政治的戰鬥協定。

我們來注意下面這個問題：爲什麼我們的孟什維克在杜馬解散之後，不得不只是去同革命的政黨和團體聯盟呢？當然不是因爲什麼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者的列寧老早就鼓吹過（唯一是由於仇視孟什維克所以這樣鼓吹）這一點。而是由於客觀條件逼迫着孟什維克，違反他們的全部理論，去締結正是這樣一個革命的反立憲民主黨的聯盟。客觀條件，不管孟什維克底意志如何，也不管孟什維克底意識怎樣，曾使第一屆杜馬中的和平國會戰鬥之辯證發展，在幾天光景，就把它變成了完全不是和平的，非國會式的戰鬥。孟什維克所不自覺的（因爲立憲民主黨人的爭論擺在他們眼前），沒有正式締結過的政治聯盟，——表現於願望和最近政治趨向的共同性，爲最近政治目的而鬥爭的手段共同性，——這一不自覺的「政治聯盟」由於客觀的必然性，變成了一「戰鬥的協定」。而我們的那般聰明角色竟因碰着這個在第一屆杜馬時代的普列漢諾夫信中所未曾預計到的意外事變而驚惶失措起來，以至大叫特叫說：「這不是政治的聯盟，而是戰鬥的協

定呀！」

可愛的同志們，你們的政策其所以毫不中用，正因為你們所預計到的協定，是爲了這樣一種「戰鬥」，這種「戰鬥」是不實際的、虛構的、沒有絲毫決定意義的，同時你們所忽略的，是進行這樣一種「戰鬥」底條件，這種「戰鬥」被俄國革命底全部進程用不可征服的力量提到舞台上來，這種戰鬥甚至是從那些驟然看來彷彿是最和平的、國會式的、憲制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這種戰鬥甚至是從杜馬中羅吉澈夫之流在其關於所敬愛的不負責的君主的演說中所讚揚過的條件中產生出來的。

你們所犯的錯誤恰恰是你們枉費心機地拿來責備布爾什維克的那種錯誤。你們的政策不是戰鬥的政策。你們的戰鬥不是真正政治的戰鬥，而是兒戲的憲制戰鬥，是國會主義的白癡病。對於「戰鬥」，對於那甚至明天的條件就會要求的戰鬥，你們是這樣一種協定路線，對於「政治」你們又是那樣一種協定路線。而因此你們就無論對於「戰鬥」，無論對於「政治」都是毫不中用的，而僅僅中用於替立憲民主黨當配角的作用。

現在在我們黨內，有很多人在爭論「聯盟」這個字底意義。這一個人說：聯盟就是提出共同的名單。那一個人說：不是的，聯盟乃是提出共同的政綱。所有這些爭論都是蠢笨的，瑣屑哲學式的。不管你們稱爲聯盟的是多密切些的協定或少密切些的協定，而問題底本質是一點也不會因此改變的。爭論底實質完全不在於所容許的是密切的協定或是不密切的協定。誰要這樣設想，那

他就是陷落在微小瑣細的國會技術事務中，而忘却了這一技術事務底政治內容。爭論底實質是在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應當按什麼路線來同資產階級訂立那種——一般說來——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不可避免的協定。在布爾什維克本身中能於因局部的問題，如在選舉中需不需要同這個或那個革命資產階級政黨訂立協定而發生意見爭執，然而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爭論底實質完全不在這裏。爭論底實質仍然是在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是應當跟着自由君主派的資產階級後面，還是應當走在革命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前面。

「極左派的聯盟」一文給予大批這樣的模範例子，說明孟什維克的思維是如何從意見分歧的政治實質方面迷誤到空無所有的小事上去了。該文作者自己把無論共同的政綱，或共同的名單都叫做聯盟策略（第二頁第三欄）。同時他又斷言，我們擁護同勞動派及「社會革命」黨訂立「聯盟」，而孟什維克所擁護的，不是同立憲民主黨訂立聯盟，而只是「局部協定」。可愛的同志們，這真是小孩氣，而不是論據呀！

請你們把全俄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孟什維克的決議案拿來與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案比較一下吧。後者所提出來同一「社會革命」黨訂立協定的條件較之前者所提出來同立憲民主黨訂立協定的條件要密切些。這是無可爭辯的，因為，第一，布爾什維克所容許的僅僅是同那些為共和制度鬥爭及承認必需武裝起義的政黨訂立協定，而孟什維克則容許同一般「抱反對派態度的民主的政黨」訂立協定。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用明顯的政治標誌確定了對革命資產階級的概念，而孟什

維克不去下政治的定義，而只是寫出一些國會技術上的字眼。共和制度與武裝起義——這是一定的政治的範疇。反對派——這僅僅是國會的術語。這個術語如此含糊不清以至可以把無論十月黨人、和平革新黨人及一切對政府表示不滿的人都包括在內。固然，「民主的」這個附加是加進了一些政治成分，然而它是不確定的。它是指立憲民主黨人說的。而這恰恰是不對的。把主張君主制的黨，把贊成設立上議院的黨，把主張頒佈用苦役徒刑壓制集會出版自由的法律的黨，把那在答覆宣言中勾掉直接、平等、不記名選舉制的黨，把反對由全民選舉土地委員會的黨，稱之爲「民主的」黨——這就是欺騙民衆。這是很嚴厲的評語，但這一評語是公道的。孟什維克把立憲民主黨人稱爲民主主義者就是欺騙民衆。

第二，布爾什維克容許同資產階級共和派訂立協定只是當做「例外」。孟什維克却不要同立憲民主黨的聯盟僅僅是一種例外。

第三，布爾什維克絕對禁止在工人選民團中作任何的協定（「不同任何其他政黨訂立協定」）。孟什維克連在工人選民團內也容許聯盟，因爲此地所禁止的只是同那些「不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觀點上」的政黨和團體訂立協定。這不是偶然的，因爲在代表會議上曾有過某些具有無產階級階級感覺的孟什維克起來爭論，反對這種荒謬的語句，但他們會被大多數孟什維克所打敗了。於是就產生了這種全不肯定的、模糊不清的、讓任何冒險主義都可完全自由活動的語句。而除此以外又產生了那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說來已是卑劣不堪的意思，彷彿除了社會民主黨之

外，還有其他政黨也可以承認爲是「站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觀點上」的政黨。

既然如此，那末對於那般想來證明，說布爾什維克所承認的同共和派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的聯盟，較之孟什維克所承認的同君主派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的聯盟是更加密切些的企圖，怎得不稱之爲至少是孩子氣呢？

說什麼多密切些和少密切些的聯盟，這完全是虛假的議論，這種議論就是要來蒙蔽那關於容許同誰聯盟與爲什麼要聯盟的政治問題。請拿「社會民主黨人」雜誌第六期上所登載的「選舉政綱草案」來看吧。這是許多證明孟什維克與立憲民主黨之間是有思想上聯盟存在的關於孟什維克政策的文件之一。代表會議關於對這個選舉政綱草案加以必要的「修正」的決議案就顯著地指明這一點。請你們只來想想這一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會議會必得提醒自己的中央委員會說，在秘密的出版物中不能夠放棄爭取共和制度的口號，不可限於用一些什麼請願和鬥爭這類普泛含糊的字句來估計各種政黨，而必須從無產階級的觀點來給它們以明確的稱呼和明確的定義，應當指出起義底必要，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底階級性質，必得提醒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說在黨的第一個選舉宣言上必須着重指明黨底階級性質——這只有在中央委員會的觀點上有着深刻的不經常性，有着根本的錯誤時，才會有引起這種提醒的可能。

我們黨，是否會同立憲民主黨締結實踐協定，且其廣泛程度如何，這還不得而知。然而思想上的協定，思想上的聯盟已經擺在面前，這就是：在選舉政綱草案上把無產階級觀點與自由君主

派資產階級觀點的區別蒙蔽起來。反之，在布爾什維克告選民的宣言草案上，我們可以看見不僅僅指出這種區別，而且指出無產階級觀點與小經濟主階級觀點的區別。

在關於選舉聯盟的問題上正是要把這個原則的、思想的方面提到第一位。孟什維克企圖在那裏辯護道：我們在一切選舉鼓動中都會要獨立進行的，我們在任何方面也不會削弱這種鼓動，而只是在最後一分鐘才把自己的候選人提到立憲民主黨的名單上面去，——所有這一切辯護企圖都是枉費心機的。

這是撒謊。自然，我們相信，孟什維克中的優良分子是誠心願意這樣的。但是問題不是在於他們的願意上，而是在於現時政治鬥爭底客觀條件上。這些條件使得孟什維克在其選舉運動中的每一步驟都已經沾染了立憲民主主義，都已表現出塗抹社會民主黨的觀點。我們已經舉出選舉政綱草案這個例子來指出了這一點，現在我們還要舉出許多別的文件和議論來指出這一點。

孟什維克底主要論據是以黑幫危險為藉口。這一論據之首先的與基本的虛假處，就在於用立憲民主黨的策略及立憲民主黨的政策是不能同黑幫危險作鬥爭的。這種政策底實質是同沙皇制度

○ 孟什維克犯着這個錯誤不是第一次。在俄國社會民主黨關於杜馬的著名宣言上，他們已犯過這樣的錯誤。他們指摘布爾什維克有「社會革命」黨傾向，而他們自己却抹殺社會民主黨與勞動派觀點間的區別，於是杜馬時代的「社會革命」黨報紙就曾稱社會民主黨的杜馬宣言是剽竊「社會革命」黨的思想！反之，在我們關於杜馬宣言的對立草案上，却把我們同小資產者的區別表明得清清楚楚。

調和，即是同黑幫危險調和。第一屆杜馬已經充分的表明了，立憲民主黨人是不同黑幫危險作鬥爭的，反而說出這樣一套卑鄙絕倫的言論，說什麼君王，這個衆所周知的黑幫首領，沒有罪過與不負責任。因此，孟什維克把立憲民主黨人選入杜馬中去，不但不是同黑幫危險作鬥爭，而恰恰相反，是來遮蓋人民的耳目，模糊黑幫危險底真正意義。用那把立憲民主黨人選入杜馬中去的辦法來同黑幫危險作鬥爭，這正如用羅吉澈夫所說什麼「認爲君王要負蹂躪事件之責就是大逆不道」這種奴僕式的話來同蹂躪事件作鬥爭完全一樣。

這種流行論據底第二個過失，——就在於使社會民主黨人不聲不響地把民主鬥爭中的領導權讓給立憲民主黨人。爲什麼當選舉票分散而使黑幫勝利時，要把罪過歸之於我們沒有投票選舉立憲民主黨人，而不把罪過歸之於立憲民主黨人不投票選舉我們呢？

——我們是佔少數的——被耶穌馴順精神所浸透了的孟什維克答覆道——立憲民主黨人多一些。且立憲民主黨人是不能宣佈自己爲革命者的。

——對呀！但是這並不能作爲要社會民主黨人宣佈自己爲立憲民主黨人的論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當資產階級革命半途而廢的結局中，不曾有，也不能有社會民主黨人成爲對抗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多數。可是，到處，在一切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在選舉運動中第一次的獨立出台，都遇到了自由派底狂號狂咬來誣蔑社會主義者幫助黑幫派。

因此我們很恬然自若地聽着孟什維克所發出的屢見不鮮的喊聲：布爾什維克幫助黑幫分子當

選。一切自由派都會向一切社會主義者這樣叫喊過。你們既拒絕同立憲民主黨鬥爭，那就是把許多能於跟隨社會民主黨走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分子放到立憲民主黨人的思想影響之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如果你們不中止其爲社會主義者，那你們就必得去作獨立的戰鬥，而不管那黑幫的危險了。而在今天作出這一正確步驟是較之明天更容易些，更需要些。在第三屆杜馬中（假如在第二屆之後它將召集起來的話）你們就會更難破裂你們同立憲民主黨的聯盟，你們還會被你們那種對革命叛徒的反常關係糾纏得更加厲害。而真正的黑幫危險，——我們重說一遍——全然不是在杜馬內的黑色議席，而是蹂躪和軍事法庭。你們既然用立憲民主黨的煙霧遮蓋着人民的眼睛，你們就妨礙人民同這個真實危險作鬥爭。

這種流行論據底第三種虛假處，就是對杜馬及其作用之不正確的估計。在這篇論「極左派的聯盟」的美妙文章中，孟什維克會不得不一反自己通常的斷言而承認問題本質並不在於技術上的協定，而正是在於兩個策略底根本政治區別。

在這篇文章中，這樣寫着：

「『聯盟』的策略，不管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是打算在將來的杜馬中形成擦掉社會民主黨色彩的團結的革命的少數，這個少數同杜馬的多數作系統的戰爭，也如同政府作戰一樣，

○ 立憲民主黨人開始自供說，在這選舉中有由左方來的危險威脅他們（「言論報」關於彼得堡州報告上的原文），

立憲民主黨人用其關於黑幫危險的喊叫聲來愚弄孟什維克，以便免除由左方來的危險！！

並且，一到相當時機，就擯棄杜馬，而宣佈自己是臨時政府。局部協定的策略，爲的是要盡可能把杜馬當做整體來利用，即是說，利用杜馬的多數，以便同專制制度作鬥爭，同時經常保持杜馬中獨立社會民主黨團底極端派的立場。」

關於「擦掉色彩」這點，我們已經指明過，犯了這種罪過的正是孟什維克，無論在工人選民團的選舉方面也好，無論在較自由地容許聯盟方面也好，無論在思想上用立憲民主主義來代替社會民主主義方面也好，都是如此。孟什維克關於「宣佈」臨時政府一層的斷言也同樣可笑的，他們忘記，事情不在於宣佈，而在於起義底全部進程及其勝利。如果臨時政府不是起義機關，那末它便是空洞的詞句、是空洞的冒險。

但是，按問題實質說來，孟什維克在以上的引文中偶然說出了神聖的真理。的確，一切問題都正是歸結於：我們是要爲了「清一色的」自由派杜馬（「整體的杜馬」）來犧牲社會民主黨選舉運動底獨立性呢，或者不是呢？的確，在布爾什維克看來，更加重要的是選舉運動底完全獨立性，是我們政策與我們杜馬黨團之完全的（而不是半立憲民主黨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性。而在孟什維克看來，更加重要的是清一色的立憲民主黨杜馬參有大量按半立憲民主黨方式當選的社會民主黨人。有兩種杜馬：一種是兩百個黑色分子，二百八十個立憲民主黨人，二十個社會民主黨人；另一種是四百個立憲民主黨人與一百個社會民主黨人。我們寧可選擇第一種杜馬，並認爲，那把從杜馬內排除黑色分子當做是消除黑幫危險的觀點便是孩子氣的觀點。

對於我們，路綫到處只有一條：無論在選舉戰鬥中，無論在杜馬戰鬥中，無論在街巷戰鬥中，——都是槍不離手。到處都是：社會民主黨同革命的資產階級一塊去反對叛賣人民的立憲民主黨人。而孟什維克對於杜馬的戰鬥則同立憲民主黨人一塊來進行（擁護整個杜馬與立憲民主黨內閣），而一到看見有起義可能的時候，他們就改變策略，締結「不是政治的聯盟，而是戰鬥的協定」。因此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在代表會議上說的話是很對的，他說：崩得分子既擁護同立憲民主黨聯盟，那就是偷運擁護立憲民主黨內閣的私貨。

我們所錄出的引文，就是再好不過地證實着，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盟如何是把孟什維克關於選舉運動口號決議的那些好聽詞句變成空話，如：「在杜馬內組織革命力量」（而不是組織立憲民主黨的附屬品，破壞真正的革命力量嗎？），——「暴露杜馬底無力」（而不是對羣衆掩蓋立憲民主黨人底無力嗎？），——「向羣衆解釋希望鬥爭和平結局是幻想」（而不是在羣衆中去鞏固那產生幻想的立憲民主黨影響嗎？）。

立憲民主黨的刊物也極妙地估計了孟什維克與立憲民主黨聯盟底政治意義。我們在上面講過：是跟在自由派後面呢或是走在革命者前面。我們且援引我們的政治刊物來證實這點。

你們是否可以找到多少嚴重的大批證據，證實布爾什維克是跟在資產階級革命者後面並以他們爲轉移呢？連說及這一點都是令人可笑的。俄國的全部刊物都顯著的表明着，並且革命者底一切敵人也承認着，正是布爾什維克進行着獨立的政治路綫，而把資產階級革命者底個別集團與優

秀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來。

而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又怎樣呢？他們所擁有的刊物較之全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刊物的總數要多十倍。且正是他們獨立地執行政治路線，而把孟什維克和人民社會主義者變成他們的簡單配角。

所有立憲民主黨的刊物都僅僅從孟什維克的決議案中引錄關於聯盟的地方，而把「杜馬無力」，「在杜馬內組織革命力量」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都刪去。立憲民主黨人不只是把這些東西刪去，並且直接責罵這些東西，或者說是「空話」，或者說是孟什維克底「不徹底性」，或者說是「孟什維主義底口號不穩定性」，或者說是加在孟什維克身上的「布爾什維克底有害影響」。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政治的生活，不依我們的意志為轉移，違背孟什維克中優良分子的願望，正在汲取孟什維克底立憲民主黨的事業而拋棄他們的革命詞句。

立憲民主黨人一面把孟什維克的幫助裝在自己荷包中，一面拍着普列漢諾夫底肩膀，感謝他鼓吹聯盟，而同時又如此輕蔑如此粗率，好像他吞了劫來財富的商人一樣，大喊大叫着：孟什維克先生們，這太少呵！還須在思想上接近起來呵！（請看「同志報」上評論普列漢諾夫信的文章），——孟什維克先生們，這太少咧，還須停止論戰或者至少要改變這種論戰呵！（請看立憲民主黨左翼的「世紀報」關於我們代表會議決議案的社論）。我已用不着說到「言論報」，它簡直是呵責那戀慕立憲民主黨人的孟什維克說道：「我們是到杜馬中去立法」，而不是去搞革命呀！

可憐的孟什維克，可憐的普列漢諾夫！立憲民主黨人已經很滿意地讀過他們的愛情信了，但還是不讓他們越過前廳一步。

你們去看看普列漢諾夫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的「同志報」上面的言論吧。普羅科坡維奇先生與苦斯可瓦夫人曾如何歡天喜地的來迎接這種言論，他們兩人就正是在一九〇〇年因為企圖用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敗壞社會民主黨，而被普列漢諾夫把他們從社會民主黨內趕出去的。現在普列漢諾夫却接受了普羅科坡維奇與苦斯可瓦之有名的「Credo」^①的策略，——而伯恩施坦派就厚顏地向他連送飛吻，叫道：我們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從來就是這樣說呀！

而普列漢諾夫爲要走進立憲民主黨的前廳上去，竟只好在全體人民面前宣佈背棄自己昨天的聲明。

請看下面的事實。

一九〇六年七月，杜馬解散之後，普列漢諾夫在「日記」第六期上，曾這樣寫道，參加運動的政黨應當彼此協商好。爲要一塊作戰，就須得預先商妥。「敵視我國舊制度的政黨應當……彼此商定這種宣傳底基本思想。而在杜馬解散之後，只有立憲會議的思想才能成爲這樣的思想」……「只有」立憲會議的思想。這就是普列漢諾夫在一九〇六年七月的政治聯盟與戰鬥協定

① 這一文件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底抗議書」一文（收在「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一書中）。——譯者註

的計劃。

經過五個月，到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時，普列漢諾夫改變了協定底路線。爲什麼呢？難道是從那時起要求立憲會議的政黨與不要求立憲會議的政黨間相互關係已經改變了嗎？

從那時起，按一般公認，立憲民主黨還更加右傾了。普列漢諾夫却走到立憲民主黨刊物上去發言，而對立憲會議默不作聲，因爲在自由派的前廳上是禁止談立憲會議的。

難道不顯然是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已經滑跌下去了麼？

但這還不够。同是在「日記」第六期上，普列漢諾夫直接說過立憲民主黨人。當時（這好像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呵！）普列漢諾夫解釋過立憲民主黨的那種不信任立憲會議思想之貪圖私利的階級特性。當時普列漢諾夫的的確確這樣寫着：

「誰在這樣或那樣的藉口之下拒絕宣傳這種思想（立憲會議的思想），他就可以使人明顯的了解到他其實並不去找尋對斯托雷平先生及其同僚們行動的恰當的回答，他，雖然心裏不安，是去同這些行動調和；他起來反對這些行動僅僅是在口頭上，僅僅是裝腔作勢」（着重點是我加的）。

現在普列漢諾夫走進立憲民主黨的報館以後，他就從實現思想上的聯盟來開始鼓吹選舉聯盟。在立憲民主黨的報紙上，普列漢諾夫不願意向人民說出：立憲民主黨人是同斯托雷平匪幫調和的，他們起來反對，僅僅是裝腔作勢。

爲什麼普列漢諾夫不願意把他在一九〇六年七月所說過了的話再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來重複說說呢？

請看這就是同立憲民主黨作「技術」聯盟的意義，也正是因此，所以我們要同主張這樣聯盟的社會民主黨人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

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你們不是狂歡得太早麼？社會民主黨人將不要聯盟，在高加索與烏拉爾，在波蘭與拉脫維亞邊區，在莫斯科中心省，也許，還在彼得堡，進行選舉。

不同立憲民主黨人訂立任何的聯盟！不同那些與斯托雷平匪幫調和的人作任何的調和！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

出席統一代表大會的

前「布爾什維克」政派組織代表告全黨書

同志們！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統一代表大會已舉行過了。再沒有分裂了。不僅以前「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底派別組織已經在組織上完全溶合起來，並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波蘭社會民主黨也達到了統一，同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也簽訂了統一，並同猶太社會民主黨——崩得，也預定統一起來。這些事實底政治意義在任何條件下都會是很偉大的，而由於現處的歷史局勢，這一政治意義真是重大之至。

俄國大革命底全部命運，大概是在最近將來就會解決的。領導廣大城鄉貧民羣衆的無產階級從革命最初之日起直到現在都是走在革命前頭的。由於人民鬥爭底快要來到的這些霹靂驚人、左右全局的事變，使得促成全俄各地、全俄各族覺悟無產階級底實際統一成爲最關重要。在現今這樣的革命時代，黨底任何理論上的錯誤與策略上的偏差，都要遭受生活本身之最無情面的批評，

這個生活正在以從來未見的速度教育着與訓練着工人階級。在這樣的時候——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底責任，就是要力圖使關於理論和策略問題的黨內思想鬥爭進行得盡量公開和廣泛自由，但是須使這種鬥爭無論如何都不致破壞和妨害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行動底一致。

俄國大革命正處在轉變關頭底前夜。資產階級俄國底一切階級反專制制度的鬥爭得到紙上空文的憲法。一部分資產階級已經因此完全滿足而背棄革命。另一部分資產階級雖願意繼續前進，却以按「憲制」軌道進行鬥爭的希望來欺騙自己，並準備承認那動搖不定與假仁假義的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之選舉勝利，爲人民自由的真實勝利。

廣大農民羣衆奮不顧身地進行鬥爭反對舊式的、農奴制的俄國，反對官吏的專權與地主的盤剝，他們仍然站在革命方面，但是他們還遠未完全覺悟起來。那部分革命民主主義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少有覺悟的。只有無產階級，曾在十月爲爭取自由而英勇鏖戰，曾在十二月爲保衛自由而動用武器，只有無產階級仍舊是徹底革命的階級，這個階級，正在收集新的力量，而自覺地準備新的、更加偉大的戰鬥。

沙皇政府靦然公開地玩耍着它那套憲制的把戲。它把自己的舊政權保存在手，它繼續並加強追究那些爭取自由的戰士，它顯然要把杜馬變成一個純粹空談的場所——掩護專制制度的屏障，欺騙民衆的武器。這種策略能否奏效——這在最近將來就會解決，就會由現在正在成熟着的新的革命爆發底結局來解決。

假使全俄無產階級將會緊密地團結起來，假使它善於把一切真正革命的、能於去作鬥爭而不是去幹妥協的人民階層鼓舞起來，使之跟隨自己，假使它很好地準備戰鬥並準確地選擇為自由而作最後一戰的時機——那時，勝利就會屬於它的；那時，沙皇那套玩弄憲制的欺人把戲就會遭受失敗；那時，資產階級與專制制度的分贓妥協就會幹不成功，那時，俄國革命就不會像西歐十九世紀底革命那樣成為未曾完結的、半途而廢的、對於工人階級與農民利益說來其中四分之三是無成果的；那時，這就會是真正偉大的革命，——人民起義底完全勝利就會把資產階級的俄國從一切舊的鎖鏈中解放出來，並且也許會開關西歐社會主義革命底時代。

社會民主黨既力圖達到完滿的民主革命，就應當在自己全部工作中估計到新的革命爆發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當毫不留情地去揭破那些既為政府所培養，又為那以自由派的政黨——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所支持的憲制幻想；我們應當號召革命農民為着農民起義完全勝利的事業而團結起來，我們應當向廣大羣衆去解釋第一次十二月起義底偉大意義及新的起義之不可避免，只有這種新的起義才是唯一無二的能於真正奪取沙皇專制制度底政權，並真正把這政權轉交予人民。這就應是當前歷史時機中我們策略底基本任務。

我們不能，而且不應對下面這一事實默默無言，就是，我們深信黨底統一代表大會未曾完全正確地了解到這些任務。在代表大會底三個最重要決議案上確定地表現出在代表大會上佔多數的前「孟什維克」派別組織底錯誤觀點。

在土地綱領上，代表大會原則上通過了「市有化」。所謂市有化就是份地歸農民私有，而轉交地方自治局的地主土地則由農民租佃。實質上這就是在真正土地革命與立憲民主黨土地改良之間的某種中庸辦法。農民是不會接受這樣的計劃的。他們會要求或則逕直分配土地，或則把全部土地轉交人民所有。只有在完滿的民主變革底情況下，在官吏民選的共和制度下，市有化才能成爲切實的民主改良。我們也就向代表大會提議過，至少要把市有化同這些條件聯系起來，——但是代表大會拒絕了我們的提議。而沒有這些條件，則市有化，這種自由派官僚主義的改良，所能給予農民的，將全然不是農民所需要的東西，而同時却又是替地方自治局中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反無產階級分子造成新的力量、新的影響，而實際上把土地分配權交給他們之手。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向廣大的工農羣衆解釋。

代表大會在其關於國家杜馬的決議案中認爲在這個杜馬內建立社會民主黨底國會黨團是適宜的。代表大會不願顧及下面這種事實，即俄國十分之九的覺悟工人，其中包括所有一切波蘭的、拉脫維亞的、猶太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者，都會抵制這個杜馬。代表大會拒絕了那種主張要可能在羣衆中作真正廣大鼓動爲參加選舉的條件之提議。它又拒絕了那種主張只有由工人組織提出爲國家杜馬候選人的才能成爲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組成員的提議。由此可見，代表大會是踏進了國會議主義底道路，且甚至不拿歐洲革命社會民主派在這方面的經驗所制定的保障來衛護黨。

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當然承認了在原則上定要把國會議主義當做無產階級鬥爭武器來利用，

但是全部問題在於：在現時這種條件下，對於像我們杜馬這樣的「國會」，社會民主黨的參加是否可允許的呢？當沒有由工人組織選舉出來的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員時，是否可允許建立國會黨團呢？我們認爲，是不可以的。

代表大會拒絕了把那同憲制把戲作鬥爭，同憲制幻想作鬥爭提作黨底任務之一的提議。代表大會未曾說明在杜馬中佔統治地位的「立憲民主」黨底兩重性，在這個黨中那種力圖同專制制度分贓妥協，力圖鈍化革命與停止革命的趨向是如此之強。代表大會是過分被那謀專制制度與人民自由妥協的資產階級妥協者政黨之曇花一現、虛有其表的勝利之印象所迷惑了。

在關於武裝起義的決議案中，代表大會同樣未曾給以必要的指示：如逕直批評無產階級底錯誤，明顯地估計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底經驗，——研究罷工與起義底相互關係，哪怕是企圖來研究一下都好；竟不如此，而在決議案中倒是一些卑怯地避開武裝起義的遁詞佔着優勢。代表大會固然沒有公開明顯向工人階級說，十二月起義是錯誤的；但同時代表大會却在隱蔽形式下指責了十二月起義。我們覺得，用這種方式不僅不能發揚無產階級底革命意識，而且會蒙蔽無產階級底革命意識。

我們應當而且定會進行思想鬥爭，去反對那些我們所認爲是錯誤的代表大會決議案。但同時我們向全黨聲明，我們反對任何分裂。我們主張服從代表大會底決議。我們反對抵制中央委員會並重視協同工作，我們同意了與我們觀點一致的人加入中央委員會，哪怕他們在那裏會是微微的

少數。我們深信，社會民主主義工人的組織應當是統一的，但是在這些統一的組織中間，應當廣泛地進行對於黨底問題的自由討論，對於黨底生活現象之自由的同志批評與估計。

在組織問題上，我們分歧之點僅僅是關於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底權限問題。我們堅持中央委員會有權指定並更換中央機關報底編輯部。我們之間對於民主集中制底原則，對於保證任何少數與任何忠順的反對派底權利，對於黨的每個組織底自治權，對於承認黨底一切負責人都要經過選舉，要做報告並可加以更換等，都一致同意了。我們認為實際地遵守這些組織原則，誠意地、一貫地實現這些組織原則，才可保證不至分裂，保證黨內思想鬥爭能夠而且應當同嚴格的組織上的統一、同全體黨員服從共同代表大會決議的原則全相吻合。

我們號召所有與我們觀點一致的人要實行這樣的服從並作這樣的思想鬥爭；我們敦請全黨黨員來仔細估計代表大會底決議。革命會教導人們，——而我們也就相信：全俄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鬥爭底實際統一，定能使我們黨不致在那即將到來的政治危機總解決的時日犯到悲慘的錯誤。一到戰鬥關頭，事變本身會提示工人羣衆以正確的策略。我們要竭全力來使我們對於這種策略的估計會幫助革命社會民主黨任務底實現，使工人政黨不致因追逐虛有其表的勝利而離開無產階級的堅定道路，——使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把自己的爲自由鬥爭的先進戰士之偉大作用執行到底！

一九〇六年五月（四月）

反對抵制

(一個社會民主黨政論家底時評之一)①

五

抵制是俄國革命最富於事變和最英勇時期底優良革命傳統之一。我們在上面說過，我們的任務之一，就在於一般地關心保護這些傳統，培養它們，並把那些自由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寄生物清除出去。必須將這個任務加以若干分析，以便恰當地確定其內容並消除去那些可能容易發生的誤解和誤會。

馬克思主義與一切其他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兩種特點，一方面它對於分析客觀情勢與客觀進化行程具有完全科學的清醒見解；另一方面它對於羣衆——而當然也對於那些善於探索及實現與某些階級聯系的個別人物、集團、組織和政黨——之革命毅力、革命創造力和革

① 這裏僅節譯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俄文版編者註

命首創性底意義又予以最堅決的承認。馬克思對於人類發展中的革命時期給以極高的估價，這是從他的整個歷史觀點之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那些從所謂和平發展時期中逐漸積累下來的無數矛盾，只有在革命時期才能得到解決。正是在革命時期中，才最有力地表現出各階級在決定社會生活形式中的直接作用，創造起政治「上層建築」底基礎，然後這個政治上層建築在革新的生產關係基礎上支持一個長時期。馬克思與自由資產階級理論家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這些革命時期不是脫離「常」軌，不是「社會病」底表徵，不是過激和錯誤底可悲的結果，而是人類社會史中的最有生命力的、最重要的、主要的和決定的契機。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羣衆革命鬥爭時期，成爲他們生平事業的特出的中心點。他們總是從這一點出發去判斷各國工人運動和民主主義運動底命運。他們每當要判明各階級內在天性及其傾向之最明顯的、最乾淨的形態時總是回到這一點上來。他們總是從那個革命時代着眼來評判後來較小的政治結合和組織，政治任務和政治衝突。無怪乎自由主義底思想領袖們，如桑巴德之流，總是極端仇視馬克思底活動和著作底這一特色，而把它歸之於「流亡者底怨憤」。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革命世界觀底最不可分離的構成部分，歸之於個人的怨憤，歸之於個人的流亡生活的困苦，——這恰好是警察資產階級的大學科學中鑽出來的臭蟲所幹慣了的把戲哩。

馬克思在其所寫的一封信中，大概是給顧格曼的信中，順便說了一個極端值得注意的意見，這個意見對於我們現在所談論的問題是特別有意義的。他指出說，在德國的反動勢力幾乎做到了

把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底印象和傳統完全從人民意識中剷除掉了。在這裏把反動勢力對於本國革命傳統的任務和無產階級黨對於本國革命傳統的任務顯明地對比起來了。反動勢力底任務就在於剷除這些傳統，把革命形容爲「瘋狂的自發現象」——這是司徒盧威從德文「das tolle Jahr」幾字譯出的（即「瘋狂之年」，是德國警察資產階級的歷史家，甚至更廣一些，是德國大學教授的歷史學用來形容一八四八年的說法）。反動勢力底任務，是要使居民忘却在革命時代所如此豐富、如此紛繁地產生出來的那些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那些思想和口號。英國市僧主義的愚蠢歌頌者維伯夫婦力圖把憲章運動，英國工人運動底革命時代，說成爲簡單的孩子氣，「青年的罪孽」，不值得認真注意的幼稚行爲，偶然的反常的脫軌行爲；德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對於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也是這樣蔑視它。反動勢力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態度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至今還在激起最兇惡的仇恨，這就證明它至今生氣勃勃及其對於人類影響底力量。同樣地，我國反革命底英雄們，特別是昨天還是「民主派」的人物如司徒盧威、米留可夫、基則維特爾及「quantit」^①，互相競賽來卑鄙不堪地詆譏俄國革命底革命傳統。自無產階級底直接的羣衆鬥爭，爭得了一小塊自由而使舊政權底自由主義奴僕們對此嘆賞不置的時候至今，還不到兩年，而在我國政論著作中，就已造成了一個自稱爲自由主義的（!!）巨大思潮，這種思潮是在立憲民主黨的

①「諸如此類」。——譯者註

刊物中培養起來的，它所專心從事的工作就是把我們的革命、革命鬥爭方法、革命口號和革命傳統描寫成爲卑下的、簡單的、幼稚的、自發的、瘋狂的等等直到罪過的東西……從來留可夫到加美山斯基〔Илья qu'un pasi〕^①。另一方面，反動勢力起初把人民從工農代表蘇維埃驅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的杜馬中，現在又把人民驅到十月黨的杜馬中，而俄國自由主義底英雄們却把這些成功認爲「俄國憲制意識增長的過程」。

無疑義的，俄國社會民主黨負有責任，要對於我國革命作最細心的和最詳盡的研究；要把革命鬥爭形式、組織形式等等傳佈到羣衆中去，使羣衆熟識它們；要把革命傳統在人民中鞏固起來；要羣衆確信，僅僅只有經過革命鬥爭才能取得若干嚴重的、若干牢固的改善，要一貫地揭破那些妄自尊大的自由派之全部下賤無恥，他們以「憲制的」崇拜、變節和摩爾察林主義底瘴氣來毒化社會的空氣。十月罷工或十二月起義之每一天在爭自由的鬥爭史中的意義，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比立憲民主黨人在杜馬中奴顏婢膝式的把什麼不負責的君主專制和君主立憲制說上幾個月的意義還要大一百倍。我們一定要設法——除了我們之外任何人也不會來設法——使人民知道這些充滿生命力、內容豐富以及按其意義和結果都是偉大的日子，要使人民知道這些日子比知道那些「憲制的」窒息和巴拉雷金——摩爾察林式的旺盛〔^②〕的幾個月——亦即我們的自由主義黨的和非

① 「只差一步」。——譯者註

黨的「民主主義」的（呸！呸！）刊物，在斯托雷平及其檢查官和憲兵這一批爪牙之慈悲庇護下，拚命頌揚的那幾個月，——更詳細得多，詳盡得多，透徹得多。

無疑義的，正是因為革命家努力保持過去革命時代優良傳統的趨向，努力以大胆的、公開的和堅決的鬥爭火花來使現在單調的沉悶生活的泥潭活躍起來的趨向——正是由於這種值得尊敬的努力趨向現在引起着許多人對於抵制的同情。但正是因為我們重視這種對於革命傳統的保護，所以，我們必須反對這樣的一種見解，彷彿採用特殊歷史時代底一個口號，就能促使那個時代底主要條件復活起來一樣。保存革命傳統，善於利用這些革命傳統來經常從事宣傳和鼓動，來使羣衆熟悉反對舊社會的直接的和進攻的鬥爭條件——這是一回事；把一個口號從產生它和保證它成功的那些條件總和中拆開出來，加以背誦和把它應用到根本不同的條件上去，——這是另一回事。

馬克思既這樣重視革命傳統，並無情地斥責過那種對於革命傳統所採取的叛徒式的，或庸俗的態度，而同時又要求革命者要善於思維，善於分析，應用舊的鬥爭手段的條件，而不是簡單背誦某些口號。法國一七九二年的「民族的」傳統，或許會永遠成爲一定的革命鬥爭手段底榜樣；但這並沒有妨礙馬克思於一八七〇年時在有名的國際「通告」中，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犯到把那些傳統搬到另一個時代條件中來的錯誤。

現在在我國也是如此。我們應當去研究應用抵制的條件，我們應當灌輸羣衆以這樣的思想，即當革命高漲時，抵制是完全正當的而且有時是必要的手段（不管那些徒然稱引馬克思名字的學

究們說些什麼)。但是否存在有這種高漲，這個宣佈抵制的根本條件呢——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善於獨立地提出，並根據對事實的認真的分析來加以解決。我們的責任就在於盡我們能力之所能及，去準備這樣革命高漲底來到，也不拒絕在適當的時機運用抵制；但如果把抵制這個口號，視為對於任何一個壞的或極壞的代議機關都是一般適用的，那就是絕對錯誤了。

你們試拿在「自由時日」用以辯護和證實抵制的論據來看吧，你們就可立即看出簡單地把這些論據搬到現在的客觀條件上來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初主張抵制時曾說過，參加選舉就會降低情緒，就會把陣地讓給敵人，就會把革命人民導入歧途，就會使沙皇制度與反革命資產階級容易妥協等等。這些論據所依靠的基本前提——這個基本前提並沒有常常說明，但始終是理解為在當時是不言而喻的東西——是什麼呢？這個前提就是羣衆底豐富革命毅力，那個不管任何「憲制的」途徑而尋找，並找得自已直接出路的革命毅力。這個前提就是革命對反動的不斷進攻，如果當時我們去進佔並防守那是敵人爲了削弱我們的總攻擊而故意讓給我們的陣地，因而削弱我們的進攻，那就是犯罪的行爲。你們試試離開這個基本前提底種種條件去重複那些論據吧，你們就可立即覺到你們的全部「音樂」底不和諧，你們的基調底錯誤。

企圖用第二屆杜馬與第三屆杜馬的區別來辯護抵制是徒然的。認爲立憲民主黨人（他們在第二屆杜馬中曾把人民完全出賣於黑幫）與十月黨人之間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差別，以爲這個被六月

十六日（三日）的政變所撕毀的鼎鼎大名的「憲制」，有多少真實的意義，——這種觀點，一般地與其說是符合於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精神，不如說是符合於庸俗化的民主主義精神。我們常常說過，再三申說過：第一屆與第二屆杜馬的「憲制」只是一個幻影，立憲民主黨人底花言巧語，只是一種用來掩蓋他們的十月黨的實質的遮眼法；杜馬這個工具，對於滿足無產階級與農民底要求是完全不中用的。在我們看來一九〇七年六月十六日（三日）政變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失敗之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從來沒有被杜馬憲制底美色「所迷」，所以，我們就不會因為從那由羅吉澈夫的詞令所掩蓋和粉飾着的反動過渡到赤裸裸的、公開的、橫蠻的反動，而感到什麼失望。也許，後一種反動，對於一切厚顏無恥的自由派傻瓜，或被他們引入歧路的那一部分人，還會是一副更好得多的清醒劑哩……

試把關於杜馬問題的孟什維克的斯德哥爾摩決議案與布爾什維克的倫敦決議案比較一下吧。你們就可以看到孟什維克的決議案，是誇揚、鋪張、充滿着誇大杜馬意義的詞句，充溢着認為杜馬工作有偉大意義之意識。而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案却是簡單的、乾脆的、冷靜的和不誇張的。孟什維克的決議案中浸透了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與立憲主義舉行結婚盛典的一套市儈們慶祝的精神（什麼「從人民底胞胎中生長起來的新政權」等等一類的官場假話）。而布爾什維克的決議案，却可用下述語句大約地表達出來：既然可惡的反革命把我們驅入到這可惡的豬欄中去，那末，我們也將在那裏做有利於革命的工作，既不悲泣，但也不誇口。

孟什維克還在直接革命鬥爭時期，就擁護杜馬而反對抵制，並向人民担保杜馬會是革命底一種武器。他們的這種担保是在歡天喜地中場台了。而如果我們布爾什維克也担保了些什麼的話，那末，只是斷言杜馬是反革命底劣子，不能盼望杜馬做出什麼真正好事來。我們的觀點到現在都是非常明顯地被證實了，而且可以保證，未來的事變還要證實我們的觀點的。若不在新的事實材料底基礎之上「改正」和重複十月至十二月的戰略，在俄國是決不會有自由的。

所以，如有人向我說：我們不能像利用第二屆杜馬那樣來利用第三屆杜馬，不能使羣衆了解爲什麼必須參加杜馬，那末，我就要這樣回答他：如果把「利用」的意思了解爲像孟什維克那樣的誇大詞句，什麼革命底一種武器等等，那末，當然是不能的。然而，就是前兩屆杜馬也在事實上表明了不過是到十月黨的杜馬之梯階，而我們還是爲了這樣簡單而有限的目的^①（對羣衆作宣傳、鼓動、批判和解釋當前發生的事件）利用了它們，爲了這樣的目的，就是最壞的代議機關，我們也常常都能利用的。在杜馬中的演說，不會引起任何「革命」，與杜馬有關聯的宣傳也沒有

① 參閱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出版的）「無產者報」上論「抵制布爾根杜馬與起義」一文（見本冊第七〇頁——譯者註）。我們在這篇論文中指出了我們並一般地拒絕利用杜馬，但我們現在是在解決另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即爭取直接革命途徑的任務。並參閱一九〇六年（在俄國出版的）「無產者報」第一期上，「論抵制」一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第六九八頁——譯者註）。在這篇論文中，我們着重指出從杜馬中工作所得到的益處是有限的。

任何了不起的功效，但社會民主黨從此兩者所能得到的利益，較之某個刊印出來的或在其他什麼會議上發表的言論中所能得到的利益並不少些，而有時甚至多些。

並且我們應當同樣簡單明瞭地向羣衆解釋我們爲什麼要參加十月黨的杜馬。由於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底失敗，並由於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年的「補救」這個失敗之企圖沒有成功的結果，反動勢力必然要把我們驅進——而且將經常繼續把我們驅進——到愈趨愈壞的假憲制機關中去。我們將隨時隨地堅持我們的信念並宣傳我們的見解，而時時重複着說，當舊政權還存在之日，當舊政權尙未連根剷除之日，就不能盼望有絲毫好處的。我們要去準備新高潮的條件，但在新高潮尙未來到以前，並爲了要使新高潮來到，我們必須更加堅忍不拔地工作着，而不提出那些只在高潮條件下才有意義的口號。

如果把抵制視爲使無產階級及一部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派去同自由主義及反動對立起來的策略路綫，也是不正確的。抵制並不是一條策略路綫，而是一種在特殊條件下適用的特殊鬥爭手段。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抵制主義」混爲一談，是和把布爾什維主義與「戰鬥主義」混爲一談同樣錯誤的。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策略路綫底區別，已在一九〇五年春倫敦布爾什維克第三次代表大會與日內瓦孟什維克代表會議所通過的原則不同的決議案完全闡明和顯示出來了。那時無論抵制也好，無論「戰鬥主義」也好，都沒有說到而且也不能說到的。無論對於第二屆杜馬選舉也好——那時我們並不是抵制主義者——無論在第二屆杜馬中也好，布爾什維克的策略路綫與

孟什維克的策略路線是迥然不同的，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這兩個策略路線，在一切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法上，在每一鬥爭場所中，都是不同的，但並沒有創造出爲這一或另一路線所特有的特殊鬥爭方法。所以，如果誰以對第一屆或第二屆杜馬之革命期待的破產爲理由，以「合法的」、「有力的」、「堅固的」和「真正的」憲制之破產爲理由，來辯護或說明其抵制第三屆杜馬，或者以爲上述的情形足以引起抵制，那就是最壞不過的一種孟什維主義。

六

我們曾把那些主張抵制之最有力的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論據留在最後來研討。沒有廣泛的革命高潮，則積極的抵制是毫無意思的。好，就算這樣吧。但是廣泛的高潮是從不廣泛的高潮發展起來的。某些高潮的徵象已經有了。我們應當提出抵制的口號，因爲這個口號可以支持、發展與擴大正在開始的高潮。

據我看來，這就是在社會民主黨黨員中以多少明白的形式決定傾向於抵制的一種基本論據。而且那些最接近於直接的無產階級工作的同志們底意見不是從按照一定模型「造成的」論據出發，而是從他們由接觸工人羣衆那裏得來之印象的某些總和出發的。

在社會民主黨兩個派別組織間沒有分歧或似乎至今未曾有過分歧的不多問題中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革命發展中長期停頓的原因問題。這個原因就是「無產階級還未恢復元氣」。並且的確，十月——十二月的鬥爭幾乎完全落在一個無產階級肩上。爲了全民族而進行有系統、有組織、接連不斷鬥爭的，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人口百分數最少（按歐洲標準說來）的國家，無產階級曾不能被這樣的鬥爭弄到不可想像的精疲力竭，這是毫不足怪的。加之，政府與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底聯合力量，在十二月之後所壓擊過的及從那時以來所不斷壓擊的，正是無產階級。警察的追究與屠殺，使無產階級在一年半的過程中約減少了十分之一，而有系統地關閉工廠，從官辦工廠的「懲罰式」的關閉起到資本家反對工人的種種陰謀止，把工人羣衆的困苦情形弄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因而現在，——某些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人員說道，——羣衆中呈現出情緒高潮的徵象，無產階級聚積力量的徵象。這個不十分固定，不十分顯明的印象又補充以較有力的論證：在某些工業部門中看到有無可懷疑的活躍氣象。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就不免要加強罷工運動。工人們必定會去試圖奪回他們在高壓與關廠時期所受的重大損失之一部分。最後還有第三種論據，且是最有力的論據，這個論據就在於不是憑藉那尙成問題的與一般指望着的罷工運動，而是憑藉於一個最大的、已由那些工人組織指定的罷工。還在一九〇七年初，一萬紡織工人底代表們就討論過自身的狀況並規定了加強這一工業部門中職工會的步驟。第二次又舉行了已是兩萬工人的代表會議並決定在一九〇七年七月宣佈紡織工人的總罷工。這一運動可能直接包括到四十萬工人。運動從莫斯科省發端，即是從俄國工人運動最大的中心和最大的工商業中心發端。正

是在莫斯科，也只有在莫斯科，羣衆的工人運動才能最快地取得具有左右政治意義的廣大人民運動的性質。而紡織工人在一般工人羣衆中是工資最小、認識程度最低、參加過去運動最弱、與農民的聯系最密切的成分。這些工人的首倡就可以指明這個運動將比以前包括更廣泛得無比的無產階級階層。而罷工運動與羣衆中革命高潮的聯系是已在俄國革命史上不止一次地表明過的。

社會民主黨底直接責任正是要對這個運動集中巨大的注意與非常的努力。正是在這一方面的工作較之對十月黨杜馬的選舉，應當無條件地認定是具有第一位意義的。應當使羣衆確信有把這罷工運動變爲向專制制度的總的和廣大的進擊的必要。抵制口號也就是要把注意力從杜馬轉到直接的羣衆鬥爭上去。抵制口號也就是要把政治的、革命的內容來充實新的運動。

大約說來，使某些社會民主黨人堅信必須抵制第三屆杜馬的理由，就是如此。這個主張抵制的論據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而與赤裸裸地背誦那和特殊歷史條件的聯系拆開了的口號迥然不同。

但是，無論這個論據是如何強而有力，據我看來，它總還是不夠迫使我们立刻去採取抵制的口號。這一論據所着重指出的問題，一般說來，對於那些思索過我國革命所給予的教訓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是不應有所懷疑的問題，就是：我們不能誓言拒絕抵制，我們應當準備到適當時機提出這個口號，我們關於抵制問題的提法與自由派的、庸俗而貧乏的及全無革命內容的問題提法——拒絕或不拒絕呢？——絕無相同之處。

我們就假使主張抵制的社會民主黨人所說的關於工人情緒的改變，工業的活躍，以及紡織工

人的七月罷工等一切都是已經證明了的並完全合乎實況的吧。

究竟從這一切當中產生出什麼結論呢？在我們面前是開始了具有革命意義的某些局部的高潮[⊖]。我們是否應當傾全力去支持它、發展它，而力圖使它變為總的革命高潮，然後變為進攻形式的運動呢？絕對應當。關於這一點在社會民主黨人中（也許僅僅除開「同志報」的記者）是不會有兩種意見的。但是，在目前，在這局部高潮開始的時候，在它尚未最終地轉為總的高潮以前的時候，爲了發展運動，需不需要抵制的口號呢？這個口號能不能促進現時運動的發展呢？這是另一問題，而對於這個問題，據我的意見，是只得予以否定回答的。

爲要把局部高潮發展到總的高潮，可以而且應當用完全直接的論據與口號，而不涉及第三屆杜馬。十二月以後的全部事變進程都是完全證實社會民主黨對於君主立憲制作用的觀點，對於必須直接鬥爭的觀點。我們要說，國民們！假使你們不願意俄國民主事業也像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之

⊖ 請看「同志報」上過去是社會民主黨刊物的記者，現在是自由派報紙的記者之馬爾托夫所寫的自由派議論的模範。

⊙ 有一種意見，認爲紡織工人罷工是使職工運動離開革命運動而孤立起來的新式運動。但我們以爲這個觀點是不值一顧的，因爲，第一，把複雜現象底一切徵兆都向悲觀方面解釋是一般地具有危險性的方法，這種方法常使許多不完全「坐得很穩」的社會民主黨人誤入歧途。第二，如果紡織工人罷工真是具有這樣的特點，那末，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就無疑地應當最積極地來反對這種特點。所以當我們這種鬥爭得到勝利時，問題就會正是如我們提出的那樣擺着。

後，立憲民主黨人先生們握有民主運動領導權時那樣愈趨愈快地直墜而下，假使你們不願意這樣，——你們就來贊助正在開始的工人運動高潮，贊助直接的羣衆鬥爭吧。沒有直接的羣衆鬥爭，則俄國的自由是沒有而且也不會有保障的。

這種形式的鼓勵會無疑是完全一貫的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鼓勵。對於這種鼓勵是否需要加以補充說：國民們，不要相信第三屆杜馬，而跟隨我們以抵制杜馬來表示抗議的社會民主黨人吧！

這類的補充按現時條件說來不但是不需要，而且甚至令人聽了覺得可怪，令人聽了幾乎會覺得是滑稽諷刺。並且本來就沒有任何人相信第三屆杜馬的，這就是說，在能於培養民主運動的人民階層中沒有而且不能有對第三屆杜馬憲政機關的迷戀，如同無疑義地會對第一屆杜馬，對那在俄國第一次建立憲政機關——不管怎樣，只要是憲政機關——的企圖有過深深的迷戀一樣。

一九〇五年及一九〇六年初廣大人民羣衆底注意重心是第一次的代議機關，雖然它是建立在君主立憲制的基礎上面。這是事實。社會民主黨人會應當進行鬥爭去反對這一點並最顯明地表示出來。

現在就不是這樣。成爲時局特點的不是對第一屆「國會」的迷惑，不是相信杜馬，而是不信高潮。

在這樣的條件下，提出過早的抵制口號，我們絲毫不會加強運動，絲毫不會麻痹妨礙這一運動的真正障礙。不僅如此：我們甚至有因此削弱我們鼓動力量的危險，因爲抵制是一個伴隨已經

定局的高潮的口號，而現在全部的不幸就在於廣大人民羣衆不相信高潮，看不見高潮的力量。

首先應該設法使這一高潮力量在事實上證明出來，然後，我們隨時都來得及提出間接表現這一力量的口號。就令如此，對於具有進攻性的革命運動，是否需要那使注意力離開第三屆杜馬的特殊口號，也還成問題的，也許是不需要的。爲了撇開某種重要的、真正能迷惑無經驗的、從未見過國會的人羣的東西，也許必須去抵制這種應當撇開的東西。但是爲了撇開這種完全不能迷惑現代民主主義的或半民主主義的人羣的機關，那就不一定要宣佈抵制。現在問題不在於抵制，而在於完全直接努力去把局部高潮變成爲總的高潮，把職工運動變成爲革命運動，把對關廠的防禦變成爲向反動的進攻。

七

且來作一總結。抵制的口號是特殊歷史時期所誕生出來的。一九〇五年與一九〇六年初，客觀情況把關於選擇最近道路的問題提交正在鬥爭着的社會力量來解決，或是直接革命的道路，或是君主立憲的轉向。在這種情形下抵制的鼓動底內容，主要是同憲制幻想作鬥爭。抵制成功底條件就是廣泛的、總的、迅速的和強有力的革命高潮。

一九〇七年秋天的客觀情況，在這一切方面都絲毫不能引起提出這一口號的必要，而且絲毫

不能辯護這一口號。

我們繼續做準備選舉的日常工作，不預先拒絕去參加最反動的代議機關，同時我們應當把自己全部的宣傳與鼓動用去向人民說明十二月失敗與以後發生的自由全部衰落過程以及侮辱憲制的現象之間的聯系。我們應當把這種堅強的信念灌輸到羣衆中去，即是說，沒有直接的羣衆鬥爭，這種侮辱是必然會繼續與加強的。

我們不預先拒絕在高潮到來時機採用抵制的口號，那時也許會發生提出這一口號的嚴重的必要性，而在現時我們就應當傾全力去用完全直接影響的方法，來力圖把工人運動底個別高潮變成爲總的、廣泛的、革命的與對整個反動及其根基進攻的運動。

一九〇七年

註釋

〔一〕「巴拉雷金——摩爾察林式的旺盛」，是從俄國偉大諷刺家謝德林在其所著之「穩健規矩人物」和「現代樂土」兩部小說中採錄來的隱喻。在這兩部小說中描寫出了這兩個典型人物：巴拉雷金是專說空話，專愛撒謊的律師，他用盡五花八門的辦法，主要是投機取巧來求得自己的「旺盛」；摩爾察林是謝德林從格里波也夫夫所著滑稽劇「聰明人底痛苦」中借用來的一個趨附逢迎的標本官僚。

革命社會民主派底行動綱領

—

大家知道，黨的代表大會過幾個星期就要舉行了^①。必須最努力去準備這個代表大會，去討論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應當徹底解決的那些基本策略問題。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已經擬定了這次代表大會底議事日程，並把它在報上公佈過了。議事日程底中心項目，就是：一、「最近的政治任務」，二、「國家杜馬」。關於第二項，其必要性是顯而易見並且不會引起爭辯的。第一項，據我們的意見，也是必需的，但是在措詞上要有些不同，或者，更確當些說，內容上要有些改變。

爲了立刻開始進行對於代表大會的任務及應由代表大會解決的策略問題的全黨討論，我們黨的兩個京城組織底代表和「無產者報」編輯委員會底會議，在第二屆杜馬召集的前夜，起草了印

^① 指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倫敦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俄文版編者註

在下面的各決議草案（一）。我們想來概括說明的，就是這個會議究竟怎樣了解自己的任務，爲什麼它所提到首位的正是關於某某一些問題的決議草案，以及在這些決議案中擬定了些什麼基本思想。

第一個問題：「最近的政治任務」。

依據我們的意見，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面前不能這樣來提出問題。這個時代是革命的時代。所有社會民主黨人不論屬於哪個派別組織都是同意這一點的。只要看一看孟什維克及崩得分子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全俄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案中之具有原則性的部分，就足可相信我們論旨底正確。

而在革命的時代決不能僅限於規定最近的政治任務，其所以不能，是由於以下兩種原因。第一，在這樣的時代，社會民主運動底基本任務提到了第一位，要求把它們加以精密的檢討，而決非「和平的」與細小的憲制建設時代所可比擬。第二，在這樣的時代，規定最近的政治任務是不可能的，因爲革命的特點，就在於可能而且必然有急劇的爆裂、迅速的轉變、意外的形勢、猛烈的爆發。只要指出有解散左的杜馬和按黑幫派精神來改變選舉法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就足夠了解這一點了。

例如，對於奧地利人說來，既然一切標誌都指明那多少是和平的、一貫的與相承的憲制發展時代是在繼續着的時候，那末，把爲普選制而鬥爭規定爲自己「最近」的任務，是適宜的。至於

在我們這裏，難道不是就連孟什維克都在上述決議案中說和平道路之不可能，說必須選舉戰士而不要選舉請願家到杜馬中去嗎？難道他們不承認必須爲着立憲會議而鬥爭嗎？請想一想，有着已形成了的和在相當時間內鞏固了憲政制度的歐洲國家，在那裏能否說起「立憲會議」的口號，能否說起在杜馬中把「請願家」與「戰士」對立起來，——而你們就會懂得，在這樣的條件下，「最近」的任務，是不能像現在西歐那樣來規定的。社會民主黨及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底杜馬工作愈有成效，則非杜馬鬥爭的爆發就愈加可靠，而這種鬥爭就會使我們完全處在特殊的最近任務之前。

不，我們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所要討論的，不是最近的任務，而是無產階級在現時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基本任務。不然，我們就會成爲在任何事變轉變中（亦如一九〇六年不止一次發生過的一樣）束手無策、倉皇失措的人了。「最近」的任務橫豎我們是不能規定的，——猶之任何人也不能事先指出，究竟第二屆杜馬與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日）選舉法能够支持一個星期，還是一月，還是半年一樣。而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在我們革命中的基本任務的見解，我們還沒有用全黨正式手續把它規定出來。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則任何堅定可靠的、原則性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於規定「最近」任務的追求都是徒勞無功的。

統一大會沒有通過關於對時局估計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決議案，雖然社會民主黨的兩派都曾提出了相當的草案，——雖然關於時局估計的問題也曾提到議事日程上並在代表大

會上討論過，而這樣的決議案竟未通過。由此看來，大家都曾承認這些問題重要，但是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多數認爲這些問題在當時還是沒有充分闡明的。必須重新來檢討這些問題。我們應當考察：第一，我們所處的革命時局按其社會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底基本趨向來說是怎樣的；第二，現時俄國各階級（與各政黨）之政治派別分立是怎樣的；第三，在這樣的時局中，在社會力量這樣的政治派別分立之下，社會民主工黨底基本任務是怎樣的。

自然，我們不會忽視有些孟什維克（而也許還有中央委員）把關於最近的政治任務這一問題簡簡單單了解爲贊助要求建立杜馬內閣，亦即立憲民主黨內閣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用他所特有的——當然是值得誇獎的——急遽性來極力把孟什維克向右推，還在三月八日（二月二十三日）的「俄國生活報」上就已發表了擁護這種要求的言論。

我們想，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是一個附屬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不去估計我們革命的現時時局，不能不去估計立憲民主黨底階級內容及其現時的全部政治作用而單獨提出這個問題的。把這個問題歸結爲純粹的政治主義，歸結爲在一般憲政制度中內閣對於國會負責的一原則，那就等於是完全離開階級鬥爭的觀點而轉到自由主義者底觀點上面去。

這就說明爲什麼我們的會議曾經把關於立憲民主黨內閣的問題與對革命現時時局的估計聯繫起來。

我們所提出的決議案首先在敘述理由中就從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認爲是基本的問題開始，即

從經濟危機與羣衆底經濟狀況問題開始。會議通過了這樣的語句：危機「沒有呈現迅速消除的象徵」。這樣的語句也許是過於謹慎的。但是，對於社會民主黨重要的，當然是確定無容爭辯的事實，指出基本的方向，而把對問題的科學分析，讓給黨底出版物去做。

在危機的基礎上，我們指出（理由底第二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階級鬥爭之尖銳化（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且這種尖銳化的表現是衆所周知的），其次就指出農村中社會鬥爭的尖銳化。在農村中還沒有像關閉工廠這樣顯露的、一望而知的事變存在，但是單就政府在十一月頒佈的各種土地法令（「收買農村資產階級」）一類的設施，就已經證明鬥爭是在尖銳起來，地主們爲了削弱全部農民的襲擊，不得不用盡一切努力來分裂農民。

歸根到底這些努力要弄到一個什麼樣子，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一切「未完結的」（馬克思底說法）資產階級革命總是以富裕農民轉變到現存制度方面去而一結束」的。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都應當盡一切可能來發展最廣大農民階層底意識，來使他們明瞭正在農村中進行的階級鬥爭。

次之，在第三點上指出一年來俄國政治歷史底基本事實：上層階級「右傾化」與下層階級「左傾化」。我們想過，特別在革命時代社會民主黨應當在其代表大會上對於社會發展的時期做出總結，運用自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來做總結，教育其他階級回顧過去經驗，有原則地來對付政治事變，而不是如像資產階級那樣，用幾分鐘的利益或幾天的勝利的觀點來對付它，本來資產階級是蔑視一切理論與害怕對現時歷史作任何階級分析的。

兩端加強就是中間減弱。中間派——並不是如某些社會民主黨人（馬爾托夫也在內）所錯想的十月派，而是立憲民主黨。這個黨的客觀歷史任務何在呢？馬克思主義者如果還願意忠實於自己的學說，就應當來回答這個問題。決議案上回答說：「就在於用黑幫地主及專制制度所能接受的（因為立憲民主黨是主張志願協定的）讓步辦法來停止革命」。在考茨基底名著「社會革命」一書上，曾經很好的說明過，改良與革命的區別，就在於改良是把政權保存在壓迫者階級之手，這些壓迫者用他們自己所能接受的讓步辦法而不消滅自己政權的辦法去鎮壓被壓迫者的起義。

自由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客觀任務正是這樣：用「合理的」讓步為代價來保存君主制度與地主階級。

這個任務能否實現呢？這要依據情況為轉移。馬克思主義者不能認為這個任務是絕對無法實現的。但是，資產階級革命底這樣的結局就是：一、資產階級社會生產力底發展最少自由（俄國經濟的進步在用革命手段消滅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下，較之按立憲民主黨計劃來改進它的情形下，是會無可比擬地加速起來）；二、民衆底基本需要不能滿足，以及三、用強力鎮壓民衆的必然性。若不用強力鎮壓民衆，則立憲民主黨式的「和平」憲制發展是無法實現的。這一點我們應當牢記在心並且灌輸到羣衆的意識中去。立憲民主黨式的「社會和平」是對於地主和廠主的和平，是鎮壓農民工人起義的「和平」。

斯托雷平的軍事法庭底高壓與立憲民主黨式的「改良」，這是一個壓迫者底兩隻手。

二

自從我們對本題第一篇文章發表之後還只經八天，而政治生活就已經帶來許多重大的事變，這些事變證實了當時我們所說的話，並且用「已完成的（或正在完成的）事實」來使當時說及過的緊迫而麻煩的問題大放光明。

立憲民主黨人轉向右方，在杜馬中已表現出來了。羅吉澈夫用鼓吹溫和、謹慎、合法、靜謐、不要激動人民等來支持斯托雷平以及斯托雷平對羅吉澈夫的支持——有名的「全力」支持，都已成爲事實了。

這件事實明顯證實了我們對於現時政治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這個分析還在第二屆杜馬開會之前，從二月二十八日（十五日）至三月三日（二月十八日）所擬定的決議草案上就作出來的。我們拒絕了依照中央委員會的提案去討論「最近的政治任務」，我們指出了在革命時代這一類的提案是完全無理由的，我們用關於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社會主義政策基礎的問題來代替了這個關於幾分鐘政策的問題。

而這一星期的革命發展完全證實了我們的先見。

我們在上次已經分析了我們決議草案中敘述理由的部分。這一部分底中心要點就在於指出，

被削弱的「中間派」政黨，即自由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力圖用黑幫地主及專制制度所能接受的讓步辦法來停止革命。

可以說，僅在昨天，普列漢諾夫及其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右翼中的那班同道者們還把我們在一九〇六年全年（甚至還早，在一九〇五年「兩個策略」小冊子出版時起）所極力堅持的這個布爾什維主義思想宣佈爲是從對資產階級作用的暴徒觀點所產生出來的半夢想的臆測，或者說至少是不適時機的預言等等。

到今天大家都看見，我們會是正確的。立憲民主黨人底「圖謀」開始實現着，甚至如「同志報」這樣的報紙，其仇視那毫不留情揚斥立憲民主黨人的布爾什維主義幾乎比誰都厲害些，而對於「言論報」替立憲民主黨人與黑幫政府進行談判關謠[○]一事也說道：「無火不生煙」。

我們只有來歡迎在「同志報」上這種「布爾什維克週」的復活。我們只有指出，歷史證實了

○ 當這幾行寫成之後，我們讀了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日）「言論報」的社論：「當着把去年六月立憲民主黨人與政府的有名談判的確實材料公佈時，國人就會知道，假使因爲這些『瞞着人民』進行的談判而有可以去責難立憲民主黨人的地方的話，那末，也許就正是『俄羅斯報』所說的那種不退讓態度吧。是的，正是在『當着這些材料公佈時！』」然而現在立憲民主黨人不管人們底責問，而他們仍然是不公佈「確實材料」，無論關於一九〇六年六月的談判也好，無論關於一九〇七年一月的談判（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米留可夫謁見斯托雷平）也好，無論關於一九〇七年三月的談判也好。於是瞞着人民進行談判的事實始終是事實了。

我們的一切預告與口號，歷史揭破了那些唾棄我們對立憲民主黨批評的「民主主義者」——，可惜得很，甚至某些社會民主黨人——所表現的一切輕浮態度（說得好一點，是輕浮態度）。

誰曾在第一屆杜馬時代說過，立憲民主黨人在背後同政府做買賣呢？布爾什維克。而後來却表明了，原來如特列坡夫這樣的人都是曾贊成建立立憲民主黨內閣的。

誰會比任何人都努力去進行運動以揭發在一月二十八日（十五日）當冒名的人民自由黨與政府作選舉鬥爭（好像是鬥爭）正熾烈時米留可夫去謁見斯托雷平的事呢？布爾什維克。

誰曾在彼得堡的選舉運動大會上及在第二屆杜馬開始時日（請看「新光綫報」）曾提起過下面的事實，即是，一九〇六年事實上給予杜巴索夫一流人的二十億法郎借款是在立憲民主黨人間接幫助之下促成的，這些立憲民主黨人拒絕了克來蒙梭關於公開起來用黨的名義反對這次借款的正式提議，——誰提起過這件事實呢？布爾什維克。

誰在第二屆杜馬的前夜會把揭破「立憲民主黨政策底叛變性」認為是一貫的（即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政策底首要任務呢？布爾什維克。

最微弱的風，好像吹走一根雞毛似的，吹散了一切關於贊助要求成立杜馬內閣或責任內閣，或者贊助要求把行政權去服從立法權等等的廢話。普列漢諾夫的夢想，想把這個口號變成決鬥的信號或啓發羣衆的工具，原來是一種馴良俗人底夢想而已。大概現在任何人也已不敢當真地來贊助這樣的口號了。生活表明了——或者更正確些說，開始表明了——實際上此地所說的完全不是

關於更完備與更徹底地實行「憲制原則」的問題，而正是關於立憲民主黨人同反動勢力分贓妥協的問題。生活表明了，這樣的人們是正確的，這些人會識破並指出說，藏在冒稱進步的一般原則底自由主義外表後面的，是飽受驚嚇的，用好聽語句來稱呼那些骯髒醜東西的自由主義者底狹隘階級利益。

由此看來，我們第一個決議案的結論底正確性是被證實得比我們所能期待的更快得多，更好得多；不是被邏輯學證實而是被歷史證實；不是被語句證實而是被事實證實，不是被社會民主黨人的決議案證實而是被革命事變證實。

第一個結論：「正在我們眼前日益發展的政治危機，不是憲制的危機，而是革命的危機，這種危機正在引進到無產階級與農民羣衆反對專制制度的直接鬥爭。」

第二個結論，是從第一個結論中直接產生出來的：「因此，對於當前的杜馬運動只能當成是人民爭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之一個枝葉事件來看待與利用。」

憲制危機與革命危機差異底實質何在呢？就在於，前者可以在國家現存的基本法律與制度的基地上來解決，後者則要求粉碎這些法律與農奴制度。直到現在，整個俄國社會民主黨，不管哪一派別組織，都是贊同表現在我們這些結論中的意思的。

只是在最近時期，孟什維克中間增強了這樣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是傾向於與此直接對立的觀點，傾向於拋棄革命鬥爭的臆想，停留在現存的「憲制」上面，並在這個「憲制」的基地上行動

着。請看那由「唐恩·科爾鑿夫、馬爾丁諾夫、馬爾托夫、涅哥列夫等同志和幾個實際工作者參加之下」共同起草的，登載在「俄國生活」第四十七期上面的（還印有單張的）關於對國家杜馬態度的決議案中很標本的幾點：

「……二、提在俄國革命中心地位的直接為政權鬥爭的任務，在現時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下，主要是歸結到（？）為（？）人民代表機關而鬥爭的問題（？）；

……三、第二屆杜馬底選舉會選出大量一貫的（？）革命擁護者，這就表明了人民羣衆中這種（？）必須為政權鬥爭的意識是正在成熟着」……

不管這幾項條文是如何混亂，如何含糊，但其趨勢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不要工人農民去作為政權的革命鬥爭——而把工人政黨底任務歸結於為現存的人民代表機關或在這一基礎上進行自由派式的鬥爭。只有等着看是否真正是一切孟什維克在現時或在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都承認問題的這種提法。

無論如何，立憲民主黨人向右轉與斯托雷平之「竭力」贊許他們，這就快會迫使我們黨的右翼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或者就繼續其贊助立憲民主黨人的政策因而徹底站到機會主義的邪途上去，或者就完全斬斷對立憲民主黨人的贊助並接受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獨立性的政策，為使民主小資產階級從立憲民主黨人底影響及領導權下解放出來而鬥爭的政策。

我們決議案的第三個結論寫着：「社會民主黨是先進階級底政黨，現時無論怎樣，一般地不

能贊助立憲民主黨人底政策，尤其是不能贊助立憲民主黨的內閣。社會民主黨應當用一切力量來在羣衆面前揭發這種政策底叛賣性；向羣衆解釋擺在他們面前的革命任務；向他們證明，只有在羣衆底高度覺悟性與堅強組織性之下，才能把專制制度可能的讓步從欺騙誘惑的武器變成繼續發展革命的武器。」

我們不一般地否認局部讓步的可能性，也不預先拒絕利用這些局部的讓步，決議案的原文在這點上是不會引起任何懷疑的。同樣立憲民主黨的內閣也可能在這樣或那樣的關係上適合於「專制制度讓步」的範疇。但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既不拒絕接受「部分的償還」（恩格斯的說法），同時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應忘記事情的另一方面，即特別重要的與特別是常被自由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忽視的一方面，這就是，「讓步」的作用是欺騙誘惑的武器。

社會民主黨人，如果他不願意變成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他就不能忘記這一方面。孟什維克正是不可寬恕地忘記了這一方面，在上述決議案上這樣說：「……社會民主黨將贊助杜馬那些使行政權服從自己的一切企圖」……國家杜馬底企圖，這就是杜馬大多數底企圖。經驗已經證明，杜馬的大多數是能夠由右派及立憲民主黨構成來反對左派的。這種大多數底「企圖」能夠這樣來把「行政權」服從自己，以便惡化人民底狀況或者公然欺騙人民。

我們將希望，孟什維克不過是在這裏走偏鋒而已；他們將不會贊助本屆杜馬大多數在上述方向上的一切企圖。但是，孟什維主義底卓越領袖們能夠採取上述這樣一個文句，當然是很標本的

一回事。

立憲民主黨人向右轉就在事實上迫使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不管是哪一派別組織，都來採取拒絕贊助立憲民主黨人底政策，採取揭發其叛變性的政策，採取獨立的和徹底革命的工人階級黨底政策。

一九〇七年三月至四月

註 釋

〔一〕在本冊內僅從這些決議草案中譯載關於非黨工人組織的一個草案（見本冊第二二九頁）。列寧在本文中所論述的，就是各決議草案底基本內容。

關於非黨的工人組織和

無產階級中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派別

（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決議草案之一）

會議注意到：

（一）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由於阿克雪里羅得同志主張非黨工人代表大會的鼓動，而出現了一種趨向於消滅社會民主工黨而用無產階級非黨政治組織來代替它的派別（拉林、撒格魯、愛里、伊萬諾夫斯基、米洛夫，以及在敖得薩印行的「勞動解放」文集）；

（二）同時在黨外並且直接反對黨而進行着的有無政府工團主義在無產階級中的鼓動，散佈同樣的非黨工人代表大會及非黨組織的口號（「工會事業」文集及其在莫斯科的團體，在敖得薩的無政府主義刊物等）；

（三）雖然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一月全俄代表會議底決議案，在我們黨內仍發現有許多以建立非黨組織為目的的、破壞黨組織的行動；

關於非黨的工人組織和無產階級中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派別

(四)另一方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從來沒有拒絕過，在或大或小的革命高潮中，去運用一定的非黨組織，如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加強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中的影響，並鞏固社會主義的工人運動（參閱「無產者報」第三第四兩期上所載彼得堡黨委員會及莫斯科黨委員會關於工人代表大會的九月決議案）；

(五)在正在開始的高潮基礎上，有可能爲着發展社會民主黨之目的而建立與利用工人階級非黨的代表機關，例如工人代表蘇維埃、工人代表會議等等，同時社會民主黨的組織應當注意到，當着社會民主黨在無產階級羣衆中的工作佈置得正確、堅固與廣泛的情形下，這類機關事實上可能成爲多餘的。

會議注意及此，認爲：

(一)必須進行最堅決的原則鬥爭來反對在無產階級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以及在社會民主黨內的阿克雪里羅得和拉林一類的思想；

(二)必須進行最堅決的鬥爭來反對任何從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來破壞組織與蠱惑羣衆的企圖，這些企圖就是想來削弱黨的組織或利用黨的組織以使用無產階級的非黨政治組織來代替社會民主黨；

(三)在按嚴格的黨的態度進行工作的條件下，爲了發展與鞏固社會民主工黨之目的，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在必要時可以參加各黨共同加入的工人代表會議，工人代表蘇維埃及其代表大會並

可以建立這樣的機關；

(四)爲了擴大與鞏固社會民主黨對無產階級廣大羣衆的影響，必須一方面加強組織職工會的工作，加強職工會中社會民主主義的宣傳與鼓動，而另一方面，必須吸收工人階級中日益廣泛的階層來參加到黨的各種各色組織中來。

一九〇七年三月

列寧在黨的法庭上的辯護詞

（或反對中央委員會中那些孟什維克委員的控訴詞）

審判員同志們！

中央委員會控訴我的罪名是說發表了（在刊物上）爲黨員所不能容許的言論。中央委員會在關於成立黨的法庭的決議上這樣說。我來直接從問題底本質開始說起：把中央委員會「提交法庭審查」的那個「聲明書」全讀一遍。

「……中央委員會指出，在列寧同志署名發表的那本『聖彼得堡選舉與三十一個孟什維克底偽善行爲』之小冊子中，包含着對聖彼得堡組織中三十一個黨員這樣的直接指責，說他們會與立憲民主黨進行談判『來把工人們的選舉票賣給立憲民主黨』，並說『孟什維克與立憲民主黨人講生意爲的是要違反工人的意志，藉助於立憲民主黨人來把自己的人偷運到杜馬中去』。

中央委員會指出，把這類的指責文字公佈在刊物上面，特別是在選舉前夜發表這類文

字，既使黨員底政治道德受到猜疑，就定會造成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並將被無產階級敵人利用來同社會民主黨作鬥爭。

中央委員會鑒於此類言論是爲黨員所不容許的，決將列寧底這種舉動提交黨的法庭審查。」

這就是控訴書底全部原文。首先我要指明，此地有一個重大的、簡直是事實上的不正確處，我將申請法庭根據那據以控告我的小冊子底原文加以更正。這就是說：在那本小冊子上曾直接肯定地說，我所指責的不止是三十一個孟什維克，而且還有唐恩同志，即中央委員會底委員。

中央委員會，當其擬定決議時，既不能不知道，唐恩同志是中央委員（也許他甚至參加了關於因我責難唐恩而將我交付法庭審理問題的討論或決定的人哩？），也不能不知道，我所指責的不止是三十一個人，並且還有唐恩。這就是說，中央委員會明知故犯地把自己的委員從被指責者的名單中勾消掉了。在這裏，除開事實上不正確處之外，還有更壞的，不可容許的事情，我在後面要來詳細估計這一方面，並盡力用全部審訊中的材料來特別將它加以說明。

現在我來說控訴底實質問題。

中央委員會從我那本小冊子中提出兩段引文，因而我就應當對於這些引文的每一段盡可能詳細地加以分析。當然，我很了解，問題是關於那本小冊子底全部，而不是僅僅關於那兩段引文。但是，我且按照中央委員會那樣來把這兩段引文提出作爲基本的與主要的東西。

第一段引文是從小冊子底篇首引來的。讓我錄出那一整頁來，以便表明這段引文是與什麼相
關連的：

「在今天，二月二日（一月二十日），——我提明一下，這就是說事情是在聖彼得堡成立左翼聯盟以前五天，以及在聖彼得堡舉行國家杜馬選舉前十六天發生的，——在『同志報』上登載了在聖彼得堡選舉前夜從社會主義組織分裂出去的三十一個孟什維克宣言底長篇摘錄。」

我着重指出，小冊子開始第一句話就把那在選舉前夜聖彼得堡發生分裂底基本事實列在首要地位。我之所以着重指出這一情況，是因為以後我還要多次地指明這一情況底意義。

繼續說引文吧：

「……首先我們用一兩句話來提明一下那段實際的歷史，即從社會民主黨內分裂出去的孟什維克在退出代表會議之後幹了些什麼……。」

關於他們退出及其意義，我在發表這本現在檢討着的小冊子之幾日以前，還出版了「社會民主黨與聖彼得堡的選舉」，以及「你聽着蠢法官底裁判時……」（「一個社會民主黨政論家底時評」）兩本小冊子。後一本小冊子幾乎全部被警察沒收去了。殘存者只有幾份，而我就來引證這本小冊子，使法庭能够整個地而不是片段地來研究當時經過事實的情景。

「……（一）他們從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中分裂出去之後，就與小資產階級（社會革命黨

人、勞動派及人民社會黨）締結聯盟，以便共同去與立憲民主黨人做關於位置的買賣。關於分裂出去的社會民主黨人這一加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書面條約，他們竟向工人和社會人士掩藏起來了。

「但是我們還沒有失掉希望，這個條約將來還是會公佈的，而秘密的東西會成爲衆所共曉的東西。」

我請法庭注意，在我指責唐恩及三十一個孟什維克的小冊子中我立刻就着重指出了向工人掩藏書面條約的這一點。再看下文：

「（二）分裂出去的孟什維克曾以小資產階級聯盟（報紙上稱之爲「左翼聯盟」是不正確的）組成部分的資格同立憲民主黨人講生意，要求把六個位置中的三個位置給這個聯盟。立憲民主黨人只允許給兩個位置。生意沒有講成。小資產階級與立憲民主黨人底「代表會議」（不是我們的說法，而是從報紙上引來的）是在一月三十一日（十八日）舉行了的。「言論報」及「同志報」都登載了這個消息。今天「言論報」宣稱協定是沒有結成的（雖然如此，我們當然應準備對付這樣一着，就是談判還在暗中進行）。

「孟什維克關於自己出賣工人選舉票給立憲民主黨人的這種『行動』現時尙未在刊物上發表出來。」

這就是與第一段引文相關連的情況。我反對孟什維克的言論，正是當我第一次從報紙上知道

了孟什維克及民粹派同立憲民主黨人訂立反對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組織大多數的聯盟沒有成功的這一天寫的，我並立刻補充說，我不能認為妥協之沒有成功已是最終的了，應該準備去對付更壞的情形：他們繼續「在暗中」進行談判。爲什麼我當時認爲（即在現時我還認爲我當時的觀點是正確的）應該準備去對付這種更壞的情形呢？因爲在社會人士面前掩藏孟什維克同小資產階級聯盟底書面條約，這是不正確的、有辱於社會主義者身分的、且不免要招致最惡劣嫌疑的舉動。

這裏所說的把工人選舉票賣給立憲民主黨究竟是關於怎樣的一種「出賣」呢？有些談話家會對我說，他們是這樣了解的，——彷彿我說的是關於爲了金錢的出賣。當然，這種談話不是不很機智的。但是每個識字的並認真讀完這本小冊子，而不是斷章取義的人，自然，就立刻可以從上下文中，從所有前後語句中看出，所謂出賣不是爲了金錢，而是爲了杜馬中的位置。所說講「生意」和「買賣」是指政治的等值交換，而不是經濟的等值交換，是以位置換選舉票，而不是以金錢換選舉票。

試問，對於這樣清楚這樣明確的事情，是否值得一講呢？

我深深相信，是值得講的，因爲在這一點上我們會緊接到闡明中央委員會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即所謂在刊物上發表可容許的或不可容許的言論的問題。

如果在這本小冊子這一段中是說三十一人爲了金錢而把工人選舉票賣給立憲民主黨人，那就是誣加政敵以可恥和犯罪行爲的罪名。爲了這樣的斷言是值得把說這種話的人交付法庭的，自

然，這全不是爲了「造成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而是爲了詆譏中傷。這是全然清楚的。

反之，如果在這本小冊這一段中是說，三十一人以社會民主黨獲得杜馬代表的位置爲條件，而把工人選舉票歸併到立憲民主黨的選舉票中，——那末，這就是忠厚的、正當的、爲黨員所容許的論戰底模範。

我所選定的措詞與這種措詞之不同點何在呢？就在於我選定的措詞，其造成全部聲韻的語調不同。就是，這個措詞好像是打算到要引起讀者對於進行這種舉動的人發生仇視、憎惡與輕蔑。這個措詞，並不打算去說服那些隊伍，而是打算去粉碎那些隊伍，——並不打算去糾正政敵底錯誤，而是打算去根本消滅與剷除政敵的組織。這個措詞的確具有這種特性，即引起對於政敵的最壞的意想與最壞的猜疑，而且的確與說服和糾正的措詞不同，它是要「造成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的。

這就是說，你承認這種措詞是不可容許的嗎？——人們會問我。當然，是的，——我回答道，——不過有點小小補充：對於統一的黨底黨員是不容許的。問題底全部關鍵就在這一補充中。中央委員會所提出來反對我的這一控訴底全部不正確性——更厲害一點說——不誠實性正是在於中央委員會隱瞞了這樣一件事實，即在寫那小冊子的時候，在那小冊子（不是形式上，而是按問題實質）所以之出發的、所服務於其目的的這個組織中是沒有統一黨的。當着黨內已發生分裂的時候，而爲這樣的起因便指責爲「在刊物上發表爲黨員所不容許的言論」，這是不誠實的。

分裂就是一切組織關係底破裂，這就把觀點上底鬥爭從在組織內起影響的基地上轉移到在組織外起影響的基地上，從糾正同志說服同志底基地上轉移到撲滅他們組織的基地上，轉移到喚起工人（以及一般人民）羣衆來反對已經分裂出去之組織的基地上。

凡在統一的黨底黨員間所不容許的事，在已經分裂的黨底部分間便是容許的並且是必需的。在描寫統一黨內的同志時是不可以使用那種有系統地在工人羣衆中散佈對意見不同的人之仇視、憎惡、輕蔑心理的文字的。而對於分裂出去的組織就可以而且應當正是使用這種文字來描寫的。

爲什麼說是應當呢？因爲分裂就使得必須從分裂者的領導下把羣衆奪取過來。人們對我說：你造成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我回答道：我是特意這樣做，並打算了要造成那在選舉前夜跟隨分裂出去的孟什維克走的那一部分聖彼得堡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而且在分裂之下我總是會這樣去做的。

我在聖彼得堡選舉前夜用自己鋒銳的漫罵的語句向孟什維克進攻，的確曾使無產階級中那般信從他們追隨他們的隊伍顫動起來。這會是我的目的。這會是我充當這個進行左派聯盟運動的聖彼得堡社會民主黨組織之一員的責任。因爲在分裂之後爲了進行這個運動會必須粉碎那帶領無產階級去擁護立憲民主黨人的孟什維克隊伍，會必須造成他們隊伍中的錯亂，會必須在羣衆中喚起對於這般人的仇視、憎惡與輕蔑，他們這般人已經不是統一的黨底黨員，他們這般人已經是力圖阻難我們社會民主黨組織所進行的選舉運動的政治敵人。對付這樣的政治敵人，我當時進行了嚴

滅的鬥爭——而在重複與發展這一分裂的情形下，我總是會進行殲滅鬥爭的。

假使當孟什維克在聖彼得堡造成分裂之後，而我們不會造成孟什維克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的混亂，那末，我們就會不能實現我們左派聯盟底選舉運動。而我只是可惜，當時我不在聖彼得堡，以至對於從分裂出去的孟什維克影響下把羣衆奪取出來這件事幫助得不够，因為在更熱心和更迅速地完成這一任務的情形下，聖彼得堡的左派聯盟是會獲得勝利的。這是選舉結果的總計材料已經證明了的。

控訴書之根本邏輯上的（自然，還不僅是邏輯上的）錯誤，正是在於，他們狡黠地避開關於分裂的問題，他們抹殺分裂底事實，他們企圖把那從統一的黨的觀點上看來是正當的要求提到在當時沒有統一，沒有共同的黨的這樣條件上來，並且——我以後要證明此點——其所以沒有統一，是由於造成分裂與掩蓋分裂的中央委員會，即控訴人自己的罪過。

假使有人把黨內所容許的鬥爭底尺度來運用於在分裂基地上的鬥爭中去，運用於從外面來反對黨，或者（在地方的分裂之下）反對黨的這一組織的鬥爭上去，那末，這樣的人就必得認為或者是小孩式的天真爛漫，或者就是偽善家。從組織觀點看來，分裂乃是一切組織聯系的破裂，亦即從組織內說服同志的鬥爭轉變到破壞敵對組織、消滅其對無產階級羣衆影響的鬥爭。從心理觀點看來全然清楚，所謂同志間一切組織聯系底破裂就已經是相互間的憤懣與變為仇恨的敵視達到了極點。

而在聖彼得堡的分裂中還有過兩種使鬥爭的尖銳性與無情性十倍加強的特別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黨中央委員會底作用。按黨章，中央委員會應當去進行統一，而任何地方的分裂應當不使之在分裂基地上去進行鬥爭，而使之到中央委員會去申訴，或者，廣而言之，使之向中央委員會請求幫助恢復統一。實際上，中央委員會是選舉前夜聖彼得堡組織分裂底主謀人與參加者。正是這種情況——在代表會議決定提出反訴的決議理由中用真憑實據詳細發揮了的這種情況，——迫使我們不能不承認聖彼得堡的分裂是不道德的分裂。關於這點，我以後要特別講到，並將堅持請法庭提出那些從被告人反對原告人的控訴中根據法律觀點所自然發生出來的問題。

第二種情況：在分裂時的聖彼得堡的選舉運動。在沒有立即公開的、羣衆的、政治行動或一般地沒有黨的政治活動之下，分裂有時還不是必須要舉行刻不容緩的毫不留情的殲滅戰。但是既然有着這樣的羣衆行動，例如選舉，既然要求無論如何要立刻干預選舉，並不管好歹總要進行選舉，——那末，分裂就是立刻進行無條件的殲滅戰，爲着由誰來領導這些選舉而戰：是社會民主黨的地方組織呢，還是從這組織中分裂出去的集團呢。在有這樣的分裂之下，那就一分鐘也不能推延這一任務，即是：從分裂者的影響下把羣衆奪取出來，瓦解他們的組織，使他們在政治上化爲烏有。而且只是由於布爾什維克在孟什維克實行分裂——一月十九日（六日）——之後，向孟什維克進攻之毫不留情的火力，京都底選舉運動才達到還是相當和衷共濟的，多少是黨的選舉

運動，至少，還像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運動。

人們說：請鬥爭吧，但只是不要使用上了毒的武器。沒有問題，這是非常美麗而好聽的說法。然而這種說法或者是一種美麗的空談，或者就是把那種在羣衆中散播對政敵仇視、憎惡、輕蔑之鬥爭的意思，把在統一的黨內所不容許的，而在分裂之下由於分裂實質的本身就成爲不可避免的、必須的鬥爭的意思，即我在頭一部分中已經發揮過的那個意思，表現在模糊不明、混淆不清的形式上。任憑你們怎樣去把這一句話或這個比喻翻來覆去地剖解，你們從這中間除了剖解出前述這一區別之外，即在組織內採取說服方法之忠厚正當的鬥爭手段與採取分裂方法的鬥爭手段，也就是說，用喚起羣衆對敵對組織的仇視、憎惡、輕蔑的方法來破壞這一敵對組織的鬥爭手段，這兩者中間的區別之外，再也剖解不出絲毫真實內容來。所謂使用上了毒的武器，這是實行不道德的分裂，而不是由已形成的分裂中產生出來的殲滅戰。

究竟在分裂基礎上可以容許的鬥爭是否有限度呢？這樣的鬥爭是沒有而且不能有什麼按黨立場所容許的限度的，因爲分裂就是停止黨底存在。甚至連那種以爲可以用黨的方法，黨的決議等來反對那些導源於黨分裂狀態的鬥爭手段的念頭，都是可笑的。在分裂基地上的鬥爭限度，這不是黨的限度，而是一般政治的限度，或者——甚至更正確一些——不過是一般公民的限度，刑事法底限度而已。假使你們同我分裂了，則你們所要求於我的，決不能比要求於立憲民主黨人的，或社會革命黨人的，或某一路人的，更多一些。

我再舉一個明顯例子來說明我的意思。在最近一期的「無產者報」上登載有關於科夫諾城選舉的地方通訊。通訊員極不滿意於崩得與爭取派「二」建立反對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聯盟，並嚴厲地批評崩得。什麼樣的批評是對於統一的黨底黨員可以容許的呢？大致應當這樣來表示其不滿意：崩得分子做得不對，他們跑去與猶太資產者訂立聯盟來反對另一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在這種行為中表示出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底影響等等、等等。當我們同崩得還共處在一個統一的黨內時，如果在選舉前夜在羣衆中散發反對崩得分子的小冊子，指斥他們是無產階級底叛徒，這就是完全不可容許的。但是假如重複一九〇三年的歷史——一般地，歷史是不會重複的，我是舉一個虛構的例子——崩得又從黨內分裂出去了。難道後來有人能夠認真提起問題說這樣一種小冊子——即預計到向崩得所影響的工人羣衆散播對其領袖的仇視、憎惡與輕蔑，指斥這些領袖是改裝的資產者、是爲猶太資產階級收買了的並經過它來偷運自己的人到杜馬中去等等的小冊子——是不可容許的嗎？對於任何一個提出這種申訴的人，人們只會這樣來恥笑他，說道：你不要製造分裂吧，你不要使用如像分裂一樣的「上了毒的武器」吧，或者你以後就不要來訴苦，說使用毒劍的人竟被毒劍殺死了！

至於第二段引文，在有了上述一切之後，便沒有申述的必要了。這段引文如下：「孟什維克與立憲民主黨人講生意，爲的是要違反工人的意志，藉助於立憲民主黨人來把自己的人偷運到杜馬中去，——這就是對於從社會民主黨遊到小資產階級聯盟，從小資產階級聯盟遊到立憲民主黨

人這一切遊歷的簡單猜測。」試從統一的黨底觀點來在形式上與外表上分析這段引文，你們當然就會說：關於黨員不應說「講生意」，而應說「進行過談判」；不應說「偷運」，而應說「選入」；不應說「自己的人」，而應說「社會民主黨的議員」等等。然而這樣來「分析」引文，或這樣來「推敲」語法，難道除引起微笑之外還能引起什麼別的東西麼？說到最侮辱人的、最鄙視人的、一切都向壞的方面推測而不會向好的方面推測的語法，莫過於在分裂基地上爲着消滅那破壞當地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之政治運動的那個組織而鬥爭——這難道是不明顯嗎？說這樣的說法含有凌辱、侮辱和猜疑性質而來申訴不平，就猶之乎一個工賊訴述人們對他懷惡意態度一樣！用這樣的方法來審查申訴或控訴，就會如同我們尙未把這個問題底實質分辨清楚，究竟這個人底行爲是不是真正工賊行爲，便來斥責說應用「工賊」二字是不容許的，完全一樣。

有各種不同的分裂。我已再三用過「不道德的」分裂這一說法。現在我就來說到問題底這一方面。中央委員會在自己的控訴書中說我猜疑黨員底政治道德。這實在是說得太軟弱了，並且只是運用到上述這兩個引文上是不正確的。我不僅是「猜疑」那三十一人及唐恩底「政治道德」。我以所著的那幾本「關於選舉的小冊子」底全部內容來指責他們在政治上不道德或者對黨不道德的分裂。而我現在還是堅持這種指責。任何想把這指責底重心從關於製造分裂者的這個總的、基本的與根本的問題轉移到任何一個微小的、局部的與從生的問題上去的企圖，都只會是徒勞無益的。

任何一種分裂都是反黨的最大的罪惡行爲，因爲它毀滅黨，斬斷黨的聯系。但是，也有各種不同的分裂。我所屢次應用的「不道德的分裂」這一說法並不能運用到一切的分裂上面去。我且舉例來說明這一點。

假定在黨內老早就有着——舉例說——主張贊助立憲民主黨政策和反對贊助立憲民主黨政策的兩個派別在彼此鬥爭。發生着巨大的政治事變，這種事變使立憲民主黨的趨向尖銳化，使立憲民主黨同反動勢力的分贓妥協日益逼近着。主張贊助立憲民主黨人的這一派同反對贊助立憲民主黨人的那一派破裂開來。這樣的分裂，亦如任何一種分裂一樣，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最尖銳的、憤懣的、散播仇恨等的鬥爭，但決不能認爲這種分裂是不道德的分裂，因爲除了原則分歧底尖銳化之外，並沒有絲毫其他的東西隱藏在這一分裂底後面。

試拿另外一種分裂來看吧。假定黨內兩個派別彼此同意了允許各個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策略，如果有人在某個地方毀壞這一共同協定，如果他們是用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叛徒式地對待同志的方式這樣來毀壞協定，——那末，大家都一定會一致認爲這種分裂是不道德的分裂。

孟什維克於選舉前夜在聖彼得堡造成的分裂正是這樣不道德的分裂。第一，在全俄代表會議上，黨內兩個派別曾鄭重允諾在選舉中服從地方組織底地方策略。在全俄國只有聖彼得堡的孟什維克曾獨一無二地違背了這一諾言。這是不道德的。對黨說來這是違背信義的。

第二，中央委員會不但不來統一黨，而且進行着小組織的政策，直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至直接幫助孟什維克的分裂，而中央委員唐恩曾最積極地參預其中。這是不道德的。這就是利用黨所給予的權力來反對黨。這就是口喊維護黨底統一，而秘密地、偷偷摸摸地用毒刀來實行打擊。

這就是迫使我不得不對於無論三十一人或唐恩都斥責為政治上不道德人物的兩件基本事實。我的全部小冊子都正是充滿了這樣的斥責精神。

所以我就在法庭面前堅持了這種指責。我用了一切力量使這次審訊在審判人面前把聖彼得堡分裂底全部情境都揭破出來，而使審判人有可能以十分堅信來解決這個問題：究竟這是否是不道德的分裂呢？究竟是誰使用「上了毒的武器」呢，是造成分裂的人呢，或是同分裂底造成者進行最不留情的殲滅戰的人呢？

把這個問題闡明到底，一直到窮其深根竭其底蘊，由第一次實際加入到俄國社會民主黨來的那些民族的社會民主黨代表來闡明它，這對於在我們黨內建樹真正黨的關係以代替掩藏的分裂說來是能有重大意義的。

構成這次訴訟內容的不是形式的問題，不是狹隘的法律問題。的確，關鍵並不在於究竟在統一的黨內應當寫講生意呢或是進行談判呢，選入呢或是偷運呢，爲了位置來出賣選舉票呢或者在獲得位置底條件下來合併選舉票呢等等。這樣來了解問題，當然是只能遇到微微一笑的。

關鍵就在於，我們是真正重視我黨底統一呢，還是容忍分裂，而用形式上的遁詞來敷衍分

裂，來搪塞這種毒灘呢。審判員同志們，究竟聖彼得堡的分裂是已經過去的全黨分裂時代底最後的、真正最後的餘聲呢，或者……或者它將是新的分裂底開始，而這就是說，是使用上毒武器來重新地進行鬥爭的開始呢，這一情況就要取決於——並且，也許不是在很小程度上取決於——你們法庭底判決呵。

俄國社會民主黨動搖着的統一將削弱下去呢，或是將強固起來呢，就要取決於你們這次判決呵。

一九〇七年二月

註 釋

〔一〕「爭取派」是指爭取俄國境內猶太人平權同盟底盟員而言。該「同盟」是於一九〇五年四月七日至九日在維爾諾城所舉行的猶太自由資產階級代表會議上組成的。至一九〇七年五月間遂不復存在了。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圖加特大會〔二〕

閉幕不久的斯圖加特代表大會是無產階級國際第十二次大會。前五次大會是在第一國際時代（一八六六到一八七二年）開的。當時馬克思領導第一國際，企圖——倍倍爾說得確當——自上地創造鬥爭着的無產階級之國際的統一。在各國社會主義的政黨沒有團結和沒有鞏固以前，這種企圖是不能獲得成功的，可是第一國際底活動曾給全世界工人運動以偉大的幫助，並留下堅固的痕跡。

第二國際由一八八九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代表大會所開創。以後各次大會是在布魯塞爾（一八九一）、蘇黎支（一八九三）、倫敦（一八九六）、巴黎（一九〇〇）及亞姆斯特丹（一九〇四）舉行的；這個新國際在這些大會上，依靠各國堅固的黨，完全鞏固起來了。參加斯圖加特大會的代表共有八八四人，代表歐、亞（日本及印度之一部分）、美、澳、非（南非洲代表一人）等洲二十五個民族。

國際社會黨人底斯圖加特大會，其偉大的意義，就在於它已經把第二國際完全鞏固起來並把國際大會變為切實的會議，這些會議對於全世界社會黨人底工作方向及性質有極嚴重的影響。在

形式上講來，國際代表大會底決議不是爲各個國家所必需遵守的；可是，它們的精神上的意義却是這樣的大：不遵守決議的情形事實上只是稀有的例外，恐怕比各黨不遵守自己代表大會底決議還要稀有些。亞姆斯特丹代表大會已謀得法國社會主義者底統一，它的反關員主義的決議真正表現了全世界覺悟無產階級底意志，決定了各國工人政黨底政策。

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在這個方向中又作了一大進展，因爲它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成了確定社會主義底政治路線的最高機關。它比亞姆斯特丹大會更決斷地確定了這一條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反機會主義的路綫。由蔡特金主編的德國社會民主派女工機關報「平等」(Die Gleichheit)關於這點說得很公正：

「一個別社會黨在一切問題上所犯的機會主義的傾向，已因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底合作而改正到革命方面來了。」

同時，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從來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點，這次却表現動搖或者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斯圖加特代表大會把恩格斯關於德國工人運動的一段深刻的評論證實了。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恩格斯在給第一國際底老戰士左爾格的信中寫道：

「德國人，尤其是當他們把大批庸人送到國會去（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以後，領導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作用被人爭奪着，這一般說來是很好的。德國在平靜時期，什麼都變成庸俗的

了；在這樣的時候，法國人露出鋒芒來同他們競爭是絕對必要的，而這種競爭是不會缺少的。」

在斯圖加特沒有缺少法國人競爭的鋒芒，而這種鋒芒的確會是必要的，因為德國人已經表現出不少的庸俗氣。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應當注意這點，因為我們的自由派（而且不僅是自由派）正是拚命把德國社會民主黨最不光榮的地方引為模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最有思慮的和最出色的領袖已經親自指出這種情形，並拋棄一切虛偽的怕羞習氣，堅決地指出這點，作為警戒。

蔡特金底機關報寫道：

「在亞姆斯特丹，全世界無產階級代表大會上的一切爭辯底革命基礎是德列斯敦的決議（二），而在斯圖加特大會，則福爾馬在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彼伯洛夫在僑居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達維特（我們還要加上伯恩施坦）在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上的演說（三），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機會主義的論調。這一次，德國代表在大多數委員會內，在大多數問題上，都做了機會主義底首領！」

考茨基評論斯圖加特代表大會時寫道：

「德國社會民主黨向來在第二國際內所實際表演的領導作用，這次竟絲毫沒有表現過。」現在來分別考察大會上所討論過的問題。關於殖民地問題，在委員會內未能消滅意見的分歧。機會主義派與革命派的爭論由大會自己解決了，贊成革命派的一二七票，反對的一〇八票，

懷疑的一〇票，結果革命派佔居多數。這裏還要附帶指出一個好的現象，就是俄國社會主義者，大家都本着革命的精神，一致地表決了一切問題（俄國共有二〇票，其中俄國社會民主黨一〇票，波蘭人在外；社會革命黨人七票；工會代表三票。波蘭有一〇票；波蘭社會民主黨得四票，波蘭社會黨及非俄屬波蘭得六票。最後，芬蘭兩個代表共得八票）。

在討論殖民地問題的時候，委員會內形成了機會主義的大多數，而在決議草案內發現了這樣神奇古怪的句子：「大會並不在原則上和在任何時候都斥責一切的殖民政策；殖民政策在社會主義統治之下可以有發揚文化的作用。」這個論點，實際上是等於直接退到資產階級的政策及資產階級宇宙觀方面去，資產階級宇宙觀替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及暴行作辯護。這是退到羅斯福方面去，——有一個美國代表這樣說。想拿「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和在殖民地進行切實的改良工作等任務來替這種退却作辯護，這些企圖會是非常不適當的。社會主義從來不拒絕而且現在也不拒絕在殖民地內也擁護改良，可是這並不是，而且不應當是減弱我們的原則上的立場；反對一切構成「殖民政策」的行爲，即反對搶奪，反對征服異族，反對暴力和擄掠。一切社會黨底最低綱領，對宗主國及殖民地都是一樣有效的。「社會主義的殖民政策」這個觀念本身，就糊塗到了極點。大會把以上所引的這些話刪去，而對於殖民政策作比較過去各決議案中更嚴厲的斥責，這完全是正確的。

關於社會黨對職工會關係問題的決議案，對於我們俄國人有更重大的意義。該問題在俄國是

一個迫切的問題。斯德哥爾摩大會之解決該問題是贊成無黨派的職工會，即是批准了俄國的以普列漢諾夫爲首的主張工會中立的人底立場。倫敦大會則向贊成有黨派的職工會而反對工會中立的方面進了一步〔四〕。大家知道，倫敦大會底決議案，在一部分職工會內，尤其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報紙上引起了大的爭論與不滿意。

在斯圖加特大會上，實質上問題正是這樣，使職工會中立還是使它們更加與黨接近？而國際社會黨人大會是贊成工會與黨更加接近的，讀者只要把大會決議閱讀一次就會相信這一點。決議內並沒有講到職工會底中立性，也沒有講到它們的無黨派性。考茨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曾經堅持工會與黨接近而反對倍倍爾底中立說，所以他向萊比錫工人作關於斯圖加特大會的報告時（一九〇七年「前進報」第二〇九期）有全權可以這樣聲言：

「斯圖加特代表大會底決議把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講到了。它把中立性永遠葬送了。」
蔡特金寫道：

「在原則上已沒有人反對（在斯圖加特）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基本歷史趨勢——使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聯系起來，使各種組織盡量密切地團結爲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底統一力量。只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代表普列漢諾夫同志」（應當說是孟什維克底代表，他們派普列漢諾夫到委員會去充當「中立主義」底辯護者）「與法國代表團底大多數企圖用極不中肯的理由，用他們國家底特點爲藉口，認爲對於這個原則加以相當的限制是正確的……大會底絕大

多數都是贊成社會民主黨與職工會聯絡一致的堅決政策的」……

應當指出：普列漢諾夫底這一個不中肯的（蔡特金底公正的意見）論據，却以這種形式傳遍俄國的合法報紙了。他在斯圖加特大會底委員會上藉口說，「俄國有十一個革命的政黨」：「職工會到底應當同哪一個聯絡一致呢？」（這是我們從「前進報」第一九六期上引來的）。普列漢諾夫這種藉口，無論在事實上，或在原則上都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俄國底每個民族內，爭取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影響的，不過只有兩個政黨：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波蘭社會民主黨和波蘭社會黨，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和拉脫維亞社會革命黨（即所謂「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聯合會」），阿爾明尼亞社會民主黨及阿爾明尼亞社會革命黨等等。俄國出席斯圖加特大會的代表團，也馬上分為兩部分。說俄國有十一個政黨，這完全是任意捏造的，這只是把工人帶到迷路上去。普列漢諾夫在原則上之所以不對，是因為俄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在任何地方都必然地發生，在職工會內也是一樣。譬如英國人也有兩個鬥爭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SDF)〔註〕和「獨立」黨(IIP)〔註〕，可是他們沒有想過要反對決議案。

在斯圖加特被否決的中立思想，已給了工人運動以不少的害處，這在德國特別顯著。中立思想在德國宣傳得最廣，運用得也最多。結果，職工會偏向機會主義如此顯著，連在本問題上如此小心謹慎的考茨基都已經公開承認這種偏向。他向萊比錫工人作報告時公開說：要明瞭德國代表團在斯圖加特所表現的「保守性」，「只要看看代表團底成分就是了。其中有一半的職工會代

表，因此，我們黨底『右翼』當時所表現的力量比在黨內所實有的更大些」。

毫無疑義的，斯圖加特大會底決議案應當加速俄國社會民主黨和俄國自由派所這樣鍾愛的中立思想堅決斷絕關係。我們採取必要的謹慎態度與漸進態度，不採取任何急躁的與不合節奏的步驟，同時我們應當在職工會裏面本着使職工會和社會民主黨更加接近的精神來堅決進行工作。

其次，關於出國僑居和入國僑居問題，在斯圖加特大會委員會內也顯然暴露出機會主義派和革命派之間的意見分歧。機會主義者打算限制落後的、不開通的工人（特別是日本人和中國人）底僑居權。這班人底狹隘的行會式的閉關自守的精神及工聯主義的特權思想，多過了他們對社會主義任務的意識；而這些任務應當是：教育和組織無產階級中間那些還沒有參加工人運動的階層。大會排斥了這一方面的一切偏向。甚至在僑居問題委員會內，主張限制僑居自由的分子是完全孤立的，而大會決議案就完全承認了全世界工人團結一致的階級鬥爭。

關於婦女選舉權問題，決議案也是一致通過的。只有從半資產階級的「費邊社」來的一個英國女子，主張可以不爭取完全的婦女選舉權而只爭取便利於有產者的有限制的選舉權。大會無條件地否決了這種意見而主張：女工爭取選舉權時，不要同資產階級的男女平權派聯合一起而要與無產階級底政黨聯合在一起。大會認為，在從事婦女選舉權運動的時候，必需完全堅持社會主義底原則及男女平權制，絕不為圖什麼方便而損害這些原則。

在該委員會內，關於這一點發生了有趣的意見分歧。奧國人（阿德列爾、波普）曾替自己爭

取男女普選權的策略作辯護；爲着爭得這個權利起見，他們曾認爲最好不要把婦女選舉權也提在前面。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蔡特金，還在奧國人從事普選權運動時，就起來反對這種主張。蔡特金曾在報上申言說：抹殺婦女選舉權的要求是絕對不行的；奧國人爲圖方便而機會主義式地犧牲原則；如果他們也這樣熱烈地擁護婦女選舉權，那末他們決不會減弱而會加強鼓動底規模和人民運動底力量。該委員會內還有一個出色的德國女社會黨員齊慈也完全贊成蔡特金。阿德列爾底修正案是間接辯護奧國人底策略的（在這修正案內只講到，真正爲全體公民爭取選舉權時不要有間斷，而沒有講到，進行爭取選舉權的鬥爭時始終要提出男女平權的要求）；這個修正案以十二票對九票被否決了。該委員會與代表大會底觀點，齊慈在國際女社會黨人代表會議上（七）（這代表會議與代表大會同時同地舉行）的演說中的下面一段話裏最確切地表明出來了，她說：「凡是我們所認爲正確的，在原則上我們都應當要求……而只有缺少力量去作鬥爭時，我們才要求可以達到的東西。社會民主黨策略向來就是這樣的。我們的要求越微小，政府底讓步也越微小……」在這次奧國女社會黨人與德國女社會黨人間的爭論中，讀者可以看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多麼嚴厲地對付那些任何放棄堅定的原則的革命策略的企圖。

大會最後一天是討論最使大家感受興趣的軍國主義問題。鼎鼎大名的愛爾維擁護一個極無根據的主張（八），他不曾把戰爭同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統治聯繫起來，不曾把反軍國主義的鼓動和全部社會主義的工作聯系起來。愛爾維底草案——用罷工和暴動去「回答」任何戰爭，表現他完全

不懂得這種或那種鬥爭方法底運用，不是依賴於革命家底預先決定，而是依賴於戰爭所將引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危機底客觀條件。

可是，如果愛爾維的確是表現了輕率的浮泛的態度，爲動人的詞句所迷戀；那末，僅僅本着信條主義的精神叙述一些社會主義底普通真理來同他對立一下，那便是莫大的近視病了。福爾馬就特別陷於這種錯誤（倍爾與黑德當時沒有完全避免這個錯誤）。他以非常自滿的態度，本着酷愛拘守成規的議會主義的精神，痛罵了愛爾維；同時沒有看到，他自己的機會主義底狹隘性與呆板性却迫使人們承認愛爾維主義中有靈活的東西，雖然愛爾維自己對問題的提法，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和無稽的。有時理論上的荒謬觀點在運動底新轉變時含有某些實際真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特別是盧森堡在演說中所着重指明的，也就是問題底這一方面，就是號召人們不要光是注重議會的鬥爭方法，號召根據將來戰爭和將來危機底新條件而從事活動。盧森堡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列寧與馬爾托夫在這裏是一致的）共同提議修改倍爾底決議案，而在這些修正案內特別提出：必須在青年中作鼓動工作；必須利用戰爭所產生的危機，來加速資產階級底顛覆；必須注意到，鬥爭底方法與手段必然要隨着階級鬥爭底緊張及政治局面底改變而變更。這麼一來，倍爾底決議案，本是教條式的片面的，死的，容許福爾馬式的論調的，結果却完全變成另外一個決議了。一切理論上的真理，都在這個決議案中反覆說明，教訓愛爾維派——善於爲了反軍國主義而忘記社會主義的愛爾維派。可是這些真理不是拿來祖護議會主義的癡病的，不是拿來單單推

崇一種和平手段的，不是拿來崇拜已有的比較平靜的局面的，——而是要來承認一切鬥爭手段，來估計俄國革命底經驗，來發展運動底有作用的、創造的方面。

在我們已經多次提到的蔡特金底機關報上，正是十分正確地指出國際大會反軍國主義決議案中這一個最出色最重要的地方。蔡特金關於反軍國主義的決議案說道：

「這裏，結果取得勝利的，還是工人階級底革命熱忱與工人階級相信自己鬥爭能力的勇氣，——一方面戰勝了悲觀主義的軟弱無力的福音與保守的企圖；將鬥爭只限於舊有的國會鬥爭；另一方面戰勝了法國半無政府主義者如愛爾維等底簡單的反軍國主義的兒戲。結果爲專門委員會及全世界將近九百代表所一致通過了的決議案用熱烈的詞句表明：自前屆國際大會以來，革命的工人運動有了巨大的高漲；決議案提出無產階級策略底靈活性，它的發展能力，它之隨條件底成熟而緊張化，作爲這一策略底原則。」

愛爾維主義被駁倒了，可是它之被駁倒不是有利於機會主義的，不是站在教條主義與消極性底觀點上來駁倒的。切實要求採取更堅決的新的鬥爭方法，這是國際無產階級所完全承認了的，而且是與經濟矛盾底全部緊張，與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危機底一切條件相聯系着的。

不是空洞的愛爾維式的威嚇，而是明確意識到社會革命之必不可免，具備鬥爭到底的決心，決計採用最革命的鬥爭手段——這就是斯圖加特國際社會黨人大會關於軍國主義問題決議底意義。

無產階級底軍隊，在世界各國正在鞏固起來。它的覺悟性、團結性及堅決性，不是按日增

長，而是按時增長着。就是資本主義也很能關心到危機底加頻，這些危機是無產階級要利用來摧毀資本主義的。

一九〇七年末

註釋

〔一〕在斯圖加特大會上（一九〇七年），因為大會上以列寧為首的左派分子（盧森堡等人）提出對軍國主義問題決議的修正案，曾經明確規定了一個基本的戰略任務，而各國社會黨人都應集中無產階級力量去解決這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加速資本主義統治底顛覆，其方法就是準備羣衆去作社會主義革命來對付資本家之準備世界大戰。

這個口號雖然遇到第二國際底領導黨——德國社會民主黨方面的反對，可是終於被大會通過了。德國代表團共有三〇〇人，他們在大會上擁護機會主義的政策和策略。在大會選出的各委員會（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僑民問題委員會、殖民政策問題委員會）中，有老機會主義者達維特、伯恩施坦、彼伯洛夫等人充當德國的代表，列寧把這班人認作絲毫沒有社會主義氣味的人。

列寧底「國際社會黨人底斯圖加特大會」一文登在布爾什維克出版的「一九〇八年年鑑」上。該文估計這次大會底工作，明顯地標明列寧如何與戰前第二國際中的右派機會主義、中派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左傾（愛爾維）作了鬥爭，並一般地說明在斯圖加特大會以後曾放在革命社會民主黨人面前的任務。

〔二〕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德列斯敦大會是在一九〇三年舉行的。大會上討論底中心問題是關於修正主義的問題，因為在大會不久以前（一八九九年），伯恩施坦出版了一部名著：「社會主義底前提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德列斯敦大會斥責了伯恩施坦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修正，認為這是企圖「把站在階級鬥爭及奪取政權這個觀點上的致勝政策，暗中代以親善地迎合現制度的政策。」大會又預告黨，叫它以後也要反對這樣的企圖：把革命的黨變為「以資產階級制度之改良

爲滿足」的黨。

一九〇四年舉行的第二國際亞姆斯特丹大會審查了修正主義問題，並通過了一個關於「社會黨策略底國際規例」的決議，該決議重複德列斯敦大會決議底一切基本原則。然而這兩次大會之斥責機會主義，帶有中派調和主義的性質，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中派領導分子，不僅把伯恩施坦及其同伴這些公開的資產階級代辦容留在自己隊伍裏，並且還給他們參加黨的領導，中派分子既迎合這班資產階級的代辦，於是就領導黨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

〔三〕福爾馬在斯圖加特大會軍國主義問題委員會內的演說中，離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原則和宣傳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他說：「說我們沒有祖國，這是不對的。我們是有祖國的。對人類的任何博愛都不能妨礙我們做個良好的德國人……我們認爲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不但在策略上是不正當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有害的。」

在工人僑居問題委員會上，德國代表彼伯洛夫關於亞洲工人僑居問題，擁護民族國家主義的主張。他證明，國際應當贊成用立法限制「黃種」工人（中國人、日本人及馬來人）移居於「文明」國（德、英、美等）。他證明，這些工人既同意得較低工資而做工，實際上就是工賊。因此，對待他們也應當同對待工賊一樣，不許他們移居到「文明」國內來。這樣看來，彼伯洛夫主張用資產階級的立法，禁止亞洲工人到歐洲各國來做工。

同時，達維特（也是德國代表）在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內又說：因爲殖民政策是資本主義底必不可免的伴侶，所以社會民主黨並不是應當反對殖民政策，而是應當主張改善殖民地人民底勞動條件，主張由資產階級正常地開發殖民地的富源。他說：「我們應當創造自己的殖民政策。」社會民主黨應當在殖民地爭取特殊的勞動保護制，而不要站在否認殖民政策的這個無所裨益的立場上。

達維特這樣可憎地擁護對殖民地的剝削，而伯恩施坦則企圖給他以「理論上」的根據。他說，世界上有兩種民族，一種是統治的，一種是被統治的。他說，有些民族還是小孩子，他們自己不能發育。伯恩施坦從這個「理論」中作出結論，說殖民政策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是必不可免的。

〔四〕關於職工運動「中立」的機會主義理論，是在德國創立的。這個理論是代替另外一個同樣錯誤的理論，即所謂「利用」工會的理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發展底初期，或者是完全不認（一部分人）工會之任何意義，或者是認爲（另一部分人）只有把工會當做黨的鼓動場所而「利用」它，工會才有用處。工會一天一天地發展起來，加入工會的工

人一天一天地增多起來，於是黨內憤得職工運動重要性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但是整個兒講來，黨承認職工運動是有重大意義的。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却認為，職工會底任務，只在於進行鬥爭以謀改良資本主義社會內的勞動條件。這個鬥爭，最好是由職工會不受黨的領導而來進行。至於願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工人，則他們就應當加入黨。這樣一來，職工運動「獨立」或「中立」的理論就代替了關於「利用」職工運動的理論。這個理論底害處，就在於它使職工會脫離黨和黨的領導，並督促職工會專做經濟的改良主義的工作。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四次統一（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底決議案，如列寧所說的，批准了「擁護中立論的人們底主張」，該決議案是一個孟什維主義的決議案。它的結尾說道：

「大會認為

一、黨應當贊助工人組織工會的這種願望並用各種辦法來協助無黨派的職工會之成立；

二、因此，在利用一切公開可能，特別是利用工會法的時候，應該不斷地擴大公開範圍，其方法就是不斷地爭取工會底全部自由；

三、全體黨員都應加入工會，積極參加工會一切工作和在工會會員中間不斷鞏固他們的階級團結精神和階級意識，以便在鬥爭中及鼓動中，與黨發生密切聯系。」

這個孟什維主義的決議案，模糊地說什麼「鞏固階級團結精神和階級意識」，說什麼「與黨發生密切聯系」，其實是實行工會中立的機會主義主張，否認黨對工會有領導之必要，反對工會參加政治鬥爭去實現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任務。布爾什維克提出了自己的決議草案來和孟什維主義的決議對立。布爾什維克的決議要大會承認：「黨應當竭盡其力，以便教育工會中的工人們去廣泛地了解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及其社會主義任務，以便在這些工會裏用自己的活動來爭取真正的領導作用，以便使這些工會在相當的條件之下，能夠直接歸附黨，然而並不是把非黨的會員排斥出去。」布爾什維克的這個對於工會與黨相互關係的觀點，曾為第四次代表大會所否決，但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却用更加明顯的形式實現了自己的這個觀點。第五次代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案說道：「大會再度批准統一大會關於工會工作的決議，同時向職工會內工作的一切黨組織及全體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社會民主黨的工會工作中的基本任務之一：促進工會承認社會民主黨思想上的領導，以及與黨建立組織上的聯系，凡地方條件允許的地方必需實行這

個任務。」

〔五〕即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產生於一八八四年，是帶有急進情緒的在不熟練的工人中及失業工人中進行工作。聯盟舉行了羣衆大會，遊行示威，遊行示威。

社會民主聯盟，經過多次分裂之後，於一九一二年改名爲「不列顛社聯盟」之所以帶有這種小組的性質，是由於它的正確的策略以及英國工人在於它極其忽視爲工人日常需要的鬥爭。聯盟認爲減少工作時間，實行國階級去和資產階級調和，足以使他們離開革命鬥爭。聯盟在自己的選舉策略。它與自由派鬥爭時，向保守派去領經費來組織這個鬥爭。它對工會（會完全採納聯盟的綱領。所有這些錯誤，在英國工人運動條件之下，便使〔六〕即獨立工黨，是一八九三年成立的。該黨是從工人貴族及工會「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的」黨。該黨就其性質與行動而論，完全與社會民主工人階級的狀況，而把社會主義拋在一邊。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範圍內實行改良的手段是國會活動，在市政廳內及資產階級公法團體內進行工作。在該黨是真正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的一個黨。

〔七〕第一次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會議是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在斯圖加特關於爭取婦女選舉權的問題；二、關於組織國際婦女社會主義秘書處的問題，有力的機會主義思潮，這思潮爲奧國婦女代表團及英國一部分女代表所代表。〔八〕愛爾維（開始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是法國社會黨黨員）在該報上作反軍國主義的宣傳，並發揮一種主張，說無產階級應當用辭會上也發表了這種主張。列寧在他這篇文章內以及「好戰的軍國主義與社會主義」詞句底錯處。